

炎黄春秋



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在狱时（1937年7月31日），右起：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筹办“抗大”

毛泽东选将罗瑞卿

邹韬奋与周恩来

忧时救国成知己

张克侠将军抗战日记选录

把惩贪视为

治国之要的

康熙帝



罗瑞卿在抗大

11
95

纪念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六十
周年《长征纪事》
首映式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



①会议大厅一角

②刘华清(右), 萧克

③张震(左), 廖汉生

④张爱萍(左), 陈锦联

⑤退浩田(右), 杨秀山

⑥王平, 张爱萍, 张廷发(从左至右)

⑦萧克(左), 杨成武

详细报道见 14 页

本期导读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危机与转机，是一对相互并存的矛盾统一体。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如何使党的事业中兴的问题。当时的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的全力支持下，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今天回忆那一段历程，仍令人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筹办“抗大”毛泽东选将罗瑞卿

为了培育热血救国的民族精英，延安要筹办抗日军政大学，谁来作教育长呢？毛泽东选将点在了罗瑞卿头上。从此热心肠的罗瑞卿教育长，便和“抗大”的历史贡献连结在了一起。

邹韬奋、周恩来 忧时救国成知己

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邹韬奋这位革命志士、当代文豪，站在抗日救亡的历史潮头，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与周恩来等同志结为知己，虽历尽危难而义无反顾，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常书鸿一生心血注敦煌

人的一生真正致力于事业，恐怕只有半个世纪。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要取得超人的成就，必须心怀祖国、忘我舍家、倾注毕生心血。蜚声中外的我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钦敬的人物。

“《新生》事件”与杜重远遇害

这篇文章与本期记述邹韬奋奋斗史的文章可称姊妹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迫停刊之后，杜重远又接办了《新生》周刊，继续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犹如一支巨手相传的火炬，使国民党反动派惧怕至极，千方百计要把她扑灭。……杜重远也被盛世才所害。

美、蒋包庇冈村宁次的丑剧

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罪大恶极的战犯冈村宁次，在上海审判中不仅没有受到公法与正义的严厉惩罚，反而倍受国民党、蒋介石乃至美国当局的恩宠，由阶下囚变为座上客，被奉为“剿共”的顾问和高参。留下了一出遗臭万年、充满罪恶交易的丑剧。

覆灭在水浒英雄故地 的一支侵华日军

水浒英雄，救困扶危、除暴安良。他们的后代远远超过和胜过先人。当神州大地陷于日本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一支挺进山东敌后的八路军队伍，在陈光、罗荣桓的巧妙指挥下，布下诱敌深入的口袋阵，把一个大队的日寇聚歼于水泊梁山。

把惩贪视为治国之要的康熙帝

惩贪不是仅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历史性的问题。在我们强调倡廉肃贪的今天，汲取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有益的。请看康熙帝的作为……

下期要目

- △1841—1997 香港 156 年的风雨历程
- △60 年后李昌首次详谈“一二·九”与民先队
- △李锐与《庐山会议实录》
- △孙中山伦敦蒙难始末
- △毛泽东为小青年“照写”的手书
- △“求实部长”杨显东
- △“妈妈同志”——任锐
- △董寿平的书画艺术
- △浅谈清代的“吏治”

<p>专稿</p>	<p>英杰谱</p>	<p>赤子心</p>	<p>殒星篇</p>
<p>④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p>	<p>⑮ 筹办「抗大」毛泽东选将罗瑞卿..... 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p>	<p>②④ 邹韬奋与周恩来忧时救国成知己..... 穆欣</p> <p>③⑩ 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唐群英..... 经盛鸿</p>	<p>③③ 常书鸿一生心血倾注敦煌..... 方约</p> <p>④① 张太雷一封残破家书的由来..... 钱听涛</p>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 珣 舒元璋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 事 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170955
定 价: 3.20 元

目 录

信息窗	①4 《长征纪事》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耿一民
编读窗	⑧6 读者来信两封……………彭德 王景山 ⑧5 许昆银剽窃他人文章被揭露……………本刊编辑部
古镜台	⑧2 把惩贪视为治国之要的康熙帝……………曾铨 曾宪旻
艺苑志	⑦8 吴桥杂技之乡的奇人奇遇……………郭锋 ——访独步昆坛的侯少奎……………王恂 郑晋 ⑦5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
耻辱柱	⑥8 美、蒋包庇冈村宁次的丑剧……………王俊彦
人海浪	⑥5 「文革」中「苦中作乐」的「干校」生活……………骆子程
轶闻录	⑥0 民国初期临城劫车案的台前幕后……………赵炯
春秋笔	⑤6 覆灭在水浒英雄故地的一支侵日军……………吴济夫 ⑤2 张克侠将军抗战日记选抄……………张权 ④9 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欧初 ④4 「《新生》事件」与杜重远遇害……………阎小波

编者按：作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拨乱反正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最重要的功勋之一，是在全党同志，特别是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6周年了，今年11月20日是他诞辰80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发表此文，以表深切的怀念。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 戴 煌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



抗日战争时期，胡耀邦(右)和表弟杨勇在陕北

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老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胡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却出台了。按照“两个凡是”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依旧有效；

建国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邓小平同志更直接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胡耀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

5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王震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扬、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读书学习

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以写多长？”

耀邦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人民日报》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17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艰难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

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前面,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

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坐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说: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文革”后不久,他被

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之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玉峰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动乱，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到有熟人可投时即离开。郭玉峰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呆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玉峰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刹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

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咱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象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批新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飏同志。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决定，郭玉峰调离中组部。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三、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胡耀邦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不少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

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这个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此后，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对推动平反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胡耀邦身体力行，中组部重新成为“党员之家”

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平反尽职尽责，而耀邦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党员之家”的美名重新大振。

1978年1月，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上干部100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老同志畅所欲言。这205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北京各高等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了“党员之家”，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谈话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郑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胡耀邦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胡耀邦和叶剑英、聂荣臻在休息室

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了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因两条“罪行”被开除党籍。一是1950年，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人打伤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二是，他将《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他被开除党籍后，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965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严嘱“不得

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只给生活费 37 元。1966 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不久，71 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 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与他亲切交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

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 8 月，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 120 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 年 4 月，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 1965 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 年 10 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 1952 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 年 4 月 13 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 1980 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为他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派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 年，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于 1978 年 12 月 10 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 73 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也曾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



在 1982 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胡耀邦与邓小平在交谈

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外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

他的这番议论很快传到了康生耳里，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塘集劳动。1962 年 1 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领导，要秦川谈谈如何通过“劳动锻炼”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但秦川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由于不认错，部里没有安排他的工作，要他自找门路。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喂！”

谷牧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

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笈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才把秦川一并带回北京。“文革”风起,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四人帮”垮了台,他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要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的上访者人来人往,就是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的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到耀邦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到卧室找到耀邦。尽管耀邦为修改文章,到凌晨两点才睡觉,他还是倾听了朱鸿翔的诉说。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甦原是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余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甦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甦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甦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甦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终生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来到中组部大门内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时曾三已72岁。

1924年就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三,1931年着手创建中

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共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俩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俩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俩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俩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

考虑：许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象都嗫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奋斗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年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平反的两次会议： 烟台会议山重水复， 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

在为“文革”中遭迫害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平反的问题。早在1977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

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平反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向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平反工作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五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作为

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统战部。统战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错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帐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就足够可以的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

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的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黎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取、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民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中央党



1982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得县调查时,当地百姓向他赠送一套木制餐具

《长征纪事》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会主办的“长征·世纪丰碑”大型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10月8日,近百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欢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长征纪事》首映式。这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福日集团公司联合摄制的12集电视专题片的首映式,标志着经国务院文化部批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长征·世纪丰碑》大型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迟浩田,亲历长征的老将军萧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杨成武、廖汉生、张廷发等同志出席首映式。

出席首映式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宝光、姜思毅、杜导正,福日集团总经理王建军等。

《长征纪事》是一部反映红军二、六军团万里长征艰苦历程的历史专题片。电视片视角独特,通过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睛,以丰富珍贵的史料,展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和红军将士献身

事业,追求理想的牺牲精神,以及共产党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博大胸怀。

会上,姜思毅、王建军及青年代表毛新宇等先后发言。

明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将主办“长征·世纪丰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型系列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上海电视台等单位已决定参与协办。活动的主要内容有:沿红军长征路线拍摄和制作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长征·世纪丰碑》;编辑出版具有系统性、权威性,涉及红军长征方方面面的《长征大事典》;举办中国西部开发国际研讨会;制作红军歌曲录音带和各种长征纪念画册、纪念品;举办老红军摄影、诗、书、画展览等。

(耿一民)

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我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这场大解放,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以实事求是精神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大胜利。

胡耀邦是位有名的“红小鬼”,他为中国人民革命

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支持下,为拨乱反正,为党的事业的中兴,作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一线的一个重要成员,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万因为胡耀邦参予领导的“大抢救”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作者戴煌是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林耀、萧徐)

筹办「抗大」毛泽东选将罗瑞卿

●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



1936年6月1日，抗大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
罗瑞卿(左)陪同毛泽东(中)进入会场

毛泽东认为他颇似 邓演达，任命他 为抗大教育长

1935年10月，罗瑞卿随中央红军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11月，罗瑞卿调任第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并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开办红军大学，为即将来临的伟大抗日战争培训骨干。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办红大，就要像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和教员。一军团作风雷厉风行，很能打仗，校长就选林彪。学校还需要有教育长，我们要选一个像邓演达那样精明强悍、雷厉风行的干部当教育长。罗瑞卿颇像邓演达，建议选他作教育长。毛泽东还提议由周昆任校务部主任、何

涤宙任教务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教员。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是他红大讲课的提纲。毛泽东还就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提出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抗大贯彻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与政治并重”等教学原则。

1936年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庙宇门前的空地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

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最后充满感情地说：“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他的话引起全场师生热烈鼓掌。

当天晚上，开了晚会，节目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的唱歌跳舞，红大师生演出了话剧。晚会后，罗瑞卿、李克农陪同邓颖超到后台看望了演员。

红大共分三个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主要训练团以上高级干部，共39人。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杨立三、张纯清、刘亚楼、耿飏、张爱萍、杨成武、赵尔陆、王平、张经武、苏振华、陈士榘、郭述申、黄永胜、彭加仑、周建屏、符竹庭、贾拓夫、邓富连、杜理卿、张达志、童小鹏、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肖文玖、边章武、罗宝连、武亭、洪水。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共约800人。

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突然袭击瓦窑堡，因当时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红大掩护中央机关向西转移。7月初，红大一科、二科迁至保安（今志丹县）县城，第三科迁至甘肃省环县本钵寺。

于是，红大一科在保安县城东南面的半山坡上几十孔石窑洞里安了家，设备十分简陋。1938年6月1日，罗瑞卿在《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中回忆道：

学校第一期的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石窑；他们没有任何校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堂上听讲的坐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作

笔记唯一的活动书桌了。

由于国民党封锁，纸张严重匮乏。学校要印讲义，给学员发一个笔记本都很困难。此时，蒋介石经常派飞机前来骚扰，从飞机上撒下许多传单。部队搜集到这些传单，都送到红大来供大家使用。一天，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大家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大家一看，是国民党悬赏的赏格，宣布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按职务大小不同各奖大洋若干。同志们一算，仅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值好几百万。有的同学对罗瑞卿说：“老罗，你去给蒋介石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先支出来，我们买点纸、笔也好哇！”罗瑞卿立即风趣地说：“对，我就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

于是，张爱萍、宋裕和即按此情节编了一出小戏。罗瑞卿演自己，蒋介石由耿飏扮演，宋美龄由宋裕和扮演。据耿飏回忆，这出小戏的台词大致是：

罗：（作打电话状）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罗）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你一分也没有发。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此时，罗瑞卿仍然绷着脸，但台下已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干脆跳到台上，作夺下蒋介石的电话状，问：“喂，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问：“快交代！”“快说！”

这已经出了原规定的剧情范围

了，耿飏只得应付一句：“我都抽大烟啦！”

“红大”不仅演戏，而且还打篮球、网球，十分活跃。

“西安事变”后，12月15日，中共中央调罗瑞卿与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一起参加中共代表团，随周恩来赴西安，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

1937年2月9日，罗瑞卿返回延安。此时，红大已随党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是傅钟，训练部长是刘亚楼，教务部长是杨立三。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

3月2日，抗大举行了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要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第二期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部。大学部设在延安；步兵学校设在甘肃庆阳。

大学部共分14个队，有学员1362人。其中第一、第二队多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他们中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王诤、刘型、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王尚荣、乐少华、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江华）、姚哲、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李干辉、谢振华、梁兴初、肖望东、胡立教、贺庆积、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谭政文、谭家述、曹里怀等。

第三至第八队为红军中的营、连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组成第四

大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50人。

这一期为抗大第一次承担成批培训外来知识分子的任务。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先后建立了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学校在职干部由第一期的14人增至87人。抗大的多数军事教官，是富有实战经验的红军指挥官，他们中有谭希林、韩振纪、曹里怀等。抗大的政治教员，则主要来自曾受过高等教育或曾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干部，其中有杨兰史、任白戈、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

同红大时期一样，抗大最好的教员乃是由党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兼任。为了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为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作好思想准备，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讲课历时3个多月，讲了110多个小时。毛泽东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即为其中的两章。通过授课，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大家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提高对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形态教条主义的辨别能力。

毛泽东还先后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教学方针。

在抗大不断发展的形势鼓舞下，凯丰欣然命笔，写了一首抗大校歌的歌词。罗瑞卿请抗大的音乐家吕骥谱曲。吕骥一看这歌词，旋律便在脑海中浮现，很快谱好了曲。罗瑞卿接过歌谱，随着吕骥一起小声唱起来。曲调庄严雄伟，很有气魄。于是，抗大校歌就这样诞生了：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他扛起老镢头， 带领学员挖窑洞。 毛泽东称誉其为 “我们的伟大事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抗大第二期学员随即于8月间毕业，分配到抗战的各个部队、各个部门。

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这一期共有学员1272人，其中红军老干部795人，占学员总数的63%。其中有：王树声、李先念、曾传六、许世友、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洪学智、郭鹏、丁秋生、罗舜初、程世才、李天焕、詹才芳、曹祥仁、丁国钰、李寿轩、欧阳毅、晏福生、李贞等。知识青年477人，占学员总数的37%。

8月25日，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校长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副校长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都离开了抗大。抗大的全面工作即由罗瑞卿主持。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求抗大腾出部分校舍，并由抗大学生自己动手解决校舍问题。罗瑞卿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决定挖窑洞。十月间，他向抗大师生做了动员报告，非常具体地讲了如何组织，如何施工以及对窑洞大小的要求，共需挖长2.5丈、宽8尺、高9尺的窑洞150孔，限15天内完成。

随后，罗瑞卿便亲自扛着老镢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开到凤凰山工地。据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蹲了国民党监狱九年的李逸民回忆：

任务是艰巨的，为了10天（应为15天）内按时完成，中饭都在工地上吃。挖窑洞消耗体力很大。我因刚出监狱不久，身体比较弱，（组长）王建安、许世友同志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分配去烧开水和送开水……罗瑞卿同志对工程抓得很紧，每天到现场检查进度，对完成任务好的小组进行表扬，对完成任务不好的小组进行批评，并教给挖洞的方法。我们小组属于进度快的。有一天，罗瑞卿同志来到我们小组施工现场，表扬一番以后，拿起自己带来的镢头，就参加挖起土来。挖了好一会，他又来到我身边，看我在烧开水，就问：“你是专门烧开水的吗？”我说：“是啊！因为我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身体比较弱，组长照顾我，让我专门烧开水。”罗笑了起来，并说：“你要保证开水供应啊！”

毛泽东得悉抗大开始挖窑洞并取得好成绩后，很是高兴。10月23日，他致信抗大：“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



抗大校址

的。”

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沿凤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孔窑，超额完成25个。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使人几乎疑惑到了大城市。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11月14日下午，罗瑞卿主持召开了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礼。毛泽东把这次挖窑洞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并亲笔将其写成横匾。他还参加了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果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他又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给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动员学员参加挖窑洞，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

劳动本身，对于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一课。1964年3月，罗瑞卿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青年战士成长的道路》一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毛主席给‘抗大’的学生讲话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1937年10月，出现了轰动延安城的黄克功事件。黄克功，红军时代曾当过团政委，1938年在抗大六大队任大队长。他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刘突然变卦，心胸狭窄的黄克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

罗瑞卿过去很器重黄克功，因为他出身贫苦，很能打仗，而且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但对黄毫不姑息迁就。在一次研究此案的会议上，他认真听取了不同意见后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向中

央作了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来到抗大校长办公室，又反复征求罗瑞卿等的意见，然后一边抽烟，一边考虑，在屋内来回踱步3小时，最后才下了决心，批准对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临刑前，罗瑞卿以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亲属。黄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表示认罪伏法。行刑的那一天，黄克功痛哭流涕，说自己害死一命，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希望大家不要学他的样了。

处理黄克功事件引起了极好的反映。广大知识青年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运动大会，进行了军事、政治、体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了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宣布罗瑞卿为抗大副校长，主持抗大全面工作。

1937年和1938年之交，罗瑞卿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据魏传统回忆，这本书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编写的。撰写此书的目的为了帮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克服其缺乏进步的政治工作、脱离人民、官兵对立的弱点，促使其走向进步。毛泽东即将此任务交给罗瑞卿。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写书，毛泽东让他住在自己隔壁的窑洞里。罗瑞卿聚精会神，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完成了书稿。

这本书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思想，比较详尽地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十一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全书共20万字，分为八章，即：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

作的组织问题。

书稿写完，并经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委员会审阅后，罗瑞卿又抱着厚厚一摞稿子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看他捧了一大摞手稿，便高兴地说道：“哦，大功告成了？”罗点点头，想请主席题写书名。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题写了书名。从1938年2月至8月，延安《解放》杂志分六期选载了本书的有关章节。1938年11月，罗瑞卿又作了一次修改后，交延安的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不久，在国统区也出版了这本书。

**知识青年从全国
各地蜂拥而来，
罗瑞卿兴奋地说：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同时成立了“抗大同学会”。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了词，重申了抗大的校训。3月30日，毛泽东又为抗大干部讲话，他说：“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三万人。”毛泽东还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讲了话，他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挖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从5月到8月，由八路军驻武汉、西安等办事处介绍来的革命青年即达2288人。第四期共有学员5562人，相当于第三期的十倍。其中有作曲

家郑律成、贺绿汀；有演员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等；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子弟，如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张作相之子张蔚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冯玉祥之侄冯文华、傅作义之弟傅作良、赵寿山之子赵元杰，武昌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之子、曾留学日本的黄鼐。此外，还有5名国民党的县长。在学员中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以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国际友人。面对抗大这一兴旺发达的局面，1938年6月，在纪念抗大成立二周年的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为了适应学员急剧增加的形势，到第四期教职员增加至1386人。

在这些教员中，给罗瑞卿印象最深的是满脸络腮胡子的郭奇。直到1963年3月，他在军事学院的一次干部座谈会上还说：“办学校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郭奇同志。郭奇同志是我们延安的‘马克思’，教了很久的马克思主义。他长了很多胡子，看形象大家就叫他‘马克思’。他至少应该是马克思的学生。”

他还说道：“办学校，我办过几年，开始也是动动摇摇的。在延安时，主席讲过，死了埋在清凉山。”

毛泽东这句话帮助罗瑞卿和许多老干部、教员，下定了长期在抗大从事党的教事业的决心。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和抗大，增强他们和老干部的团结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罗瑞卿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于1939年3月2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在罗瑞卿等的领导下，抗大的新老干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增强。

抗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到处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罗

瑞卿历来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在他的倡导下，抗大从第三期开始就在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这是由红军时期的列宁室改名而来，相当于后来部队基层单位的俱乐部，是在党支部和指导员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救亡室开展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听说抗大基层队成立了救亡室，十分高兴。12月15日，他特为第三大队九队救亡室亲笔题词：

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救亡室成立后，戏剧歌咏活动都比较活跃。三大队九队有一批文艺骨干，其中有左明、张平、莫耶和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这个队在“一二八”运动会及戏剧、歌咏比赛中都得了第一名。

从这时开始，抗大的歌咏活动便开展得如火如荼。每天起床号一吹，校内就歌声四起。不仅起床后唱，出操行军唱，上课前也唱。尤其是开大会听毛泽东等领导人做报告之前，队伍一带到会场，便你拉一个、我拉一个，你唱《到敌人后方去》，我唱《毕业歌》，此伏彼起，形成了热烈的歌咏比赛。第四期第三大队的指挥是一位英姿飒爽女同志，她叫黎琳，后改名张露萍。她最爱指挥唱的歌叫《到敌后干一场》。后来她未去敌后，却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做地下工作，不幸壮烈牺牲。

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致电西安、武汉、河南、

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指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不限名额，来者不拒。由于抗大大门敞开，外地学生如潮水般涌来。到1938年12月，第四期结业、第五期开学时，抗大师生员工共达一万人。

“委员长”不发大洋了， 怎么办？

193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北门外广场召开的抗大干部大会上，专门讲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他说：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接着，他分析了当时延安面临的物质困难以及对待这些困难的办法。对此，罗瑞卿在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回忆道：

在延安时，何应钦不发大洋，“委员长”也不发大洋了，怎么办？毛主席在抗大演讲，提出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是饿死；第二是解散，不发大洋，没有津贴么；第三个办法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手拿镢头是可以开荒的，这个叫自力更生。

抗大全体同志立即起而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作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每人开荒两至三亩，共开垦两万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和绑腿，做到自给；全校肉、菜亦由学校自己解决。在生产期间，全校取消炊事员。各单位由学员轮流

做饭，将全校炊事员集中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开办“抗大农庄”。在生产方面，除开荒种地外，还要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厂，并自制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用品。

要开荒，首先要解决工具问题。要打上万把镢头的铁，延安一时还解决不了。于是向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求援，很快，铁陆续运到延安。抗大人才济济，几位曾当过铁匠的师傅一教，到处都可听到叮叮铛铛的打铁声。时间不长，学校便给每位学员发了一把镢头，同学们都将其称为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武器。

4月20日，在罗瑞卿等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全校教职学员、男女老少都扛起镢头，向荒山秃岭进军。有的大队干脆就在山上安营扎寨。4月25日，全校基本完成开荒任务，荒山很快便被披上绿装。

开荒任务基本完成后，罗瑞卿在抗大召开了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并邀请毛泽东出席讲话。毛泽东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是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抗大所开两万亩荒地，共收获粮食100余万斤。成绩巨大。

1939年5月26日，抗大三周年纪念即将来临。毛泽东撰写了《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发表于当日《新中华报》，指出：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

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罗瑞卿也发表了《纪念抗大三周年应有的认识》一文，他写道：

抗大是适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是一个大时代的历史产物，是在极端的困苦的条件之下与难于设想的艰难状况中成立起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的。三年以来，它在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并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而且获得了极其重大的成绩。经过它的培养与鼓励，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去到各个抗日的前线。本着时代的要求，它创立了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并掌握了最合理的教育方法与学习方法。它表现着许多优良的特点与作风，诸如教学之间的一致、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它特别着重于实际的锻炼与实际的教育，特别着重于培养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作风，以及广大学生在自觉的基点上一面学习，一面劳作。可以说它已经在企图开始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现象。所有这一切，世界上除苏联而外，都是任何其他学校所寻

找不出来的。

6月1日，在延安南门外抗大总校校部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出席了大会。大会举行了阅兵式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都肯定了抗大的成绩和功劳，声讨了国民党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和企图妥协、投降的投降派。

随后，抗大全体人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和向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献旗的仪式。当晚举行了营火晚会。这一庆祝活动连续进行了4天，白天举行运动会，晚间举办晚会，同时还举办了有3000多幅图片的抗大成绩展览会。

抗大三年来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与罗瑞卿的领导分不开的。“七七”事变后不久，校长林彪即赴前方。1938年3月1日，林彪路过山西隰县千家庄时，阎锡山部队士兵看到他及随行人员均穿日军大衣，骑日本马，以为是日军而开枪射击。林彪被误伤，返回延安养伤，曾在抗大小住。5月2日，他曾对抗大全体教职员发表演讲。他说：“我回来以后，对于学校有许多新的感想，感觉到学校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克服困难，表现在创造性方面。”接着他列举了学校在挖窑洞以解决校舍、培训大量教员和筹措经费三个方面的成就，随后说：“今天，我们学校能够克服许多的困难，能获得许多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全体学生的努力，由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是由于学校的主持人罗瑞卿等同志的努力……”5月22日，林彪在全校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指出：“张如心、苏振华、杨兰史、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诸同志，都是很好的模范，特别是

主持学校全面的罗瑞卿同志，他始终有高度的责任心，有办法的，他以身作则地领导全校干部去克服一切困难。”

他率领抗大， 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第一、第二分校迁往敌后。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指出：“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翌日，罗瑞卿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阐述了这一决定的意义。他说：“第一，我们的东迁，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

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位’，而且在他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们后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国民党的许多学校都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我们却向着敌后挺进，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争，还可以办学校，不仅办抗大分校，还要办抗大总校，这是非常使人兴奋的。第三，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磨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创造一党势力，专事在后方宣传。我们现在到前线去，正是给他们一个回答，让那些顽固分子睡在被窝里逞英雄吧！第四，抗大上前线，也给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滥炸我们的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企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罪行，一个坚强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力条件。总校到华北去，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



1937年5月27日罗瑞卿（后排左二）与抗大篮球队合影

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中共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等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之前的整编。抗大总校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共有5000余人。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4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

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延河边杨柳依依。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一万余人，在飞机场冒雨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对欢送群众简短致辞：“日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后去坚持抗战！”

罗瑞卿的告别辞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抗大的队伍在锣鼓声中和此起彼伏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出发了。

8月初，纵队分批乘船渡过汹涌澎湃的黄河，到达晋西北根据地。在兴县进行休整后，即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独立第一团护送东进。

同蒲路两侧为敌占区，据点林立，铁路已被严密封锁。

过铁路这一天，部队急行军150里。150里走下来，许多同学尤其是体弱的女生都走不动了。于是男同学便两个架一个，冲过铁路。第一梯队刚过完，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又改变地点过路。

据当时在抗大政治部任干部科长的李志民回忆道：

在1939年7月总校挺进敌后

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线时，罗瑞卿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

当时在抗大三大队任教员的徐懋庸回忆过同蒲路：

在过铁路的时候，我们这些初次在枪声中紧张行进的人，是不免有点慌张的。但当看到罗瑞卿校长站在铁路上，鼓励大家“快跑”前进的时候，就安心了。

当时在抗大一大队当排长的平浪回忆道：

我带着一个女生班，那天晚上跑了一百八十多里路，那些女同志真不简单。我们下午五六点钟出发，走到晚间十一二点钟时，大家觉得很累，就休息一下，喝点水。接着通过封锁线，不是一般的行军，开始小跑，后来就大跑。我们赶到铁路线时，快两点了，也没月亮，一点都看不清，只有铁路很长很长，两旁有人站岗。有个个子高高的人在讲话，从讲话的声音我听出是罗副校长。他说：“同志们，现在这儿就是封锁线，大家要跟上，听到打枪也不要停，两边有部队掩护，我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大胆走吧，不要掉队！”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罗副校长这么高的领导，亲自看着我们过封锁线，还向大家做宣传鼓动工作，那我们还怕什么？

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张铮回忆：

我们过铁路时，很疲劳，许多人拉着棍子。罗副校长站在铁路上对我们说：“看你们没精打采的，像个叫花子。快把棍子扔掉，大胆往前走！”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脚底下又有劲了。

当时抗大一大队的宣传干事牛克伦回忆：

通过敌人封锁线是最紧张的时

刻。罗副校长本是跟着第一梯队走的，但每一个梯队过封锁线时，他都在铁路上站着，并不断嘱咐大家：“过铁路了，大家快走！快走！”直到把三个梯队都送过去。

9月底，“青年纵队”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胜利完成了东进的第一阶段的任务。

10月7日晚间，晋察冀军区在和家庄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由冀中转移到冀西，欢迎罗瑞卿、成仿吾等率领抗大、陕公师生来到晋察冀军区。会前，聂荣臻让多准备了几个菜，算是为贺龙、罗瑞卿等接风。席间，聂荣臻、贺龙、关向应都向罗瑞卿、成仿吾反映了缺干部的困难，希望能多输送一些干部给他们。晚7时，欢迎大会开始，聂荣臻在大会上说：“罗校长、成校长带着数千名优秀的青年师生，从延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边区，和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是培养干部的英雄，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欢迎！”

在大会上，罗瑞卿继贺龙之后讲话，表示要同边区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

抗大有一支篮球队，一二〇师也有一支战斗篮球队。两队比赛，贺龙、罗瑞卿必定到场助威。贺龙发现抗大球队有几把好手，立即向罗瑞卿提出：“某某号给我吧。”罗瑞卿摇摇头：“不行，这是我们的主力。”但是，事后他还是把好手调到一二〇师。

1940年1月1日，抗大第五期毕业，在张家庄举行了元旦团拜，贺龙、关向应都参加了团拜。罗瑞卿讲话时首先调整好队，然后说：“同志们，现在面向西，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南，向新四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东，向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八路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北，向在东北坚持抗战

的抗日民主联军健儿拜年，鞠躬！”团拜方式新鲜，全场为之鼓舞。

团拜后，总校领导即将13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师工作，6个连队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抗大总校余下的人员于2月10日从陈庄出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于26日到达武乡县的蟠龙一带，即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约30个县，行程约3000里，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总校和各分校在各敌后根据地就地招收学员，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封锁陕甘宁边区使抗大生源断流的图谋。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校由沿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与此同时，抗大总校和分校却逆向东行，向敌后挺进。这一点无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对此，罗瑞卿于1940年3月25日，撰写了《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专门阐述了这一问题：

我们抗大的主要部分已经在敌人后方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旗帜已飘扬在全华北的每一块抗日根据

地。

它转移敌后，将吸引着广大青年站在坚持敌后抗战的岗位上，与敌寇进行坚决斗争，它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干部的需要。

七七事变以后，敌寇到处轰炸学校，摧残文化，企图毁灭我之民族精神。把抗大以及我党领导的许多学校，建立在敌人后方，乃是对敌寇的此种暴行最有力的回答。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出这样光辉的创举。

（责任编辑 王恂）

现代经济生活的导向 现代人的阅读爱好

欢迎订阅《中国市场经济报》

《中国市场经济报》是由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一份具有现代风格和超前意识的综合经济类报纸。她以推动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己任，多角度、全方位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现象进行及时、准确的追踪和报道。

《中国市场经济报》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现代人的经济生活，融汇国际大市场，抓住经济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难点和冷点做文章，集理论性、实践性、探索性于一身，以鲜活的事例、透彻的分析、贴进的形式实实在在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中国市场经济报》把工商企业、党政机关、经济研究和管理部門、一切从事经济工作以所有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人士作为自己

的服务对象。

《中国市场经济报》对开八版、每周三、六出版。辟有“要闻”、“决策”、“法律”、“财金”、“谋职”、“商情商机”、“行业”、“韬略”、“中介”、“思路”、“区域”、“文萃”、“环球”等重要版面。1996年保持原价，版面和内容都有较大改进。

《中国市场经济报》国内外公开发售。邮发代号1—208。零售价每份0.60元，月价5.10元，全年价61.2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外发行总代理：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际邮发代号02108WT。

地址：北京海淀区复兴路83号

信址：北京3951信箱

邮编：100039

电话：(010) 6706405—213, 214

邹韬奋与周恩来 忧时救国 成知己

●穆欣



今年11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的百岁华诞。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病逝，他在临终前口授遗嘱说，他逝世后“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9月1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唁电中说：“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这事曾使许多人深受感动。但是，韬奋并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选定共产主义，并非在弥留之际才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毕生奋斗中，曾经长期和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置身于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

在同共产党人交往中，韬奋接触最多的党的负责人是周恩来，特别是1938年末至1940年初，在重庆的两年多时间内，韬奋经常得到他的关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并且负责党的文

委工作。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斗争中，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友谊。韬奋在弥留时刻，还不断地呼喊着“周恩来”的名字，向守护在身边的同志和亲人说：“恩来同志是我平生最敬佩的朋友！”

他早就选定 中国共产党

韬奋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有了接触。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和他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得到党的关怀和支持，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深得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赞赏。早在1933年，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曾经得到瞿秋白的热情关注；1936年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又得到刘少奇的热诚支持。

1936年7月15日，韬奋与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救国会的抗日救国主张。文章公开响应中国

共产党的号召，赞同并支持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这篇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

这篇文章传到陕北苏区后，毛泽东于8月10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写信给韬奋等4位和救国会的全体会员，充分肯定他们的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中国共产党愿与救国会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党派、组织和个人合作。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9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韬奋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附上我们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

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信中还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

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带着这封信和毛泽东同一天写给宋庆龄的信，离开陕北苏区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韬奋和救国会就同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开始有了直接联系。韬奋和党的关系日益密切，遇事和党商量，尊重党的意见，同党员相处也很融洽。在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里面，这时有不少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国民党特务经常向他提出警告，有时提出名单来恐吓他。韬奋不仅没有被吓倒，还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们。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他就赶快把受到逮捕威胁的同事偷偷送走。他虽还没有参加党的组织，思想上早已选定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间，韬奋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捕，敌人想用一顶“共产党”的红帽子来陷害他（当时对共产党是要杀头的）。韬奋毫无所惧，他在狱中写的《经历》里面，就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以被戴上共产党的帽子为光荣。他说：“其实戴帽子也不一定是丢脸的事情，有害尽苍生的党，有确能为大众谋幸福的党；前者的帽子是怪可耻的，后者的帽子却是很光荣的。”又说：“我的立场即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这个党了，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

的。”谁都可以看出，这里指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书店要向游击区谋发展

1937年7月底，韬奋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爆发。这时他对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已经非常明确，再没有一点犹豫动摇的余地了。他立即站到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地响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并且深信这是能够引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从此献身于争取民主政治和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事业。

韬奋于1936年在上海见到潘汉年后，虽然已与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开始有了直接联系，但是直至1938年到了武汉，他才有机会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见面。他同周恩来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从武汉到重庆，韬奋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他热爱党，信服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表现出衷心的崇敬和爱戴。他对周恩来更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异常钦敬，从此推心置腹，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信赖的亲人，最诚挚的朋友。

无论在武汉或是重庆，韬奋和周恩来都有许多直接来往，从他那里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周恩来的帮助。特别是到重庆以后，在当时著名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经常出现韬奋的身影。他经常到这里提出政治问题请教，及时得知党中央的最新指示，特别是有关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各种决定。有的时候，邓颖超出面邀请韬奋夫人沈粹缜一起到家里“作客”，在她自己的房间叙话，让韬奋同周恩来在客厅里畅谈。

韬奋对于党所领导的敌后各解放区的民主建设，十分向往。1938年10月，他就曾经向党提出要求：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以便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工作。他的要求得到党的赞赏和支持。这年12月间，和韬奋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李公朴访问延安时，生活书店西安分店一位工作人员杜国钧化名“杜绝”随同前往。他们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具体地提出了书店工作的方针。1939年3月18日，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内部油印刊物《店务通讯》第14期中，以《毛泽东先生在去年答复杜绝先生的问话》为题，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对出版工作的意见。其中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终不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变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与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比较韬奋当时所期望的要宏伟得多。毛泽东的预见，后来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他对出版界所提出的战略部署，即于1939年到1940年由周恩来亲自作了具体安排。1940年夏，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邀请生活书店、读

钟毓先生

在抗战时期的救国声中，您和先生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

的轱辘先生，已融不融和我们的同志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也是加深的，我们何如道轱辘先生生前在国事，不治在座，由于您的帮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及时彻底地与他的事业和智慧，现在他的一生光辉的智力，已既而获得报偿了。在他的草履，培育了中国人的党，和团结，促进了现在中国（人的胜利），中国（人史一定定是辉煌的，马海德轱辘先生所全心全意寄托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会到之，轱辘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心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指引着中国人前进的道路。——

想到这些，您就亲切地了解了轱辘先生的人，一定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孟德，在进去道得很好的品格和勤快，都使他能在其于他的父亲，这也是一定是您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由你敬衷心的慰问，是祝

您和您的孩子均健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在延安写给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

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店的负责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告诉他们可以民间企业的形式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当年9、10月间，三家书店就派出专人，带了一部分纸型和资金，辗转到了晋东南开设华北书店；以后又派专人前往延安。在重庆的三店负责人，从此也就定期经常碰头，共商三店坚持大后方斗争和继续向敌后发展出版工作的有关问题。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对于书店如何做好隐蔽疏散等工作，周恩来又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同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韬奋和同时到达东江游击区的徐伯昕，共同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机构的布局和工作计划。1942年8月，徐伯昕带着和韬奋商定的方案，从桂林专程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周恩来听汇报后着重指出，在投资合营或化名自营的机构中，务必要区分一、二、三三条战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

严重的损失。生活书店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具体意见，作了具体的部署。

周恩来还亲自帮助韬奋对生活书店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和党支部成员做思想工作。1939年，重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包括重庆分店），由于支部的党员中有些“左”倾关门主义思想，在团结某些党外人士方面存在缺点；还有一部分党员，不安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想去延安。韬奋作为全店的领导，对此感到为难。有一天他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谈话，把店里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请教”。这事以后被周恩来知道了，便于1940年3月间，召集店支部负责人张锡荣、李济安到他那里谈话，要他们汇报最近半年来生活书店的情况。当听到书店选举领导机构成员，青年人占多数，经验丰富的中年人占少数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落选人的姓名、职位和经历。他说，书店的工作人员，不论党内党外，都是做革命工作的，一定要做好团结工作。谈到书店有些小青年想去延安时，周恩来来说，生活书店的事业是整个

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加生活书店就是参加革命。你们要向青年人宣传这个道理，方式要巧妙，要暗示，使他们了解工作的意义。了解了，他们就安心了。党员干部，如果不是由于暴露了身份、无法再在重庆工作，都不要去延安，应当在大后方坚持下去。当谈到生活书店受到国民党压迫的种种情况时，周恩来说：可能还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会吃大亏。书店应分一部分人带着纸型和书籍转到边区去，到敌后游击区去，在那里开展文化工作。留下的，也要将一部分人和财产分出去，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建立第二道阵线，要隐蔽，不露锋芒，长期埋伏，保存起来，等待有利时机。这样，留下的只是一部分人，坚守少数重要的机构，在进一步恶化的局面到来时，可以减少损失。总之，革命的道路曲折，要根据具体情况保存自己，战胜敌人，讲究斗争艺术。并当场作出决定，书店党支部改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直接领导。周恩来说：“今后有什么事，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如我不在，可以找徐冰同志。”自此以后，韬奋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党员干部的关系更亲密了，工作上也配合得更加协调。尤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生活书店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党支部全力协助韬奋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尽量做到保存力量，减少损失，克服了当时的困难。

生活书店管理处每月举行的茶话会，周恩来也常应邀出席。他总是面带笑容，像谈家常一样，纵谈当前的形势，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每次都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一次茶话会上，他对书店的职工说：“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我们说，三民主义就

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我对他们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孙中山先生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了‘的’字，为什么不对？”大家听了哄堂大笑。他接着说：“国民党又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下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又引起哄堂大笑。他还谈到共产党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又是一阵会心的微笑。这种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而又富于说服力的讲话，使大家感到心里亮堂，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每次讲完话，他总要同韬奋细语告别，在热烈的掌声中，韬奋伴送周恩来离开会场，目送他的汽车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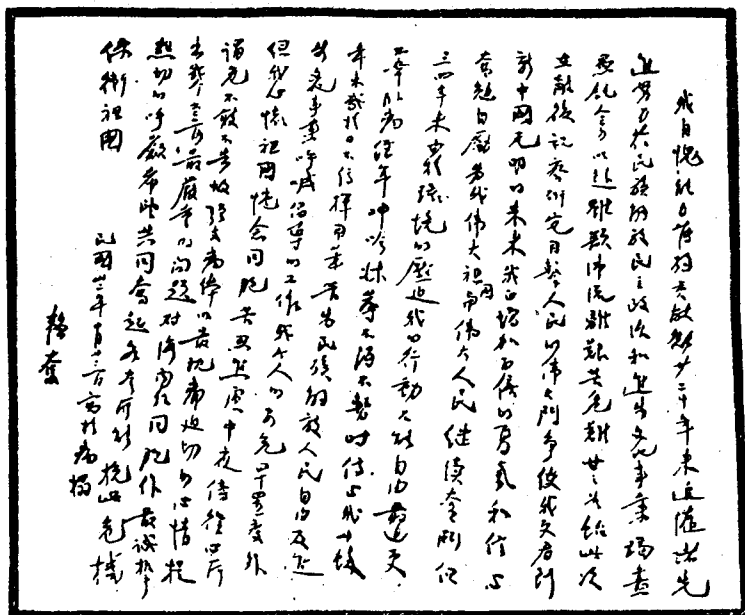
曾在武汉、重庆常住的董必武、叶剑英、徐特立、博古等，也都曾应韬奋的邀请，到生活书店作过报告。

周恩来说： 你以民主人士身份 进行斗争作用更大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韬奋那时尚未参加党的组织，但是他的一切言行都是听从党的安排。在汉口和重庆，他曾多次向周恩来要求参加党的组织。周恩来说，你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比以共产党员身份起的作用大不一样。1938年底，有一次在曾家岩同周恩来会见时，韬奋又提出参加党的要求，周恩来仍然劝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做工作，并且诚挚地对他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韬奋非常出色地执行了周恩来的嘱托，自觉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助手，和共产党人密切配合，共同作战。他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斗争，一方面和国民

党统治阶级坚决斗争，同时还要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动摇投降分子进行斗争。他在这个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有力地揭发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一面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貌。

在当时的尖锐斗争中，不论碰到什么情况，韬奋都记着周恩来的嘱咐，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和特务分子、国民党的政客、官僚等相周旋。1940年7月，国民党特务丧心病狂，一度造谣说邹韬奋和沈钧儒等要在重庆“暴动”，妄图以此制造血案，残杀无辜。霎时，在韬奋所住的“衡舍”门口及附近，有不少国民党军警特务来来往往，监视他的行动。夫人沈粹缜有一天对韬奋说：“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环境不好，文章不能好好写，话又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韬奋说：“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虽然不能用枪杆，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对敌人更坚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



邹韬奋手书：《呼吁》一文的最后一节

要去的。”历史实践证明，周恩来纵观全局，高瞻远瞩，做出韬奋暂不入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韬奋的特定岗位和特殊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

韬奋当时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参加共产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党的主张完全一致。他在这个时候，绝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在国共两党之间，站在“中立”的地位，抱着“中立”的观点，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做事情看“行情”，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留“后路”，而且是一遇到困难就动摇。与此相反，韬奋坚决地无条件地靠拢党，遇事找党商量，尊重党的意见，并且努力使党的主张变成自己的实践，严格地用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他虽六次流亡，一次坐牢，依然表现了百折不挠、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

这个时期，韬奋遭遇了一生最痛苦、最不容易忍受的磨难，但他表现了无比勇敢坚强的战斗精神，不管碰到多么大的风暴，他从没有向暴力屈服、向敌人低头。国民党当局对韬奋的迫害，在1941年春晚南事变以后达到了顶点。他和数百位同仁历时多年惨淡经营、艰苦发展起来的出版事业，被国民党一个个地相继毁掉。有一天，他曾接连收到8处书店被封的电报。这时情况十分清楚，如果不向国民党当局屈服，全部事业就要被毁。韬奋坚持革命立场，和党采取完全一致的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41年2月10日左右的一天晚上，韬奋和夫人沈粹缜一起去曾家岩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因为在上清寺通往曾家岩的街道上，日夜都有特务坐守，他们改从国民政府旁边的一条小路，走过小土丘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韬奋和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他们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韬奋一面公开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一面作了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去，将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移往香港。

1941年2月25日凌晨，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并于3月5日飞抵香港。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韬奋庄严地声明：“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

在香港，韬奋所进行的抗日宣传工作，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注。这年12月间，香港沦陷，党即设法营救陷入虎口的大批进步人士。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之始，周恩来即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帮助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香港，特别提出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等人离港。次日，周恩来又电廖承志等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帮助在港朋友撤离方向及具体办法。韬奋听说远在重庆的周公，为了解救他和香港的一批进步的文化界人士脱离陷阱，经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紧急谋划的时候，深受感动。1942年1月，韬奋经党营救，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鉴于国民党特务对邹韬奋、柳亚子等缉捕甚严，周恩来于2月间特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接待邹韬奋、柳亚子等要“指定专人负责”，“以免暴露”。其后当他得知国民党当局已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负责人连贯：一定让邹韬奋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连贯通过当地党组织，让邹韬奋暂避于梅县江村。7、8月间，国民党派特务头子刘百闵到广东探寻邹韬奋踪迹。周恩来闻讯即派人告诉邹韬奋说：隐居在广东乡间，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事业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考虑是否前赴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韬奋欣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9月下旬便同从桂林派来的一位书店同事离开梅县，经过上海，辗转进入苏北解放区。不幸，韬奋这时已经患了癌症。

周恩来时刻关注着韬奋和他的事业，他虽然很忙，还常挤出时间阅读韬奋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韬奋亲手培植起来的“生活作风”。1938年在武汉，有一次就创办一张报纸的问题跟党内新闻工作者谈话，周恩来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在韬奋的著作中，周恩来特别推崇《萍踪忆语》。韬奋记述：“周恩来先生一次偶然和我谈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危险往美国南部一行……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不但视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一番苦工的。”周恩来的关怀和推崇，给在国民党压迫下艰苦奋斗的韬奋以无比的鼓舞，使他在斗争中增长勇气，在敌人面前表现得更加坚定顽强。

“恩来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韬奋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在长期共同斗争中，他同周恩来结成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当着他在遭受敌人通缉，隐名埋姓流亡的途中，在癌症的病痛折磨中，一直有一个光辉的名字铭刻在他的心头，这就是“周恩来”。

1942年冬天，韬奋辗转到达苏北解放区，病痛的折磨日益加剧，又遇到敌人的残酷“扫荡”。当他带病前往各处参观的时候，经常流露出对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景仰，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崇敬和爱戴，特别念念不忘的是真诚的朋友周恩来，时常不知不觉地呼唤：恩来同志，恩来同志！以后，韬奋回到敌人占领的上海治病。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在弥留时还特别谈到：“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韬奋忍着极度的痛楚，顽强地同癌症进行了一年多的搏斗，延至1944年7月24日早晨7时20分，在上海与世长辞。当感到生命垂危的时候，韬奋的心念转向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转向他衷心崇敬的中共中央。一桩未了的平生大愿激励着他，使他在临终口授遗嘱中正式向党提出：请求追认入党。中共中央接到他的遗嘱，立即复电韬奋的家属：接受韬奋的请求。韬奋经过周恩来长期鼓励、帮助，其生前日夜牵挂的夙愿终于实现。

韬奋逝世的讯息传到延安的时候，周恩来倍感哀痛，对中央追认韬奋入党深感欣慰。1944年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在重庆举行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周恩来、邓颖超送的挽联写道：

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

救亡团体，
力争民主，
痛括独裁，
那怕冤狱摧残，
宵小枉徒劳，
更显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
开国事会议，
建联合政府，
准备反攻，
驱逐日寇，
正待吾曹努力，
哲人今竟逝，
倍令后死伤神。

10月11日，周恩来在延安召集博古、吴玉章等，发起组织邹韬奋同志追悼会筹委会，讨论追悼事项，议决纪念办法。会上，周恩来

热诚赞扬了韬奋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主张，指引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说：“我国有两个青年领袖，一个是恽代英，他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邹韬奋，他现在逝世了，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损失。”还说：“多年来，邹韬奋同志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奔走呼号，舌敝唇焦，动员人们起来救亡图存，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拥戴和热爱。他是继承恽代英同志的真正的青年领袖。”他再次谈到韬奋

这是先生所感动的地方。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爱人民，真诚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正是

毛泽东在邹韬奋逝世后题词

游历考察欧美所写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说：《萍踪忆语》是观察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美国的结果，对它的分析认识很深刻，是难得的一部著作。会后，他还亲笔修改纪念和追悼办法，加上“提议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一句。1945年9月12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周恩来写信给韬奋夫人沈粹缜，表示慰问。信中说：“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

(责任编辑 焯然)

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唐群英

● 经盛鸿

湖南女杰 辛亥功臣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反清革命民主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

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是谁呢？有人以为是秋瑾，不确。秋瑾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大约半个月，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参加同盟会。在她以前，已有一位湖南籍的女留学生先行宣誓入盟。此人就是民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杰唐群英。

唐群英，湖南衡山人，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一个官僚豪门之家。其父唐少垣少时投湘军，武力过人，随部队东征西讨，后以军功官至提督，诰封一品。但唐少垣少时无学，老时颇悔，退隐后孝亲课子，尤重延师教育儿女。在父亲的严格督责下，唐群英自幼攻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精学诗文，年方十五，便能咏出“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引起父亲的惊异。其父慨然长叹曰：“尔如许聪敏，若男儿光门楣也。”年幼的唐群英亦以自己不能易髻而冠干出轰轰烈烈事业为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大量传入我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古老腐朽的封建堡垒。湖南为中国新旧思想文化冲突斗争最剧烈的地方。唐群英学习了新学，眼界豁然开朗。她决心不再当传统的旧式闺秀，毅然冲破层层束缚与阻拦，于1904年走出家门，离开家乡与祖国，跨海东渡日本留学。她是中国近代最早出洋留学的女留学生之一。

唐群英到日本后，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探求新知识新学问；另一方面，关心时局，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与方法。她很快就被以孙中山为代

表的反清革命民主运动所吸引。当时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很多，思想与活动又最活跃，革命气氛最浓，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唐群英和他们朝夕相处，声气相通，思想变得更为激进，很快成长为第一位女革命党人。她曾协助黄兴、宁调元等人，办湖南留日学生革命刊物《洞庭波》。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她是第一位加盟的女会员。

1908年，同盟会因要在国内各地发动武装起义，派唐群英回湖南活动。唐群英临离日本时，孙中山特写一首五言绝句赠给她，以壮行色：

“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

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

孙中山所说的“陈癫”系陈树人的戏称，同盟会革命党人，当时正在长沙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孙中山要唐群英回湖南后，先与陈树人联系。唐群英得孙中山诗后，立即慷慨作答，其中有这样两句：

“欲展平均新世界，

安排先自把躯捐。”

唐群英向孙中山表示，为了实现同盟会三民主义的纲领与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情愿首先献出自己的生命。唐群英回到长沙后，即与陈树人等人取得联系，密商革命工作。她还先后前往上海、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来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唐群英只得再次赴日继续中断的学业，并任留日女学生会会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唐群英闻讯立即赶回祖国，奔走于上海与湖南各地，联络志同道合的革命女同志，组织起“女子北伐队”、“妇女后援会”、“妇女红十字会”等，“集合女界同志，募集军资义捐金，以为民军后援。”唐群英并亲率“女子北伐队”开往前线，配合与支援革

命军作战，极大地激发了革命军与广大民众的战斗热情。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张继特地写下：“烽烟看四起，提袂自提吾”的诗句，称赞唐群英为革命的巾帼英雄。

1912年1月1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举行授勋大会，向革命有功人员授勋。唐群英在会上荣获二等嘉禾勋章。

女权运动的领袖

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全国民主运动高涨，妇女解放与争取女权的运动一度也蓬勃开展起来。

唐群英联络当时妇女界的进步人士，如湖南的蔡惠（蔡锷之妹）、王昌国、张汉英，福建的林宗素（著名革命报人林白水之妹），广东的徐宗汉（黄兴之妻）、张昭汉（后改名为张默君），江西的吴木兰，浙江的林宗雪、张馥真、沈佩贞，江苏的吴芝英等人，在上海与南京等地，先后组织了“女子参政同志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妇女组织，开会议，发宣言，出报刊，宣传男女平等。并上书南京临时政府，拜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女子有参政权。一时间搞得轰轰烈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中的守旧势力，公然剥夺妇女正当权利，歧视妇女的做法，使唐群英及其女同志十分愤慨。她们一方面继续上书孙中山，指责南京临时参议院，对女子参政“不独不为积极的规定，反为消极的取消”；另一方面，她们结合了几十名女将，于1912年3月19日到21日，大闹临时参议院，给顽固守旧势力以猛烈的冲击。

第一天，即3月19日8时许，唐群英率20多名女将，来到设在南

京湖南路的临时参议院，要求参议院讨论女子参政案。参议院议长令招待员将她们引入旁听席，她们不予理睬，直入议事厅，与诸议员杂坐，就妇女参政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唐群英声音宏亮，众女将紧随其后，“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至中午方才离去。

下午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率众女将复接踵而来。时正逢议长摇铃召议员入席，唐群英等人拉住议员的衣襟在门口辩论，不令入内，据理力争，言辞激愤。最后，参议院为敷衍这些锋芒毕露的女将，乃以“候国会成立，然后解决此等问题，”进行拖延回避。

唐群英等人更加气愤，于第二天，即3月20日，再次结队哄入参议院，寻议员不见，“随将玻璃窗片捣毁”。在参议院值勤的警卫士兵稍有违言，众女将在盛怒之下，以足踢之，士兵竟立即被打倒在地。女将们又将议员们藏于抽屉中的议案搜寻一空而去。

第三天，即3月21日，唐群英召集了更多的女将，约有60多人，佩带武器，前呼后拥，涌向参议院。“议员闻之，竟有惧而逃去者。”议长惊恐万状，一方面令军士紧闭大门，严加防守；一方面打电话到总统府，请孙中山派兵保护。唐群英等人不得入院，即与蔡惠等人来到总统府，再次向孙中山递交请愿书，要求孙中山以大总统的身份提出女子参政案。经孙中山劝导斡旋，唐群英才率众女将离开参议院。

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女子参政运动向前发展，唐群英联络各地的妇女组织，于1912年4月8日，在南京四象桥湘军公所召开大会，统一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大会上，唐群英被选为会长。并通过了十一条政纲，发表了《宣言书》，表示要为女子参政目标奋斗到底，“当挟

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碍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共图之。”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北京，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群英遂率众女同志联袂北上，驻节北京，与北方女界携手并肩，投入新的斗争。她们继续上书请愿，办报呼吁，宣传女权运动。并常常结伴到临时参议院中旁听，激愤时就从旁听席上扔香烟盒之类打议员。

这时辛亥革命高潮已过，领导这次运动的革命党也迅速蜕化。1912年8月，原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合并组织为国民党，民主革命竟至更加衰退，新党纲中竟删去了原同盟会纲领中就有的“男女平权”这一条。当时报纸戏称之为：“五党合并，累及女界”。这更使唐群英激愤异常。她再次亲率众多女同志冲进参议院，找到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进行责问。宋教仁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与宣传鼓动家，并且后来还是为中国近代民主宪政流血的第一人，然而就像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一样，他民主思想也不彻底。他对当时的女子参政问题，采取了冷漠与厌烦的态度。当唐群英向他就国民党党纲删去男女平权条文提出责问时，他竟出言不逊。这使怒火中烧的唐群英犹如火上加油，一时按捺不住，竟伸手打了宋教仁一个耳光。其他女将也呼啸而上，将墨水文具杂物摔了一地。宋教仁不便与她们争执，只得与其他议员慌忙逃走。唐群英与女将们再次大闹参议院，报刊喧腾，轰动一时。

当时孙中山正在北京。他听说上述事项，再次出面调停。他邀请唐群英等人谈话，告诉她们：当时社会上与国民党内反对女子参政的人很多，“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

回。”因此，只责怪宋教仁等人是不足取的。孙中山希望唐群英等女界先进人物，在今后要“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

毕生为女权而斗争

自与孙中山交谈后，唐群英遵照孙中山的指示，踏踏实实地从多方面开展工作，提高女子政治、经济与文化素质，提高女子地位，维护女子权利。

唐群英首先与张汉英等女友，在北京发起开办了“中央女学校”、“女子工艺厂”，吸收各界妇女入校学习，或进厂做工，以求知识增长与经济独立，从而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唐群英又先后领导创办了《妇女新报》、《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等报刊，向社会宣传民主革命、男女平权、女子参政等内容，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1913年2月初，唐群英带领张汉英等人，从北京回到长沙，建立起

“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以求女子参政运动在地方上的发展。她们还创办了《女权日报》，于2月16日发刊，由唐群英、丁云龙、何步兰负责；接着，唐群英又在长沙创办复陶女校，唐自任校长。开湖南女界办报办学先例。唐还要求湖南省政府考选女学生赴日留学。湖南省政府对报名留日的女学生进行考试选择时，唐群英亲到考场监试，结果有4名女学生被录取。

1913年3月，长沙发生了“女国民会”强占“秋瑾烈士专祠”的事件。唐群英得知消息后，因自己一时事急不能分身，遂由其女友张汉英率“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女会员赶往烈士祠，与“女国民会”据理力争，竟至动武。最后由湖南督军谭延闿出面调停，将秋烈士祠恢复原貌。

1913年7月，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二次革命”，在长江流域各省展开。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迫停止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党人纷纷避往国外。唐群英也被袁世凯在湖南的爪

牙列入黑名单。但她不为所惧，继续留在长沙。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政府以“法律无允许明文”为借口，正式勒令“女子参政同盟会”解散。唐群英与张汉英、傅文郁等人仍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反袁斗争。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唐群英的密友张汉英于1915年秋在湖南醴陵家乡病故。唐群英闻讯恸哭失声，并驰书柳亚子，请其为张汉英作传。唐自己则写了沉痛的《祭张惠风文》（惠风为张汉英的字），刊于《南社》第十五集（1916年1月出版）。

1918年，唐群英回到湖南衡山家乡居住，继续进行发展女子教育的工作。她先后创办了衡山女校与岳北女子职业学校，吸收当地女子进行培养教育。唐群英一生献身女子教育事业，直到1937年6月3日她65岁时在家乡病逝。

唐群英病逝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戴传贤、张继、覃振等人均唁电悼念。报刊上有人撰文称赞她为中国五千年来妇女界之曙光，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是当之无愧的。（责任编辑 孙 申）

欢迎订阅《世纪》(双月刊)

全国邮局征订

刊号 ISSN1005-4715
CN31-1654/K

邮发代号 4—557

每册定价：4.00元

全年订费：24.00

透视人生 俯瞰风云 驾驭浪潮 其乐无穷

《世纪》杂志由我国著名作家冰心、萧乾任编委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是一本集新闻性、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双月刊。

主要栏目有：世纪特稿、史卷拂尘、名流综谱、国共舞台、黑匣曝光、百年留真、故人旧事、人间杂谈、笔记掌故。

国际标准大16开本，64页，每逢单月15日出版，国内公开发行。

为了便于读者收藏，本刊精装少量《世纪》合订本，可直接向本社邮购，本刊自1996年改为邮局发行，新老读者可向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本刊发行部随时办理逾期补订和邮购。

地址：上海市复兴中路529号《世纪》发行部

邮编：200025

电话：(021) 4740822 开户银行：上海市工行卢办复分处

帐号：208—14469272

常书鸿 一生心血倾注敦煌

● 方 约



青年时代的常书鸿



晚年的常书鸿

艺术家与科学家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为了追求真理，探索新路，对所从事的艺术或科学事业，其执着的精神与追求的热情往往达到外人难于设想的程度。他们有一股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可爱可贵的痴情傻劲。社会靠他们的努力而飞跃发展，人类的精神文明靠他们的奋斗得以发扬光大而留传后世。

画家常书鸿酷爱敦煌艺术，痛惜它任意被外人盗窃掠夺，横遭摧残。他领导一些人对这座民族艺术宝库进行保护、整理、研究，历尽艰辛，数十年岁月，始终如一。他那爱国之心，热爱民族文化的精神，虽多次遭遇挫折，仍坚贞不渝；宁愿长期住在戈壁滩上，过着孤独寂寞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那种与艰苦环境奋战的意志，实在令人钦佩。

一个偶然的机，一本《敦煌石窟图录》， 使他毅然告别巴黎，返回祖国

常书鸿 1904 年出生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从小喜爱绘画。他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染织科毕业后，1927 年先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法国，后来考上官费，在法国学习油画，住了 10 年。他最初以油画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又以油画作品《梳妆》获得第一，被选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师劳朗斯画室继续深造。

常书鸿喜好艺术，同时也热爱祖国。1931 年秋，“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接着，日本侵略军向关内逼进。消息传到法国，他看到祖国命运已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于是画了一幅油画《乡愁曲》，寄托他对祖国的怀念。这幅画在里昂获得优秀画奖状。常书鸿在法国学画是有成就的，他所画的《葡萄》、《沙娜画像》、《裸妇》等，都由法国国家收购，现收藏于巴黎近代美术馆或里昂国立美术馆。当常书鸿的画被法国收藏时，国画大师徐悲鸿曾赞扬说：“外国美术馆珍藏陈列常先生作品，此为国人在国外文化界所得之异数也。”

常书鸿在法国刻苦学习，造诣渐深，声誉雀起。1932 年，其妻陈芝秀和

女儿沙娜由里昂迁至巴黎。1934年，常书鸿与一些从事建筑、雕塑、绘画专业的新朋老友成立了留法艺术学会，每个周末或是逢年过节，常家就成为聚会的地方，他在巴黎的艺术生活也是丰富多采的。法国美术馆收藏艺术品；内容之丰富，陈列之井井有条，使他羡慕；法国政府对艺术品之珍视，保护之完善，使他赞赏不止。尽管巴黎对常书鸿充满着艺术诱惑，可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当他发现中国敦煌艺术之后，就毅然决然地舍弃了这一切，告别巴黎，返回祖国怀抱，并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个偶然机会是：1934年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街头漫步，随意遭到塞纳河畔的一家旧书店去浏览。他忽然发现一部由6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辑载有敦煌石窟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这是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从甘肃敦煌盗摄复制出版的。常书鸿爱不释手，却又掏不出100法郎把它买下。后来他从旧书摊主人那里打听到，还有许多敦煌藏经洞绢画也都收藏在离此不远的吉美博物馆中。第二天，常书鸿很早便来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许多由伯希和从敦煌盗出的大量唐代绢画，其中有一幅《慈母恩金经》，时间早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七八百年。常书鸿发现，敦煌艺术人物刻划生动，线条奔放优美，色彩经过千余年仍鲜艳谐和。无论在时代上、在表现手法上，敦煌艺术都显出隽永先进，确是奇迹。在此以前，常书鸿单纯倾心于西洋文化，崇拜希腊罗马；现时，面对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遗产，他深为自己的浅薄无知而感到惭愧；同时也为中国大批珍贵文物让外人盗窃掠夺而感到愤怒和难以容忍，他决心离开巴黎，回祖国去，到敦煌艺术宝库中去。

艺术具有为外行人所难理解的魅力，常书鸿从此对敦煌千佛洞简直入了迷。“要为敦煌献出我的一切！”在回国途中，他发出这样的誓言，而且终身矢志不渝。

于右任对他说，只有爱好艺术的人， 才能在荒漠的石窟中找到快乐和安慰

常书鸿回国第一年，就向艺术界表示：“我要到敦煌去！”但是，那时候，西北军阀仍在混战，行旅艰难；当时的艺术界也没有支持的力量，而国民党政府哪有兴趣去理睬一个画家的要求。紧接着便是“七七事变”，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静放下一张书桌。常书鸿随北平艺专流亡异地，颠沛流离，辗转迁徙；日机轰炸，生命几乎不保，书画全被焚

毁。他要想去敦煌的志愿，一拖就是七年。1942年冬，他破釜沉舟终于踏上了奔向敦煌的旅途。

说来这机会也实在来的太偶然。洛阳龙门浮雕，由贪官、奸商与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陆续被盗往国外，一块巨大完好的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图》被劈成碎片，然后偷运出境。当时各种进步报刊纷纷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揭露和谴责，同时也对敦煌文物累次遭受劫掠和破坏的状况，提出质问和建议。历史学家向达先生以“方回”的笔名在重庆《大公报》就保护千佛洞文物问题，大声疾呼，慷慨陈词。随后，正任教于中央大学的贺昌群教授也在《大公报》上作文积极响应。社会上各界进步人士一致强烈呼吁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敦煌千佛洞。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在考察了敦煌、河西一带回到重庆后，亲自草拟《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在“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上提出。国民党政府为了缓和舆论，应付时局，才被迫指令其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过熟人介绍，于右任推荐常书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主任是高一涵，他仅仅去过敦煌一次，不过挂名而已。常书鸿赴敦煌之前，于右任对他说：“这是一个不易久居的地方，所以我要找你们艺术家去担任经常的保护工作。因为只有爱好艺术的人才能从富有的千佛洞历代宝藏中用安慰与快乐来抵消孤僻生活的苦闷。”“这里需要对于敦煌艺术具有宗教信仰一样虔诚心的人，方能承担起长久保护的任

他在兰州找了几个志同道合者，从 严冬走到来年春天，才到了莫高窟

眼看去敦煌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常书鸿内心充满喜悦。教育部拨发的经费极其有限，筹备款仅有5万元；妻子过惯了城市繁华生活，不愿离开重庆到荒僻的西北边远地方去。但这些困难都动摇不了常书鸿去敦煌的决心。他卖家俱，拼凑行李；他开画展，筹集路费。在离开重庆前，他把几年来创作的40余幅油画，举办了一次画展，筹得了资金几万元，一部分留作安家用度，一部分带到敦煌以备急需，这笔钱到后来真的救了燃眉之急。

在常书鸿举办画展时，徐悲鸿为他的画展写了序

言，并对常书鸿说：“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要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作到底。”还送他一幅《五鸡图》作为常书鸿敦煌之行的纪念。

由于在重庆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1942年冬天，常书鸿由重庆只身飞往兰州。

说来也凑巧，他在兰州街头碰见一位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原北平艺专的学生龚祥礼，他欣然应允随同常书鸿去敦煌；并由龚祥礼介绍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随他们一同前往。另外，经过与甘肃省教育厅交涉，派了一个文书，还指派天水中学校长李赞庭为秘书。又在临时会计训练班招聘一名会计辛德普。龚祥礼在离兰州前三天购置了一些少得可怜的纸笔墨砚和生活用具。有了6个人的队伍，又有了一点家当，简直使常书鸿喜出望外。他说：“在抗战的大西北后方，靠这点东西，只要艰苦奋斗，照样可以搞出好东西来的。”1943年2月20日清晨，他们一行6人身披老羊皮大衣，头戴老农民的毡帽，乘着破旧的敞篷卡车向敦煌出发了。既无人为他们饯行，也无人欢送，但他们的气概是壮烈的，活像要去西天取经的6个“苦行僧”。常书鸿不顾一切，带领这样一支小小队伍要去建立一个举世无双的敦煌研究所了。

从兰州到敦煌要经过武威、张掖、酒泉。三地之间各相距约300华里，走了一个来月才越过长城起点嘉峪关而到安西。安西至敦煌270里，十分之九是戈壁，只能靠戈壁之舟骆驼载行。他们雇了10头骆驼，沿着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以每天大约30里左右的速度慢慢地前进。他们从兰州出发尚是严冬，待到达之时，却已是春至千佛洞口了。

他既为这举世无双的艺术殿堂所倾倒，又为它的屡遭劫难而痛心

敦煌石窟的总名称叫莫高窟，一般通称为千佛洞。这个石窟群开凿在敦煌县城东南40华里的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始建于公元366年（东晋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到唐代已累建大小洞窟1000多个。经过1000多年风沙侵蚀及被盗窃破坏，仍保存较好的洞窟400多个。它是我国石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艺术宝库。

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后，常书鸿等人调查发现，尚有完好的洞窟492个，壁画总面积为4.5万平方米。如果将窟内壁画排成两米高的画面，这个画廊

可长达25公里。可谓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它是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常书鸿以217窟《化城喻品》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乔多蒂画的小鸟说法图相比较，发现乔多蒂在艺术造诣上不如敦煌。而且敦煌石窟的壁画、彩塑、建筑结构、壁画装饰布置及画面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都融合成一个艺术整体，是千余年无数艺术匠师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形成敦煌独有的奇特风格。

解放前的7年中，常书鸿带领少数的人在那里考查了千佛洞的历史，查古籍，考碑碣，记录民间传说；研究壁画的特点风格，图案、色彩、花纹、民族传统技法以及榜书题记。他们摹绘了数以千计的壁画。他们整理洞窟，清除窟前甬道流沙。这些流沙当时请来专家预测，竟多达10万立方米。他们与工人整整干了10个月。此外还修筑窟门，修补颓圯了的甬道、栈桥，筑路栽树。他们修筑起1000米长的围墙和几段防沙墙以阻挡流沙侵蚀和人为的破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把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奥勃力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勾结贪官、奸商盗窃宝物的事实证据都给调查清楚了，以确凿有力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

早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齐以考察地质为名来到敦煌，目睹莫高窟之壮丽，壁画之精美，惊叹不已，称赞备至。过了23年，他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作了关于敦煌佛教艺术报告，于是敦煌莫高窟引起国际上普遍注意。5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雇佣来到敦煌，由不列颠博物院提供经费，要求他将搜掠的古物交该院陈列。斯坦因带着翻译蒋孝琬潜入敦煌。在他们潜入敦煌之前7年，莫高窟发现了石室藏书。关于石室藏书，还要上溯到公元1035年的一桩历史事实。那时，西夏国王赵元昊进攻敦煌，莫高窟寺庙僧众要避战乱远走他乡，行前将佛像、经卷、绣画、文书、杂抄等物，封藏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外面砌土坯抹泥，再绘上壁画加以遮盖。战争过后，那些逃难僧众一去不返，不知所终。这些稀世之宝在石室隐藏了近90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这批文物才被一个道士王圆禄偶然因墙壁裂缝而发现。王道士庸俗无知，他不知道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随便拿出几卷写本送人。敦煌知县汪宗翰稍有知识，对古物也感兴趣，又向王道士要去了一些画象及写本。过了两年甘肃学台叶昌炽取走宋代水月观音象、经卷写本，梵语本。他曾经建议把这批文物运到省城保



常书鸿夫妇在工作中

管，当时估计需用运费五六千两银子。昏庸腐败的清朝官吏重钱不重文物，不肯拿出这笔钱，只下了一道命令，将这些文物依旧在原地封存起来。这个“藏经洞”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里面藏有千百年间有关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包括经卷、文书、图轴等重要文献资料。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较之中国历次文献的发现，如孔壁古文，汲冢竹书，殷墟甲骨、流沙坠简等更为重要。斯坦因探听到了这消息，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偷窃的机会。他采用巧言欺诈，金钱利诱，骗得王道士打开了藏经洞。经过7天翻家，盗走了敦煌文物9000件左右，足足装满了29箱。其中完整无缺的抄写卷子就有3000件左右，另外5箱装的是唐代绢画和其它艺术品。王道士捞到了多少钱呢？500两银子，说是给的“功德钱”。公元1914年，斯坦因这个贪得无厌的盗贼再次来到敦煌，又劫去佛经5大箱600多卷。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他的助手奴奈特于公元1908年接踵而至。虽然迟到一步，可是他懂中文，却劫夺了为斯坦因所忽略了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劫走的语文学和考古学的中文写本，是敦煌文学的精华。伯希和野心不小，竟为石窟编了号，准备再次伸出黑手；他同时偷偷将全部洞窟壁画拍照，然后回巴黎以十几年的时间，编辑成6集《敦煌石窟图录》，其中收集了375幅画片。这便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常书鸿在塞纳河畔书摊上爱不释手而又掏不出100法郎购买

的那套画册。伯希和以50两银子一捆的代价，共劫取了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十多箱，转运巴黎，陈列在吉美博物馆中。常书鸿正因为参观了这些精美珍宝，才动了归回祖国投奔敦煌的念头。

随后而来的，还有日本人桔端起和吉川小一郎。他们于1911年也曾去敦煌劫走了佛经和唐代彩塑。1914年俄国人郭登堡也率领考察队十余人来到敦煌，他们偷绘443个洞窟正面壁画，拍摄了2000多帧照片，劫走了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和写本以及多种壁画片断。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更是胆大妄为，他用化学药品布，剥下20多块敦煌石窟内的唐代壁画，计有32006平方公分的长度；并且窃掠了数尊盛唐时期最优美的彩色塑像；其中一尊是高120公分的供养菩萨彩塑像；《南人行舟图》也是华尔纳盗去的。此人曾经策划将第285洞内的文物与壁画全部盗走，后来是敦煌人民起来制止，他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伯希和等人劫走的大批敦煌秘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惊呼沙漠珍宝惨遭外人之劫掠。清政府乃于1909年正式拨款，命令地方官吏将石窟所遗经卷文物，全部运到北京。在运送过程中，敦煌文物又遭到各级大小官吏层层明取暗盗，运抵京城后寄放在李盛铎私人家中，他把好的卷子偷去，另把一个长卷撕成几段，凑足数目；送进京师博物院时，只剩下残缺不全的佛经8000多件，珍贵艺术品已荡然无存了。

常书鸿等人至敦煌石窟后，花费了无数劳动和心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用不长的时间便临摹了一批壁画，送到重庆办了一个小小的展览会。1948年又在南京、上海举办过敦煌壁画临摹本展览，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国民党政府丝毫不重视，把敦煌研究所看成是多余的、赔钱的机构，曾决定把它撤销。后来经过常书鸿、梁思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多方呼吁，才勉强划归中央研究院管属，但毕竟是朝不保夕，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他单骑夜奔追寻弃他而去的妻子，疲劳、饥饿、焦急使他摔下马背，昏迷过去……

远在西北边陲，地处沙漠的敦煌石窟，生活之苦是不言而喻的。千佛洞周围40里之内荒无人烟，交通极其不便，信息难通。在整个石窟的寺院里，近邻相伴的唯有一个老和尚。思乡之忧愁，孤独寂寞之感，时常萦回在他们的心头。如果有了重病，所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一辆老牛车，送到敦煌也需要6个小时；有了急病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常书鸿的二女儿便是在寻药无门，求医无计的情况下夭折的。

常书鸿承认自己是敦煌迷，早已破釜沉舟，始终不动摇。大画家张大千抗战时期曾到敦煌临摹壁画，临走时，和常书鸿开玩笑说：“我们要走了，而你却要在此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常书鸿笑着回答说：“无期徒刑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

1943年秋，常书鸿将妻女接来敦煌。其妻陈芝秀（以前有人将其姓名误写为叶兰）过不惯这种与世隔绝的类似出家人的生活。她虽也是在巴黎学雕刻的，但不能像丈夫那样成年累月徜徉在艺术之宫里，此时偏又有人从中挑拨，终于抛夫弃子，不辞而别了。这突然爆发的事件，对常书鸿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这一天是中秋节，常书鸿临摹61洞的壁画完毕，回到住处，四处寻觅不着妻子，于是冒着危险连夜骑马追赶。沙漠月夜，四野茫茫，骑马向东急驰，一夜奔驰310里，黎明到了安西，听人说，一个女人搭乘的汽车半小时前开走了。常书鸿再追，追到赤金，仍然没有追上。常书鸿骑着马欲驰往酒泉，这已是第二天，他连夜驰出赤金三里地外，终因过度疲劳、饥饿、焦急等等原因，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昏迷过去了。不久，一辆载着钻探石油的材料车由东向西驶来。车上坐着两人：一位是长期坚持在戈壁滩工作的地质学家沈健初，一位是石油钻探工人傅吉祥。他们急忙将常书鸿救起，重返赤金，经过急救护理，三天之后，常书鸿醒过来了。陈芝秀现在何处？无论如何，追赶不及了，常书鸿感伤、怅然，怆然泪下。1981年，我去看望常书鸿和他后来的夫人李承仙同志，曾提及这个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同时不禁好奇地发问：“陈芝秀现在何处？”常书鸿回答：“听人说，她前年（1979）已在杭州去世了。”谈论之间，常书鸿觉得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自己当时只顾埋头干工作，临摹壁画，对妻子的关心也确实太少了，不应该过份责怪她。不过陈芝秀一生从此丢弃雕塑艺术，常书鸿至今仍然为她惋惜，觉得是一桩遗憾的事情。

在赤金，常书鸿正处在十字路口，怎么办？经过思考，下决心回到那个彩色天地去。他与沈健初、傅吉祥两人素昧平生，现在成为患难之交；在行将分手时，沈健初说：“回敦煌，对你来说，这是困难的……你只是一个人。”常书鸿回答：“一个？不是一个，是千千万万个。千佛洞的壁画上，每一个人都是活的。”随后，常书鸿画了一幅《舍身饲虎图》送给沈健初，借图寓意，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常书鸿在大风沙中又回到千佛洞来了。为了使自已专心一意地工作，他把正在酒泉中学上学的女儿常沙娜接到跟前，学习临摹壁画，照料失去母爱的小弟弟。常书鸿40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似乎犹有余痛。他告诉我说，两个孩子在陈芝秀走了一段时间之后，还到相当远的山岩下去寻找他们的妈妈，他说：“那时是在子女的凄惨哭嚎声中，承受着这场生活中的严峻打击和考验的。”只有敦煌宝库的工作才使他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他说：北魏壁画中有“舍身饲虎”的故事，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支持常书鸿在塞外戈壁滩下生活工作几十年？是什么力量使常书鸿在偏僻荒凉的敦煌，几经动荡、累遭折磨，终能长期坚持下去？请听常书鸿自己的叙说吧：

“当时，我眼前浮现出重庆那些进步人士和至诚友好的热情而殷切的目光；忽而，我脑海中又呈现出那一幅幅丰彩多姿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雕塑；继而，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库呢！在这黑暗动乱的年代，它是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身为它效力的人啊！我深刻感到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宝库，很可能再受万劫不复的洗劫！”

“1945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来了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妻子弃走的折磨刚刚平息，现在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这是致命的一刀啊！……正在这濒于绝望之时，收到张民权的信，他信中说道：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画临摹本，在中苏友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地受到中共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和郭沫若等的参观并赞许；信中还转达了中共领导人以及大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边陲戈壁为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诗篇。……我立即提笔写信，发给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把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希望他们代为呼吁。”

抗日战争胜利，接着而来的是一股散伙“复员”的

狂潮。一些人相继辞职，离开了敦煌。这时，北平艺专给常书鸿寄来教授聘书，聘请他担任西洋画系主任，每月500元，在当时算是高薪待遇了，在北平西京畿道还有一座属于他私有的四合院。但是常书鸿没有为之动摇。他想到在敦煌已和流沙斗争了多年，如果退却，黄沙就会把整个千佛洞全部吞没。于是提起笔来写一篇文章，这就是1948年12月10日至14日刊登在上海《大公报》上的《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危机》那篇长文。他提出与流沙斗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存的问题。他写道：“我决不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我从历史上看到敦煌石窟的繁荣昌盛，为使它不再受毁损，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敦煌石窟的保存和研究而努力奋斗，决不让举世之宝遭受灾难了。”

就这样，常书鸿在黎明的前夜坚持下来了。1944年与1947年先后由成都、重庆来了20多名艺专毕业的青年美术工作者。这批进步的热情有生力的生力军到来，使常书鸿精神大振，增添了坚持下去的信心。在这批青年美术工作者中，现有许多人已成为新中国的著名画家。其中就有《百万雄师渡长江》、《开国大典》以及《春到西藏》诸画的作者。他们也是保护敦煌、研究敦煌艺术的先驱者，他们对敦煌所作的贡献也是不能磨灭的。在这批青年中，应当提一提李承仙。她是江西人，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国立艺专读书。她热爱艺术，热爱敦煌，后来更爱上了艰苦奋斗、矢志与敦煌终生相守的艺术家常书鸿。她成了常书鸿得力的助手和志同道合的伴侣。这弥补了常书鸿心灵上的创伤。新的爱情赋予人新的力量。当我看到他们夫妻二人和儿女四十年代末在莫高窟前的合影时，便意识到这个艺术之家仍然是美满幸福的。

他的毕生期望，只有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后，才得以逐步实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边陲。9月底，戈壁滩上的古城——敦煌解放了。莫高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敦煌解放不久，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立即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被委任为所长。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他离职休养之日。1984年1月15日为适应敦煌文物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研究所扩大编制，由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150人。经费也增加了，经批准，成立了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为敦煌学

精神可嘉可佩
維護歷史寶藏

秦惠若
李政道

七九年五月廿八

李政道、秦惠若夫妇为常书鸿题字

家段文杰。常书鸿虽已退休，仍被尊崇为名誉院长。

研究所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保护，还是敦煌遗书、壁画彩塑图案的整理研究和出版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1951年春，全国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最大的文物展览会，便是敦煌文物展。它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展出，内容包括壁画临摹本及各种文物共计1119件，历时57天。周恩来总理当时曾兴致勃勃地登上城楼到三个展厅逐一参观。周总理对常书鸿及研究所诸同志的工作给予赞扬和鼓励。其后，1955年又在首都举办第二次“敦煌文物展览会”。两次展览，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为表彰全所工作同志在保护敦煌文物和整理研究方面的功绩，特向他们颁发了一笔奖金和一张宽4尺、高2尺的大奖状。敦煌石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周总理亲自批准，由国家拨给一笔巨额资金抢救危险欲坠的洞窟。研究所从北

京请去 100 多位地质勘探、防沙、美术、古建筑各方面的专家和熟练工人，对千佛洞 261 个洞窟、7000 多立方米的档墙、363 米的岩壁作了彻底的加固；同时用钢筋混凝土和花岗岩片石修建栈道和阶梯，人们在巡迴浏览时可以自由自在地安全往返于各洞窟之间。对日益严重的画壁发松、起甲、发霉、脱落等等现象，则采用化学混合液进行处理，加以维护；对残缺之壁画也依次进行修理和填补。所有洞窟都安装了门窗，流沙已经基本控制。汽车代替了木轮牛车，明亮的电灯代替了昏黄的油灯；现代化的新式楼房，光亮整洁，研究人员各有自己的工作室。一个收藏 2 万多张照片和数万册书籍的资料室建立起来了；敦煌遗书的显微胶卷，几万卷各个时代的写经和文书，唐代绢画和历年在千佛洞发掘的文物都完好地收藏在新建的图书馆中。

临摹壁画是保存文物的一种方法。壁画的临摹决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艰巨的艺术劳动，必须表现原作的精神和艺术水平。质量要求高，工作量也特别大。这项工作，自进入敦煌开始，他们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锲而不舍地进行着。如第 285 窟的壁画，是公元 538—539 年西魏时期壁画中的珍品，正是前文所说，美国人华尔纳在 1925 年欲将全部壁画剥下带走的那个洞窟的壁画。研究所 6 个人花了两年时间，按原尺寸、原色彩才完成此窟全部壁画的临摹工作。最大的壁画是 61 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图》，当时尚无电灯照明，李承仙临摹它，上午借用镜子反射日光，下午则是一只手举着油灯，一只手握画笔，如此描绘，费时两年才把它完成。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为数不多的艺术工作者已临摹了近千平方米的壁画和 30 多身彩塑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中，敦煌石窟的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除继续临摹、整理、研究、发掘、修复之外，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资料书籍和有关敦煌知识的普及读物；学者们还撰写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对敦煌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敦煌艺术蜚声中外之时，他却告别人世，他的部分骨灰埋在敦煌一棵梨树下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与长城、故宫、泰山、秦兵马俑、周口店北京猿人并列为我国六大文化遗存，于 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载入“世界遗存名册”。90 多年间，敦煌艺术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研究，如今在全球已形成一门新兴的“敦煌学”。

敦煌藏经洞遗书中的历史资料极其丰富，有的可

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的可纠正史籍之讹误，其中有关我国西北边陲的史地资料，尤为可贵，它能填补边疆史地文献研究的空白。敦煌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佛教、景教、摩尼教都是经敦煌传入中原的。敦煌遗书有关宗教的包括道教的写本特别多，是宗教研究的新材料。其它有关天文、雕版印刷术、医药文献、民间通俗文学、唐代佚诗、音乐等等都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唐代音乐曾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以后就失传了。1900 年从莫高窟藏经洞里发现了 25 首唐人曲谱。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想把它们译成现代乐谱，都未获得全部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叶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 18 年的钻研探索，终于将这 25 首敦煌曲谱译成了现代五线谱，使失传了千年的唐代名曲在 1981 年 5 月“上海之春”音乐舞蹈会上演奏出来；演奏之前，叶栋还作了《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这一成果，当时曾经轰动乐坛。后来，彭松也对敦煌舞谱破解成功。由此可以想见，敦煌文化之光辉灿烂，对我国文化之影响有多么深远广大。

光彩夺目的敦煌艺术，好像是一条长长的纽带，它联系着中外学者，共同去探索宝藏的奥秘，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十多年中，关于敦煌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1987 年 9 月下旬在莫高窟举行了敦煌石窟国际讨论会，有来自英、法、日、美、德、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等国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 83 人与中国学者参加，收到学术论文 56 篇，其后分编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石窟艺术》两册用汉英两种文字出版。为纪念“丝绸之路 2100 年”，1990 年 10 月上、中旬又在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中外专家学者共有 200 余人，超过前次会议人数两三倍。当时已 80 高龄的常书鸿也回莫高窟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共收到论文 120 余篇，已选编成文集出版。

除在我国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以外，常书鸿及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也应邀将敦煌文物、壁画临摹本送往日本、法国、印度、缅甸、捷克、波兰等国进行展览，都受到热烈欢迎。在中日尚未建交之前的 1958 年，日本东京、京都举办的敦煌展，历时 1 个多月，参观人数达 10 多万人次。1991 年再次应邀前往东邻展出，同样获得良好反应。1983 年在法国举办敦煌壁画临摹本展出的同时，中法两国学者还联合召开了敦煌学讨论会，其后又将此次讨论会的论文汇编为《敦煌壁画与写本》一书，在巴黎出版。在印度、缅甸展出的敦煌 16 窟宋人所画佛传故事 32 幅临摹本，使印、缅两国人士惊

叹不止。在展出期间，常书鸿专门向印、缅两国朋友介绍了敦煌艺术。印度考古局局长 Chaknavati 向常书鸿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至今完好地保存着敦煌 400 个自 4 世纪到 14 世纪的宝窟，壁画颜色如此鲜明艳丽，真令人羡慕……而我们，虽然有阿旃陀那样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但却只有 29 个洞窟保留了一些残破的壁画，现已变得褐黄一团，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常书鸿与那些曾经在和现时还在敦煌石窟工作的同志们，从印度友人的话语中意识到，这几十年他们在敦煌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世界各国人民对敦煌艺术的尊敬，不仅使中国人感到光荣与自豪，而且是人类的骄傲。

14 年前(1981)的冬季，笔者应约去看望常书鸿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承仙女士。他们刚从敦煌岗位上退下来不久。那时，常先生已是 77 岁高龄。他在敦煌数十年，除临摹大量壁画外，还撰写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和介绍敦煌艺术的文章，他的著作和组织编写的论著也有十多部，所创作的油画作品更在千幅以上。告退十多年来，专事著书立说，他亲自撰写的自传《九十春秋——

敦煌五十年》一书已于 1994 年 4 月出版。他所参与的国内外社会活动，也大多与敦煌有关。真可谓魂系敦煌。但他认为，敦煌事业是辉煌的，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譬如，他曾向中央领导同志建议，按照莫高窟原型，在八达岭建立一座“长城敦煌艺术中心”，以进一步弘扬敦煌文化。这一建议由于资金问题，一时还难以实现。

1994 年 6 月 23 日，为敦煌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的常书鸿因病逝去，终年 90 岁。遵照常先生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已送回莫高窟，深埋于故居皇庆寺小院内的一颗梨树下。被誉为“敦煌艺术保护神”的常书鸿，已经魂归敦煌，他的英名将与这座艺术宝库一起，世代流传下去。

附言：本文在写作中，曾参考张锡原、刘进宝、潘洁兹、徐迟等同志的著作。所引材料，因限于篇幅，未便一一注明，附此谨致谢意。完稿后，承蒙常夫人李承仙同志校正事实，又惠赐照片，翻印刊登，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林 跃)

· 招聘广告 ·

你是否有幸加盟“炎黄人”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北京等地数家实力公司组成的股份制法人企业。旨在复兴东方文化，再塑中华精魂，以新思路、高水平、大手笔为特点，聚合人才，创业图强，以文化产业开发和实业基地建设及综合业务为舞台，让中华精英和四海志士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展现个人的才华，实现自身的价值。

炎黄公司以深圳为桥梁，中原为基地，北京为窗口，构架“三点一线”的企业集团模式，正在河南新郑——这个黄帝诞生地、炎黄结盟的建都地、第八代炎帝榆罔诞生地、东方文化肇造地和将成为一片神奇热土的轩辕故里、炎黄故都，兴建“中

华圣地——炎黄城。”

如果说三十年代，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优秀儿女，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話，那么，九十年代，具茨山下、姬水河畔又聚合了一批炎黄精英，在为东方文化的崛起和中华民族振兴搏击奋斗……

炎黄公司需要强干，忠诚敬业，具综合素质和事业心的总经理、文字秘书和公关秘书，企业融资人员、房地产操作和项目规划设计、模型制作人员、财会人员、从事文化产业、影视制作广告宣传人员，工业企业经营人员和综合业务人员……

他们将以自己对事业的忠诚和才干，经过三个月试用而逐步成为炎黄公司的工作人员、企业骨干。在

“任人唯贤”和“举贤不避亲”的择优筛选和人才撞击交融中也可以成为公司的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分公司经理乃至总公司经理级人才，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将会分别安排在新郑、郑州、北京等地工作，并将根据自己的级别和贡献享受优厚待遇。

你想加盟“炎黄人”，请将学历证明、身份证明及相关的证件复印和个人简历，一寸免冠照片，详细联系电话、地址，在本文见报一周内寄至郑州市文化路任翔大酒店六楼 606 房“河南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人事部”，或直接来公司人事部应聘。

地址：郑州市文化路十一号任翔大酒店六楼

邮编：450004

联系电话：3943232—3603 3608
联系人：柳先生 王先生 杜先生

张太雷

一封残破家书的由来

● 钱听涛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者之一，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1994年12月12日，在张太雷烈士牺牲67周年纪念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了《张太雷》大型画册首发式。翻到这本画册的第27幅图片，是一封既没有收信人、也失去了署名和书信日期的残破的家书。残存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你(下缺)是现在路已通了(下缺)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缺二字)，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觉得现在我做事，总不能说可以长久。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何)。这样，心境不能安定，心境不安定是如何痛苦啊！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能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

下面就讲到富贵会害人，做了官发了财常常会嫖赌娶妾，欲望不会满足，决不是幸福。到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接着又交代家中的生活来源：

“凡遇有金钱紧急的时候，尽可写信与北京彰仪门大街通才商业学校吴炳文及吉林(原文如此)哈尔滨道里特别地方审判厅张照德。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允许帮助我。答甄四叔处已有两封信去了。母亲尽可问他要，因为此款虽然是他家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铜钱是天下共有的，真正讲起来，亦不是他们的，亦不是我们的。所以尽可以向他要，不必客气。”还说“母亲年老亦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母亲说不要过省。”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所最善(擅)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想你学刺绣及国画一定是好的。”“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啊。”“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书如

《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样的心思，一点不忧愁，只用心照我告诉你的用功去。”

“我一路有信给你，到俄国后我时常有信家来，不要忧愁。”“快要动身。恭祝母(下缺)”。

初看起来，这是一封残留约2000字的普通家书。是一位将要去俄国学习点“高深学问”的人对妻子和老母的家务交代，充满了家庭亲情，但又表达了坚毅的去国远游的决心。其实，根据烈士的女儿张西蕾同志的介绍，北京大学研究张太雷生平的专家丁则勤教授的考证，及笔者近年来研究张太雷早年生活及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历史的分析，这是1921年初刚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的张太雷，受中国共产

党早期组织的派遣，秘密去苏俄前写的一封信，是一封历尽劫火留下的烈士手迹。

我们要把历史追溯到70多年前。张太雷在1916年初考进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学的是法科。当时法科毕业生大都进入仕途，而出身贫寒、学业优秀的张太雷却走的是另一条路。

在新文化运动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张太雷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为了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响应归国留日学生与北京学生的示威请愿活动，在天津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与马骏、郭隆真等一起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活动，并从而结识了北大学生许德珩。第二年在“五四”运动中，他与马骏等都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骨干，抵制日货，上街演讲。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他是北洋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在1919年8月及12月，为山东和福州事件，张太雷作为天津代表，曾于8月赴京营救被捕同学。1920年1月，他又参加北洋大学反对镇压学生的校长冯煦运的斗争。当时天津有一张《华北明星报》，创办人是北洋大学法科主任、美国人福克斯，他聘请张太雷当记者。这份报纸倾向进步，能客观报导学生运动，张太雷因而能结识一些在天津的外国进步人士，如后来在北大任俄语教授的鲍立维。

同时，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中也结识了李大钊，开始接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0年春天，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领导人派遣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来找“五四”运动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和中国革命者直接来往。张太雷通过鲍立维介绍，担任了李大钊会见维经斯基的翻译；维经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会见陈

独秀时，张太雷也陪同前往。他们酝酿建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在北京、上海之间频繁磋商。这一年夏天，张太雷已经可以在北洋大学正式毕业，发给张曾让(当时张太雷在校名字)的毕业证书已经填好了。但是，张太雷已经全力投入李大钊、陈独秀进行的建党、建团活动，他没有去领毕业证书，至今还留在天津大学校史陈列馆中。1920年，张太雷秘密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被派到天津去创建党团组织。他从此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就已加入党组织的50多个党员中的一员。

这时，北洋军阀政府到处搜捕“过激党”，妄图扼杀中国的共产主义幼芽。在这种形势下，张太雷的活动绝对保密，不仅在常州的老母薛氏和夫人陆静华不知道，连在京津的同学也不清楚。他的中学同学、当时在北大学习的李子宽和金诚夫，住在北大东斋，张太雷从天津到北京，常把装有宣传品的箱子放在那里，但匆匆数语即离去。有时，他就找另一位中学同学、当时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一起去看李大钊，但是他的身份是谁也不知道的。

1921年初，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远东书记处。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不再由俄共(布)下属组织联络，而改归共产国际直接领导。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派一个代表前去。李大钊等商定，派这个已经与维经斯基有过联系(维经斯基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负责人)、精通英语、年仅22岁的北洋大学毕业生张太雷前去。张太雷成为共产党派赴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他下定决心，毅然肩负起这崇高的使命，远离老母妻女，越过重重封锁线，到那个饥寒交加的“饿乡”——

俄国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又不能不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和结婚刚两年的妻子有个交代，何况家中一直以为他在北洋大学法科毕业后马上可以谋得一官半职，稍解困窘呢。在这种尖锐的矛盾中，张太雷才写了这封家书。他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甘愿牺牲一切，但对亲人又只字不能吐露。他当时的心情，我们透过家书可以想象得出。

以后怎样呢？他果敢地去了！担任了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代表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作了有历史意义的发言。以后终其一生，张太雷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主要联系人之一。他是唯一参加列宁葬礼的中共代表。他与马林、鲍罗廷、罗明纳兹、纽曼等共产国际代表，一直有曲折复杂的关系。他在每次国共合作中，在广东、武汉的革命洪流中，在共青团的活动中，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他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1927年革命危急关头，他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参与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挽救革命失败的“八七会议”。最后，他亲赴广州领导广州起义，牺牲在革命烈火中，年仅29岁。

在这七、八年急风暴雨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夫人陆静华，只能留在故乡，上侍婆母，下抚两女一子，绝大部分时间不能在太雷身边。张太雷的家书大概有几十封。他牺牲后，在国民党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的夫人隐姓埋名，历尽艰险才把这些家书保存下来。

收入画册的这一封家书，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张太雷的次女张西蕾，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才15岁，在苏州女子师范读书。1938年初，她决心要继承父志，找共产党

杜重远烈士不是偶然牺牲的。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邹韬奋同志是杜重远最接近的战斗伙伴。不幸的是邹韬奋直到临终前还没有弄清楚杜重远在新疆的真实情况。不错,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新疆事件”——盛世才的叛变,这一段复杂的历史被浓雾掩盖着。

胡愈之:《悼念杜重远烈士》

“《新生》事件”与杜重远遇害

● 阎小波

杜重远, 1898年生于吉林怀德, 1915年毕业于奉天师范附中, 1916年考取官费, 赴日本留学, 入东京工业学校学窑瓷。1923年毕业回国。他在“唯有振兴实业, 才能拯救中国”的思想指导下, 自筹资金, 在沈阳开办肇新窑业公司, 张学良亦投资12万元。公司资金很快增至百万元, 因其实业上的巨大成就, 他被推为奉天商务总会副会长(高崇民任会长)。1926年, 日本要求在东北各县增设领事馆, 杜重远“鼓起十万民众, 作游行排货运动”, 并当面怒斥日本驻奉天领事冈村。此事在东北各报刊出后, 引起民愤, 日本的图谋未能得逞, “我那时方明白, 只要中国人争气, 东洋小鬼子也是不足怕的”。(杜重远:《最可怕的是什么》,《新生》第一卷第三期)“九一八事变”后, 他毅然决然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6月南下抵沪。由于《生活》周刊募捐支持东北义勇军, 杜重远遂以《生活》周刊热心读者的身份与邹韬奋相识, 二人“由神交而成莫逆, 快慰平生”, 他被聘为《生活》特约撰稿, 撰写了大量讨伐日寇的檄文。1932年又参与创办《生活日报》, 被确定为经理部主任, 因国民党多方阻挠, 不仅《生活日报》未能问世,《生活》周刊也“迫于环境, 无法出版”, 于1933年底被迫停刊。邹韬奋流亡海外。由于杜重远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 又是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的旧友, 胡愈之提议叫他出面接办《新

生》周刊, 很快就得到批准。“新生”二字即取“生活重生”之意。此间, 潘汉年受周恩来委派, 与杜重远保持密切的联系。

《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问世, 16开本, 共20页, 逢周六由新知书店出版, 封面和封底均有大量精印的新闻时事方面的图片。主要栏目有:“老实话”、“时事论文”、“学术论文”、“国内外通讯”、“职业生活”、“文艺作品”、“问题讨论”、“萍踪寄语”(续登邹韬奋自国外寄回的稿件)。作者有:柳湜、毕云程、戈公振、巴金、曹聚仁、金仲华、萧乾等。编辑部和发行部门在圆明路1号, 后迁至福州路复兴里。

三十年代中期, 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而国民党政府却多方压制言论, 摧残出版。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新生》周刊, 继承并发扬了《生活》的传统, 坚决主张抗击日寇入侵, 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 讴歌抗日救亡的民族志士。

该刊的宗旨:“光明正大, 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

态度:“无偏无党, 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

内容:“深入浅出, 期成培养新知的园地。”

杜重远撰写的《发刊辞》公开揭橥抗日救亡的旗帜:

我不是一个文学家, 也不是一个新闻记者, 更不是

伟人名流,我从前是在沈阳办过实业的,我曾手创过一个容一千多人的瓷业工厂,这个工厂依然开着,只是因为我不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所以到如今竟变成一个无家可归无业可图的人了。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国人。说我是中国人吗?我的家乡已分明不是中国的土地了,说不是中国人吗?我是和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在同一环境内,养育长大的;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缘故,我受尽了人间的惨痛耻辱。有人比亡国奴为丧家之犬,现在我就是丧家之犬了。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不是几个能征善战的军事家,抵抗了一个多月就可以挽回劫运,也不是几个雄才多辩的外交家,几次折冲鼎俎,就可以解决国际纠纷,……在现在必须使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国民族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对于民众自身的任务与前途,有切实的认识,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气和决心,这样便是记者和友人创办本刊的动机。



杜重远

这如泣如诉的发刊辞,以其莫大的感召力,吸引、打动了无数的读者,激励国人共赴国难。《新生》也因此而深受读者的欢迎,销量很快增至十万余份。反观当时其他的报刊,“记者翻阅报上的新闻,只见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而在相互叫骂着。被宰割被瓜分的中国自身,反默不作声,仿佛事不关己似的,……这些新闻(指有关中国人抗日的报道)都载在各报的后幅,很少人注意”。(杜重远:《民族精神不死》,《新生》第一卷第一三期)

正因为《新生》大张旗鼓地疾呼抗日救亡,而遭致日本侵略者的忌恨,国民党为避免引起涉外事端,亦欲禁之而后快。诚如杜重远在“大实话”中所直言“记者便时常听到各种无稽的谣言,有的说本刊是赤色刊物,有的说记者是共产党或反动分子。许多爱护本刊的读者以及记者的知友听了这些谣言,都替本刊和记者捏把汗,……但记者却毫无畏惧。记者是东北难民,已有了国亡家破的经验,还怕什么!”(《答爱护本刊的友人们》,《新生》第一卷第九期)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刊载“易水”(艾寒松的笔名,《生活》、《新生》周刊编辑)写的《闲话皇帝》,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有几处涉及日本天皇,说现在的皇帝有名无实,是古董、傀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日本统治者要保留天皇,“是企图利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随后,上海的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宣称《新生》“侮辱天皇”,日本浪人借机在上海街头滋事和骚乱,蓄意掀起政治风波。

6月7日,日驻沪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及《闲话皇帝》作者易水。对此,国民政府本着息事宁人的方针,媚敌苟且,一一允诺。并于6月10日特发布了《睦邻敦交书》,“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同时,南京方面亦迅速派出萧同兹、齐世英二人来沪专门处理“新生事件”,他们说服杜重远亲自出庭听候审判,谎称:“只要你出庭,搪塞应付一下日本就可以,决不判刑,即使判刑也暂缓执行,你可照常工作。”上海市市长吴铁诚还请杜重远吃饭,当面保证说只要出庭一下就没事,一切由国民党方面办理(据艾寒松事后的回忆)。

6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的罪名,迫令《新生》停刊。

30日,杜重远签发了《告别读者诸君》的传单:“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占据了东北,侵夺了华北,甚至支配了整个中国的政治,还觉得不爽气,现在帝国主义的威力,却打击到我们这个小刊物的头上了。本刊一向站在反帝的立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毫不客气的常常

揭破他们的阴谋，因此得了一个‘触犯刑章’、‘妨碍邦交’（上海市政府令）的罪名，一纸令下，竟限日停刊了。本刊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这牺牲是光荣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动民族抗日战争。……亲爱的读者诸君，请记住过去的耻辱，认定正确的路线，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让后代的人们知道，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者，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这停刊时发出的怒吼，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声讨，也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节节退让的愤怒斥责。

7月初，上海市政府令公安局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控诉，因“易水”住址不明，迭传无着，侦查结果认为，杜重远应负刑事罪责，令交五百元，并随传随到，听候公诉。

2日，日外务省指令到后，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邀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其私宅晤谈。有吉明称，事件直接

责任者吴铁诚对此事处置，予以谅解，对党部之处置，作严重之抗议。

5日，驻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与唐有壬再次磋商“新生事件”，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又为“新生事件”电令各省、市党部：“本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国体，以万世一系著称于世，其国民对于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世人所能想象者，记载评论，稍有不慎，动足伤日本国民之感情；一年以来本会迭次告诫，所幸尚能恪守，不意该《新生》周刊有此意外之记载，除业经另案处分外，为防止将来再有同样事件发生起见，兹将再行切实告诫，着即转飭当地出版界及各报社、通讯社，嗣后对于此类记载或评论，各须严防防止”；并要求各地切实遵守国民政府《敦睦邦交令》，“取缔排日运动。”（7月8日《大公报》）

8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又以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闲话皇帝》一文未能检举，按照日本要求将该审查委员会成员撤职，审查委员会也无形撤销。同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出通告，不准各书店代售《新生》周刊。

9日上午9点半，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杜重远偕律师吴凯声到庭。警方深恐发生意外，特派大批探捕在法院四周驻守，同时高二分院亦派出十余名法警在法庭内外维持秩序。尽管如此，旁听者仍挤满了法庭，被摒之于门外者尚有三四百人。而日本领事馆特派监审代表及日籍记者20余人，却大摇大摆地走进为他们设置的许多特别的席位。法庭指控《闲话皇帝》对各友邦元首均有论及，而于日本天皇所述尤多，且有诽谤之言词。法庭以“易水”屡传无着，杜重远作为编辑和发行人，自应负其全责。依照新《刑法》三百一十条第一项、旧《刑法》三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诽谤罪，及依新《刑法》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加重本刑三分之一。杜重远站在被告席上申辩道：自“九一八事变”后，即来沪主办《新生》周刊，本年四月赴江西举办实业，撰务委他人代理，故未见此稿。当时杜重远的辩护律师出示信函，以证明杜确在江西。杜重远在申述了刊登《闲话皇帝》一文的经过后指出：事后阅读该文，知作者实系学者之眼光，来批评各国的君主制度，但可确定，作者并非留日学生，故不明日本与各国的情形制度不大相同。至“易水”其人，杜重远说：因所投之稿，为不受酬者，故无地址可稽，该稿原文亦无从检寻。针对在场的日本人，杜重远声辩道：“本人曾阅外国杂志，其中描写有甚于《新生》周刊之稿者，未闻因此获罪。我绝不会攻击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对的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



杜重远从九江赶往上海出庭前夕（1935年6月），特与夫人侯御之合拍此照留念，作好牺牲准备

至此，法庭开始短暂的所谓辩论。11时，庭长郁华宣告判决书：“杜重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处徒刑一年两个月，《新生》周刊二卷十五期没收。”杜重远的辩护律师请缓刑或改科罚金，庭长称“环境不许可”；请予上诉期内交原保，法庭亦依所谓有刑法的规定，不得上诉，故即认为确定。随后杜重远即被押送出庭。就这样，所谓的假审判变成了真冤狱。

国民党这一媚外压内的举动，即刻引起现场旁听者的强烈不满。据《申报》次日刊登的新闻报道，宣判词刚读完，“旁听席上之人起立呼号，并发现传单，经法警及探捕极力制止良久，始将该项人等驱散。”《大公报》载：“当判下时，旁听席上忽起喧哗，临时加警弹压，杜表示：‘不信尚有此司法’，即由警押送华德路监狱执行。”日人在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载：“由审判长宣判之际，庭内大事喧哗，怒号四起，几致不可收拾，遂陷于混乱，乘此扰乱机会，在旁听席旁之学生团一群，散布秘密所持‘打倒帝国主义’之传单，一时呈不稳定之形势，但因警官急行，始归平稳。”

杜重远的夫人侯御之女士闻讯，即刻自江西来沪，向江苏高二分院提起上诉，结果被驳回。7月22日，她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万言控告书，上诉状告虽列出种种理由，结果照例是维持原判。同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却受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部的申请，裁定《新生》应依照《出版法》禁止发行。

杜重远遭诬陷入狱的消息传出后，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为声援杜重远，上海各界成立了“新生事件后援会”。7月22日，上海律师公会以《新生》周刊案判决有违法及不合人情之处，呈请司法院纠正；高崇民亦为之提出上诉，结果均被驳回。

杜重远的挚友邹韬奋“在美国旅行到芝加哥时，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论坛报》上看到长电，详载‘新生事件’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情形，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杜先生的爱国文字狱加速了我的归程。我于当年八月间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新生》夭折后，邹韬奋又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接着《新生》而撑起光芒万丈的火炬，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它的产生在正在震动寰宇的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和全国澎湃、沛然莫之能御的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的前夕”。（邹韬奋：《患难余生记》）

身陷囹圄的杜重远，一刻也没放弃记者的职责，坚

杜重远烈士永

重不朽
那小平题

持为《大众生活》撰稿，为抗日救亡呐喊，他号召国人“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大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封建势力而搏斗，向帝国主义而厮杀！”（《大众生活》周刊第一卷第一期）

杜重远向以支援抗日名将马占山而闻名，这对崇敬他的东北军官，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纷纷借开会、公差之便，或假托名义到漕河泾来，慰问这位被他们视为代言人的民族英雄。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杜重远在狱中促成了张学良的思想转变。据在《新生》任编辑的胡愈之回忆，因主管监狱的是杜重远的旧友蔡劲军，故受到特殊优待。“他们在监狱后面的荒地上，为杜重远盖了三间平房，杜重远自己请了厨师做饭，并且设有传达室，来访者必须先用电话通报姓名得到同意方准入内，这样就避开了特

务之流的监视干扰。重远的监房成了宣传抗日救亡，商讨机密大事最安全的地方。每逢星期六、节假日，我总是大清早就去淮河泾，直到晚上才回家。重远除了自己对东北军兄弟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外，给他们做点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重远总是事先约好一些东北军的人来，我们在一起交谈。我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让他们认清形势，辨明方向。我们向他们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险恶，以及已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危险，宣传共产党和反蒋抗日的主张，鼓励东北军站到反蒋抗日的一边来，……我们争取了来访的一些东北军知名人物，如曾经当过张学良秘书的高崇民。……后来张学良把高派到杨虎城那里住下，他很好地完成了说服杨虎城的工作，为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的联合抗日起了良好的作用。”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托故来上海，秘密会晤了杜重远。他俩是同乡，又是老友，可以无话不谈。……杜重远老实不客气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又庆幸他迷途知返，……张学良对于杜重远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东北军的前途、他个人的前途出发，提出建议表示赞同。”（胡愈之：《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文史资料选辑》总106）

另据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回忆，1936年春，国民党将杜重远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不久，“杨虎城借治牙病的机会也住进虹桥疗养院，与重远朝夕相处，商讨抗日救国大策”。

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出狱后，以更加高昂的斗

志、惊人的毅力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0月即赶赴西安与张、杨晤谈，对促进张、杨联合发动“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此间他多次见到周恩来、叶剑英等。“西安事变”后，国共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亲自提名杜重远为联合政府领导人之一。

抗战初期，杜重远还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8年6月，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声称“亲苏亲共”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邀杜重远前去创办新疆学院，盛是杜留日时的同学，又是同乡。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杜重远本着将新疆建设成抗日大后方的设想，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及斯诺等国际友人劝他赴美再办实业，不畏艰险，西出阳关，三赴新疆。1940年他被盛世才软禁，后又以“勾结汪逆”、“中共秘密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他被捕后，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为营救他，多方奔走。1942年，周恩来来到新疆时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与他同机飞回内地，均遭拒绝。杜重远在狱中受尽酷刑，1944年被惨杀于狱中，并毁尸灭迹。

杜重远是一位腰缠万贯的杰出实业家，有洋房、汽车，有官衔，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他舍生忘死，始终战斗在最危险、最艰苦的岗位上，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壮志未酬，带着万般遗憾离开人世。他是一位实业家，却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将永远为后人所崇敬。1983年在烈士诞辰85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特为他题词：“还我河山”、“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 王 恂）

《爱情婚姻家庭》杂志一直认为： 做名人难吗？做老百姓最难！

《爱情婚姻家庭》杂志每年收到老百姓求助来信三万多封，专门解决老百姓的爱情、婚姻、家庭及男女老少的人生难题！

若想爱情成功，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请订阅 1996 年的《爱情婚姻家庭》杂志！

《爱情婚姻家庭》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单价 2.90 元，半年价 17.40 元，全年定价 34.80 元。 ● 邮发代号 38—136。 ● 全国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 本刊电话：(027)8874481 ● 邮政编码：430060

● 社址：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津水闸 5 号

欢迎订阅 1996

中国最便宜的报纸：《书刊文摘导报》

《书刊文摘导报》是：报中之报 书中之书 刊中之刊

一张导报在手，能知当代书刊披露的重大事件，摘萃精华！

☆《书刊文摘导报》全国公开发行。

☆邮发代号 37—68，每份定价为 0.30 元，半年订价为 7.80 元，全年订价为 15.60 元。

☆请到当地邮局（所）订阅！

☆本报电话：(027)8874481 ☆ 邮政编码：430060

☆社址：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津水闸 5 号

孙中山故乡抗日战争二三事

● 欧 初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活跃在珠江三角洲上，成为华南敌后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珠江地处广州外围，毗邻港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之后，相继占领珠江地区许多地方并驻扎重兵。在敌众我寡，且地理环境（平原河网地带）不利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下，珠江纵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不断消灭敌人，先后解放了南海、番禺、顺德、中山及三水、广宁、四会的大片土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我受党的委派，在中山九区组织抗日武装。此时，我们仅有13个人，面对周围的伪军、土匪及杂牌武装三千余众，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先求立足，再求发展，以严明的纪律，赢得群众支持，终于使这支小小的队伍，在战斗中日益发展壮大，到1942年，同其他地区几支党的武装一起，共同开辟五桂山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支部队后来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我任支队长，梁其达任政委，罗章有任副支队长，杨子江任政治处主任。我们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除注意群众工作外，也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几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虽系雪鸿泥爪，却值得回味深思。

“纽约桥”引来澳门青年

当时中山县的范围包括珠海和

斗门等地，与澳门直接接壤。澳门向为我国领土，自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被葡萄牙（史书上称“佛朗机”）先曰租借而后侵占。该半岛加二个小岛虽是珠江口西侧弹丸之地，但扼航运要道，形势险阻，且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中立国，日寇虽气焰嚣张，太过的公开破坏活动毕竟还要有所顾忌。澳门的中立地位和微妙态度，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4年春季，我们先后派郑秀、郭宁等化装成普通百姓，进入澳门寻求立足点，并很快建立起一个秘密办事处。从此街头巷尾、酒楼茶肆，到处传播着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敌后游击队的胜利消息。澳门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国人，他们热爱祖国，心向抗日，特别是倾向进步的热血青年，在我党的影响下，一批批秘密来到五桂山区，心甘情愿讨“苦”吃，参加我们办的“青年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代号叫“纽约桥”，对境外青年，颇具吸引力。培训方式也很独特，一般是上午讲课，下午民主讨论。每星期安排两三个晚间活动，随武装工作队到平原地带开展抗日宣传。学习内容主要有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史，抗战形势，部队史，青年问题等。学得简要，结合实际，这样的培训，时间虽短，收效很快。学习结束后，或参加代号为“流星队”的宣传队，或分派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或直接到游击队做“政治战士”（当时每班配一名“政治战士”，负责政治宣传与鼓动工作），让



战争年代本文作者留影

他们到战争的大海中学会游泳。还有一些女同志分配到医疗站（极简陋的战地医院）或到连队任卫生员，背个小药箱，跟着连队一起战斗和生活。

“青年训练班”先后办了三期，由我兼任班主任，黄云为指导员，杨子江、吴子仁、张彬、郑潮秀等任教员。办班期间，我们和他们生活上打成一片，同吃一锅饭，课余一起打篮球，一起学唱抗日歌曲，真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至今我还记得青训班第一期的同志们。大约在1944年的7月，十多岁的李加带领了“总理纪念中学”（即孙中山总理纪念中学，那时已迁至澳门）、培正中学、中德中学、濠江中学、行易中学和镜湖护士学校的十多名男女青年，投奔五桂山区，他们中有胡兆基、陈君芝、郑诚之、赖冠威、卢萍、郑波、刘光

普、李葵等，他们是慕名“纽约桥”而来，经过短期培训，犹如雄鹰展翅，飞向抗日疆场。有的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为国牺牲，更多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成才。如李加，即李成俊，他现在年过花甲，今任《澳门日报》社社长，是全国政协委员。

澳门谈判和秘密工作

我们与澳门当局的关系相当默契，抗日战争期间，还进行两次秘密谈判。

那时在澳门和中山两地皆有一定地位的黄怀先生，是我1938年冬从广州回中山做抗日宣传工作时曾经拜会过的。到了1944年春夏之交，黄怀先生通过我们的一个税站传递来一个信息，说是澳门当局想与我们游击队取得联系。因事关重大，我们马上请示上级指挥部，经获得同意后，由杨子江同志以我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给黄怀先生，信的大意是说：我与他已数年未见面，知道先生同情我们的游击队，很是高兴，并希望他支持抗战事业，并介绍梅重清去拜见他。

当时，珠江三角洲游击战争指挥部与中山的部队联合建立了一个经济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大革命时“省港大罢工”的老同志林锵云担任主任，我担任副主任，梅重清是秘书长。梅重清拿了我的介绍信到了澳门，通过黄怀先生的引见，和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部秘书慕拉士会面。谈判的主要内容是维护澳门外围治安。那时，澳门外围常有伪军、土匪进入澳门市区内骚扰，作案后又溜回它们的黑窝和落脚点。澳门当局无可奈何，希望我们给予打击或清除。我们应诺给予帮助；他们也答应以三个条件回报：一是同意安排游击队的小部分伤病员到澳门留医；二是同意我们到澳门购买一些急需的药品和子弹；三是同意我

们派人到澳门秘密发动爱国抗日募捐。

双方谈判是诚意的，而且在此后确实都实践了各自的承诺。再说我方在澳门做秘密工作的郭宁、郑秀、李成俊等人，工作也是得力的。澳门中央酒店（当年澳门最高级的酒店）老板傅德荫（即傅老榕）、搞粪务（清洁卫生行业）的严仙洲、“回春油”老板梁柏桑和招兰昌医生等都为我们游击队捐钱。当年在镜湖医院任医生的柯麟和其弟柯平，也常与游击队互通情况，在医疗和药品方面给我们支持。柯平回东江根据地汇报工作，其路线往往经由五桂山游击区，再由我们安排他横渡伶仃洋而去。澳门当时的“大丰银号”司理是马万祺，副司理是何贤，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珠江地区的游击战争，为我们出过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贤先生第一次见到我，即说：“我们已神交多年”。以后每逢见面，他竟直呼我为“神交”而不再称姓名。可见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澳门方面的爱国志士与五桂山游击队确实是“心心相印”的。

活捉“老鼠精” 引渡黄公杰

抗日战争后期，华南的敌伪已日薄西山，但仍在作垂死挣扎。我们的五桂山游击根据地则日益壮大，又开辟了凤凰山游击区，包括湾仔、东坑、翠微、正坑、那洲、良坑、上下栅等乡村。我们一支代号为“白马队”的部队在这里活动，队长叫谭生。大约在1945年初，澳门葡萄牙方面派二人到东坑村找游击队联络，说是有以绰号“老鼠精”为首的一班人，不时潜入澳门市区，专干抢劫金铺、当铺和杀人的勾当，心狠手辣，打伤警察，破坏治安。“老鼠精”以香洲渔港为据点，神出鬼没，因而

请求我们帮助整治这帮歹徒。我们也得知“老鼠精”是国民党特务的小头目，海上惯匪出身，反动之极，还专门收集我们游击队的军事情报，破坏抗日民主政权。

我们几位领导经过研究，同意协助澳门当局活捉“老鼠精”，并作为对等条件，要求澳门当局协助我方抓获叛国投敌、罪不可赦的叛徒郑实。双方达成协议后，我们指示“白马队”队长谭生执行智捉“老鼠精”的任务。

谭生接受任务后，立即在“白马队”挑选了几名精干的武工队员，分别化装去侦察“老鼠精”的动向和活动规律。不久便掌握到确凿情报，“老鼠精”的黑窝就在香洲榕树头的兴业银号楼上，他常在此吸鸦片烟，寻欢作乐。终于在一天傍晚时分，侦知“老鼠精”又闪入兴业银号楼上去了，谭生便亲自带领5名短枪手直冲上楼，把吸鸦片烟吸得昏昏迷迷的“老鼠精”生擒，并很快押送给澳门。澳门当局极为钦佩我们办事神速，不久也将郑实这个坏蛋活捉来交给我们。既为民除害，把敌、伪、顽的气焰打了下去，又壮大了我们游击队的声威。中山和澳门两地的群众，啧啧称道五桂山游击队的功德。

还有一桩值得称道的事是引渡黄公杰。抗战时期日本的间谍活动潜入澳门，在那里设有特务机关，觅得一个头子就是大汉奸黄公杰，此人作恶多端，曾使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严重破坏。1945年5月，日寇为防止盟军在华南登陆，一面在沿海增加兵力；一面对我方在珠江三角洲敌后活动的游击队疯狂“扫荡”。珠江纵队一支，在此时为避开敌锋，转移出一部分队伍到东江。是年10月，日寇投降之后，黄公杰走投无路，要向我们投降，殊纵一支奉尹林平、曾生的命令，在政委梁其达、政治处主任杨子江，中山县行政

督导处(即抗日民主县政府)副主任阮洪川率领下,在盐田接受黄公杰及其部下数百人向我投降。澳门群众闻讯,大快人心。澳门当局要求我们引渡黄逆归案,我们答应要求,由阮洪川押解黄公杰到澳门,得到应有严惩。

惊涛骇浪运电台

也是在1945年初,上级指挥部交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派人到澳门领取地下党为我们准备的一部电台,必须做到安全运回,万无一失。

我们因与澳门当局有过两次谈判,且双方皆守信义,于是决定由“白马队”队长谭生化装成商人,潜入澳门找慕拉士,请他在运送电台出境时助一臂之力。慕拉士确实帮了忙,乘着夜色,由他派人跟随谭生作为送行,躲开耳目和关卡查询,顺利运到澳门海边黑沙湾上船。这艘载重5吨的木帆船,也是我们事先准备好了的,在此已守候了3天,由浑名“海上霸王”的谭福亲自驾驶。

谭福世居香洲湾仔沙,贫苦渔民出身,近几年靠着走私发家,在澳门周围海域是个有名的“路路通”。他的老婆古长娣,娘家就在我们的游击区。我们多次做古长娣的工作,又派人直接对谭福晓以民族大义,终于促成“偷运贵重物品”到我方的协议。为防不测,此船启航时,我们还在船舱里埋伏下十多名游击战士,配备长短枪,由小队长李郁军带领,舱内还装上厚钢板。

谭福在漆黑的海上航行,靠地理熟悉,躲过暗礁烂滩,靠银元和“双金线”(一种鸦片烟膏)通过层层哨卡,把电台巧运回来。在中山县上岸后,由谭生、李郁军带近20名战士,抄小路、山道,抬的抬,扛的扛,把电台及其零部件运到部队指挥部。我曾特地去半路迎接,林叔(人

们对林锵云的尊称)为此表扬“百分之百”的完成了偷运电台的任务。

刀丛夜演翠亨红

翠亨村,这个山青水秀的村子,因为出了伟人孙中山而名扬国内外。日寇占领中山县后,周围层层布防,翠亨是个重要的封锁口。但翠亨是我们的,那里有我们地下党的组织,有秘密交通站,有我们掌握的“乡警队”,原曾驻防伪军一个排,慑于游击队的声威起义了。后来,日寇为防止盟军在华南登陆,在翠亨村对面的九龙山驻扎,居高临下,虎视眈眈。白天常常派兵到村里巡逻,晚上便龟缩回岐关公路的碉堡中。因此,我们的游击战士便在夜晚到翠亨活动,那里的群众爱国心非常强烈,主动在村内一些不显眼的房中造了夹墙,一旦有紧急情况,游击战士来不及撤走,可以在夹墙内藏身。

1944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纪念日。经过我们五桂山部队的领导商量,决定要搞一次较大的有意义的活动,即在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大礼堂,演出话剧《精神不死》。剧本系广东区党委连贯同志所编写,由我们五桂山宣传队负责排练。我记得是黄友涯饰孙中山,杨子江鼻子尖尖,有点像外国人,浑号就叫“番鬼杨”,饰苏联驻华大使;杨子江的爱人孙烈饰宋庆龄;汪精卫由陈特扮演,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则由妇女干部高屏饰演。

3月12日临近了,为了这次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的演出,我们像布置一次战斗一样作了周密部署。演出那晚,派出精干的游击队员在村内村外游动放哨,以防敌伪混入破坏或偷袭。

演出时,中山纪念中学宽敞的礼堂,点了几盏大汽灯,把会场照得雪亮。翠亨村民携幼扶老来观看。我

们还特地请来孙中山先生的胞姐孙妙茜光临观剧。孙妙茜,大家尊称为孙姑太,家住崖口村,属我们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事先,我和谭桂明同志曾两次赴崖口村登门拜访孙姑太,她的相貌与孙中山先生很相像,面庞饱满方正,眉目清秀端庄,身体健壮,肩膀宽阔,却不脱南国村妇的类型。孙姑太为人正直,虽然年龄大,却懂得国难当头,很同情抗日游击健儿。她答应我们可以回娘家翠亨观剧,我们便从民间找了一顶布轿,派专人接她到了翠亨村。我亲自迎她下轿,陪她进礼堂前排就座。演出前还请她上台讲话。她讲了简短的几句话,称赞抗日游击队好,要大家同心戮力打日本!

这次翠亨夜演《精神不死》,真是不容易,在烽火连天的南中国,在日寇的刀丛中,我们敢于从容不迫地来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以振聋发聩,唤醒民众,团结抗日!

至今抗日战争胜利已50周年,追忆往事,思潮起伏,我曾以秃笔写下四首有关翠亨村的短诗:

其一:黑夜驰驱入“纪中”,迎来姐氏自从容;

长钦大节冰霜厉,拯我同胞愤执弓。

其二:旌旗隐隐出刀丛,枭鸟惊弓堪矮峰;

若定指挥鱼水暖,安危一笑睨墙缝。

其三:帝制推翻绝代功,名高岱岳五洲崇;

百年圣地参天树,十里花光翠映红。

其四:为公天下众心同,两度相携伟业丰;

海峡归来云水近,翠亨煮茗月明中。

(责任编辑 洛松)

张克侠将军抗战日记

张
权
选
录

编者按：张克侠将军系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军长宋哲元）兼三十八师参谋长（师长张自忠）、第六战区高级参谋、副参谋长（司令长官冯玉祥）、五十九军参谋长（军长张自忠）、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总司令张自忠）、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冯治安）。

在战火纷扬的军旅生活中，张克侠将军写有大量日记。1988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1937—1948）》。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克侠之孙张权选录日记中有关“七七事变”及“临沂战役”部分，以飨读者。

一九三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北平追记）

自七月七日夜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迄至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氏由北平出走，为余在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任间事。回思往事，不堪回首，雄兵十万，曾不能快然一击，使仇寇坐大，未战而丧师失土，国人夺气。此莫不太息痛恨于宋（系指宋哲元）、张（系指宋哲元继任者张自忠）也。然二氏非当局之牺牲乎？

日寇侵华，蓄谋久矣。七日夜十时许，我金营（系指金振中营长指挥的二一九团第三营）首当其冲，敌借强大炮火突袭，金营官兵宁死不屈，予敌重创。

继而，丰台报警，余曾调董旅（系指董升堂一一四旅）往援。

敌锋甚锐，屡犯宛平一线，我军衔北方父老哀托，挟喜峰口之余威，此仆彼继，寸土誓夺。双方血染卢沟，永定河水为之呜咽。各方声援，将士用命，顽敌技穷。此后，曾一度出现全国团结抗战之大好契机。孰料局面逆转，终至功败垂成。

旧仇未雪，再蒙新耻，痛国将不国，恨养兵避战，叹孤掌难鸣，愧未己尽，余不禁嚎啕。

九月十三日

（晓庄）

昨日，冯氏（系冯玉祥先生）从

无锡到京，忽奉命移津浦一线，转为第六战区，任司令长官。

今日，冯氏约余同行，晚渡江登车，从此，重又戎马倥偬，驰聘征途。

九月三十日（桑园）

二十七日晚出发前方，先鹿氏（系指鹿钟麟先生）至连镇面冯先生等，继步行至南皮见李必蕃，然后到莲花池见庞炳勋，又集合李文田（五十九军师长）及黄、刘二旅（系指黄维纲、刘振三之旅）与刘芳波，议定由右向左旋回攻击，并决定于后日各就攻击准备位置，三十日晨开始实施攻击。余于二十八日午后由莲花池经灯明寺至连镇，昼夜前进，凡行十六小时，二十九日早四时至连镇，已阒无人迹。至车站，惟见难民扶老携幼，到处奔走。乘最后之铁甲列车返德州，见冯氏（系指冯玉祥）及张榭亭，告以经过，请其出击。

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夜，每日行百余里，日仅进一餐，极辛苦，但因迫近前线，精神至为愉快，希能有所效力也。

十一月十八日（陇海线）

晚告辞侠父（系指宣侠父），谈甚欢，相约后会。又往见紫封（系指三十八师副旅长翟紫封）及萃忱师长（系指张自忠）。张貌憔悴，心绪不

佳，闻嗜好甚深，不知然否？宴安耽毒真不虛也。余勉以自珍自重，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鼎力相助。

天仍雨，搬家者络绎不绝，车马一空，许久始得一车而行。凄风惨雨，国破家碎，行人宜断魂也。

十一月 二十二日

早停陇海路之李庄，车中人皆至附近之边楼寨食息。此行有七君子中之沈钧儒及沙千里二君，还有张申府夫妇以及其他入等。

车中有众多青年，皆朝气蓬勃，谈唱风生，颇不寂寞。近夜歌声昂扬，悲壮慷慨，余以为中华之希望，将有赖于此辈，中国不会亡也。晚行中，与沈、张先生交谈。

十一月 三十日

早起至铁路西侧漫行，冈峦起伏，饶有风景，亦便于作战，故试作布阵之戏，他日倘雄师在握，当可跃马横刀，荡平狼烟。

近来，关于自己工作颇为烦心，无论如何，当先行可为之策，必须促成左翼爱国力量之团结，以期推动抗日大业之进步。

冯先生可能已为昨函所动，纳谏启程，午十时许开车，经鸡公山、孝感略停外，一气到大智门，抵武昌已晚八时余矣。先生下车过江，余等仍居车上。

一九三八年

二月 二十五日 (武汉)

早七时至蛇山，朝日正出，空气清激，旭阳倍为美观。山上梅花更盛，睹大自然之壮观，心情舒放，体操后回寓。

上午开讨论会，对“统一战线中

之托洛茨基问题”及民意机关曾发表意见。

上午写关于《抗战与军事》之论文。

晚上，杨、宣二位(系指杨伯峻、宣侠父)来谈，故将写文章之事搁下。倾谈中颇获教益。

鹿先生来电话，谓张自忠军长约我去，见先生告之此事，先生亦同意，真可谓巧也，幸也！

余为后退及国恨，三次流泪，此后，可不复流相矣。

二月 二十六日

八时过江，率同行十人见张任民先生(系李宗仁与冯玉祥之联络代表)，张谈论在潢川成立青年军之意义，又谈及中央对于经费不肯帮助情况，希望同人往彼任教。

余旋去章处，与章、邹(系指章伯钧、邹静陶)交谈。

十一时至王祥木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员)，并一同往会罗炳辉君，经交谈后又与叶剑英君谈，余将经过情形报告一翻，希望在抗日途中能取得联络，发挥革命力量。在附近午餐后别去。

夜中梦与日寇战，大约因食闷，再加以白日思想所构成也。

二月 二十七日

早起往蛇山作最后拜别之游，朝气清明，河山历历，在春风摇曳之中，绿梅、红梅仿佛夹道欢迎，香气散馥，春光悦目，行矣！希望他日，以胜利情怀，再来游赏也。

上午收拾物品后，见冯先生告辞，并相约在抗战中共勉共进。彼对中央现状颇表愤慨，谓将往河南带领义勇军，又谓将乘飞机往陕北上学等语。

连城(系李德全胞弟)及王型仪



张克侠将军

(系冯玉祥推荐给张克侠的副官)来，将东西运过江，下午，冯将信写好，并交四千元犒赏张部官兵(系指张自忠部)。余过江先到三户印刷所，继往街上购物。

晚间在“普海春”由董、王、叶、罗、边、张、李等(系董必武、王明、叶剑英、罗炳辉、边章五、张经武等)八九位宴送，盛谊可感。

饭后依依而别，乃往鹿先生(系鹿钟麟)处辞行。

继又往章、邹处告辞，适陈独秀在。入睡时已子夜矣！

三月 三日 (滕县)

早上，张自忠军长派汽车前来迎接，即至军部晤见军长，转达冯先生意旨。据军长谈，至津浦线后，屡屡接到相互矛盾之命令，进退不定，对于命令的威信以及部队士气影响甚大。

三月 五日

午饭后，与军长谈用人问题及政治工作之必要。关于用人一事，余

建议：应以能抗日，有才能，且不为各方所共同忽视者为宜。

晚九时，得徐州之徐参谋长(系五战区参谋长徐燕谋)电话，谓本军应即开临沂，接庞军防务，四日内开拔完毕，要求一八〇师至峄县后下车前往，三十八师徒步前往。

十一时入寝。

三月 十三日 (临沂)

早七时起床后，至野地散步，归来写日记及读《全民族战争》一书。

临沂位沂水与沭河之交，襟山带水。南连淮泗，北走青齐，自古南服有事，必由此以争中国。明太祖平山东，命徐达先下沂州，遂得以长驱而北，诚齐鲁之襟喉矣。敌人亦以临沂交通便利，为鲁南公路中心，且西南通台儿庄，故以第五师团猛力南犯，誓必夺之。

敌第五师团系板垣征四郎指挥，该师团为敌军之佼佼者，自视为所向无敌，侵华以来势如破竹，此次推进迅速，有会同津浦线方面之敌合围徐州之图，实不可不虑。

然“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我五十九军官兵多为热血男儿，亟思报国雪耻，收复失地，若指挥有方，将士用命，骄敌非不可战而胜之。

将所拟作战方案之大纲交军长。

十一时在参处早饭。下午记者三人来军部访问，一为中央社记者胡静芬，一为扫荡报记者张铁心，一为武汉报记者李君。

明日拂晓为攻击开始之日，今晚，各部皆陆续移动，并有小部暗渡沂水。军部移南曲坊，因无直达通路，晚十二时始至南曲头。

一般通病，总是忽略平时准备，而又临时仓皇，如幕僚勤务得当，则命令一下，谍报、通信、给养、卫生等等即有专人办理，勿须临时着急。如

果军队训练有素，则战时下达命令即可放心无虑，不必焦心于无用之处。

三月 十五日

炮声一夜不断，早四时许，炮声更烈，隆隆贯耳，并间以机枪声，直至九时余仍无休止。今日，我在右翼恢复大太平及停子头(惟尚有敌兵十余人残留一隅，可谓顽也)。敌主力似由北进攻茶叶山一带高地。黄师猛勇(系黄维纲师)，但损失亦重。其河西官庄、船流一带村落，皆为敌占领。

据由夏庄逃出之百姓言：敌约二千余人，午后由夏庄南进。此外，敌人亦伤亡甚大，搬运伤兵之人车络绎不绝。

晚因黄告急，将董旅之一团开赴高家庄、孙家庄一带。

更晚时，各处送来缴获敌人之战利品若干，其中以信件、日记为宝贵。从中得知敌人作牺牲甚大，昔

日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皇军之板垣师团，为我中华好男儿已打得威风扫地，“铁军”碰到了打铁汉。

庞部(系庞炳勋)因无压力，亦向前推进，但不速，约明日合围。

三月 十六日

晚间，刘家湖及苗家村均告失守，此处为两师之接合部，又为全线之中央，若被突破，损失不堪设想。为此，余采取坚决措施，于午夜时分，派刘团将刘家湖收复，并缴获炮三门，残敌一部仍负隅顽抗。苗家村久攻未克。

上午，刘家湖等三村又被敌包围，因未适时增援，再遭失守，不得不付出数倍代价进行恢复，此乃用兵呆板之害。

敌人倾其全力，谋一鼓而下，从昼至夜，反复进攻，继之以肉搏，此皆因敌人急需炮弹及援军，偏此处不能通过，很难得到补充，且无法与另一精锐矶谷师团会合，完成战略

六月五日
今日周旋仗及了记问题。况若失出，久是良友令人想睡。身首事也。一场去。自他受。记想已。言泥。冯爪。便何。寻。迎。未。盖。七。侵。着。手。包。藏。月。子。人。生。益。全。踪。人。性。快。而。世。味。之。成。孰。善。信。耀。煌。染。培。洗。便。生。命。暗。长。保。全。新。鲜。苦。北。口。记。殊。有。主。功。用。真。日。记。均。可。为。生。命。间。隙。之。现。云。青。年。思。想。向。来。年。轻。意。志。固。可。无。收。一。切。亦。出。象。被。现。象。而。来。此。不。打。思。

张克侠将军日记手迹

之计谋。所以，不能不孤注一掷。然而，敌人之顽强及企图心之旺盛，可以想见。敌殆以攻势为万灵药也。

因敌人攻击之烈，致使五十里之正面遭到压力。苦疲而劣器之我军已感到难以支持，倘若不缩短阵线，恐不能久持。当前惟有二法：一即撤退收缩；一即庞部推进。最后议定三条方案，待徐燕谋与庞商议。

日间，对张军长谈战之惨烈，以鼓舞其气，对于作战缺点，亦随时说明，又指出对于部下不可过于偏向，此为最不好现象……

三月 十八日

八时至野外写日记。晨而微县，风稍凉。

午时，敌仍盘踞汤头附近各村，因我追击不力，战后姑息，顽敌遂又生根。

打扫战场敌遗弃尸体甚多，足见溃退之狼狈。尸体有自焚者，有不及焚者。所获战利品亦多，并获俘虏一名，叫松井一三，晚在电灯公司审问，得知敌人伤亡甚大，仅刘家湖一地，敌阵亡大队长以下数百人，连日驱使作战，饥瘦不堪。据敌训令获悉，敌因有五十万人之动员，给养弹药均困难，每每下令节省，从中对敌人之当前困难可窥一斑。

三月 二十二日

早十一时许步出山村，四周山色葱笼，松柏树木散植于崖岸，溪流缓逝，景色殊佳。可爱哉！山村也。面山林，俯河流，写日记，心神恬逸，不复有重石压心矣！

昨晚，庞送信来，要求在此停止待命，不知又有何变化？不过，军队亦须利用此时加以初步整顿，确有不少经验教训，应汲取之。

今日，又接蒋电，命以三、四团袭击津浦侧面之泗水、兖州一带之敌，主力仍回临沂。短短数日间，命令有多少参差？午后四时，张军长往一八〇师训话。

往野外散步归后阅报纸，知德已并奥，欧洲又掀起轩然大波，然狡英殆取强德抗俄策略，此次又坐壁上观矣，可畏哉，英之阴鸷也。

晚军长归，知一八〇师此次损失约两千人，李家五湖之赵营全部阵亡。训话时，官兵皆哭，诚亦伤心事也。多少可爱儿女，已血洒疆场矣！

一八〇师尚余五千人，现正由地方购鞋，因兵多赤足者。

夜十二时仍难入睡，思及阵亡将士之壮烈死难，不禁忆起古诗：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众多遗属之抚恤，决不可忘也。

三月 二十三日

近来，蒋氏（蒋介石）命令渐形严断，如：山西之渡运河部队不得西退，庞军之临沂阵地不得再退等等，此文章不知真作假作也？

汤军在峰县、枣庄一带之作战似有转机，如能认真前进，津浦战事想有胜望。午时，又得蒋、李命令，本军又全部开回临沂，要求务必肃清该处之敌。于是下达命令，进行准备。

三月 二十八日

全日激战甚烈。日军又用其早、午、晚三段攻法，我因人数单薄、武器又劣，至晚已疲乏难支。

连日来小岭前面尸积累累，虽败犹荣。红埠寺西部亦告失守，一时散兵乱窜，可恨庞部按兵不动，保全实力，伤我疲惫之师，贻误不小。现

唯一愿望即援军尽早到来。缪部（系缪徵流）一旅似有希望，但汤部（汤恩伯）骑兵迄无消息。

本军屡经苦战，全部已呈疲状。故不得不再缩短阵线，由七德经十里铺、韦屯、曹家、王庄、前后岗头、道沟之线进行抗击。此方案经徐同意。

三月 三十日

军长谈及伤亡，泪已盈睫，不似前日之乐观矣。实际上，如不事整顿休息，将会导致全部摧毁矣。

闻黄光华之一三九师亦开来，此后或将换防休息。连日精神极紧张，此后，或可安静一时，然此刻兴奋不已。

此次五十九军以自动精神抗战，不屈不挠，牺牲至一万人，诚为难能可贵，然已如黄台之瓜，不可三摘矣。

得获敌之文件，知在此作战者有二十一、十一、四十二共三个联队，敌对我军抗战之烈，出之意外，似亦感棘手。又本月十四日，如我不反攻，敌即将攻临沂，其企图似将以五师团歼灭鲁南我军，然今兹当不如前之乐观。

四月 八日

四月四日晚得通知：台儿庄之敌向东北溃退，军长指令一八〇师堵截，其防务由三十八师接替。

台儿庄获得空前之胜利，敌遗尸数千具，我正分向峰县追击。同时，天津电告，敌将调十万兵马来，各处如北平、济南、天津等地皆在准备后方交通之各种处置。大战恐又将在不久爆发。

（责任编辑 凌辰）

覆灭在水浒英雄故地的 一支侵华日军



1939年8月2日，驰名中外的水浒英雄故地——鲁西南古梁山前摆战场，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的师部留守部队，在兵力相等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全歼侵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坂垣师团一个精锐大队。这就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梁山歼灭战”，被八路军总部誉为“模范战例”。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党中央的作战部署，一一五师自平型关大捷后，转战至晋东南，于1939年1月组成东进支队，奉命挺进山东。

为解除人民疾苦，迅速打开局面，东进支队首战郛城樊坝，消灭伪团长刘玉胜部500余人；次打梁山南部的潘庄，摧毁了鲁西南汉奸的总机关；接着东进泰西，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师，在肥城陆房粉碎了日寇5000余人的九路合击。三战三捷，削弱了日伪顽杂的嚣张气焰，激励了鲁西人民的抗战热情，梁山周围燃起熊熊的抗日烽火。随之，部队武装力量迅速壮大，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扩编为独立旅，杨勇同志任旅长兼政委，何德全同志任参谋长，欧阳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象一把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

为实施支队东进战略，一一五师主力冲破津浦铁路防线，到鲁中南开避新的根据地。师部移驻梁山脚下的张坊村。

1939年8月1日，是我建军12周年纪念日。上午，师直部队和驻地群众在梁山西坡、前集村北的孟家林里举行军民联欢庆祝会，散驻较远的部队派代表参加。整个会场古柏参天，绿荫蔽地，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两旁，悬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朝；

看今朝敌后平原八路军健儿痛杀东洋强盗。

庆祝会上罗政委讲话，回顾了东进支队战斗历程，分析了鲁西战略地位和当前斗争形势，最后强调指出：“据悉，驻济南日军司令官首尾高次郎扬言，要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对我鲁西根据地进行搜索，妄图寻找我一五师决一雌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罗政委那有力的手势和铿锵的湖南口音，振奋着会场上全体军民，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后，战士们表演刺杀，围观的老乡们赞不绝口，为有这样一支英武的子弟兵感到胆壮气豪。

9时许，师部里匆匆跑进侦察排长和侦察员——一一五师的两位侦察英雄，向师首长报告敌情：日军坂垣三十二师团的一个精锐步兵大队，300余人，由长田敏江少佐率领，率首尾高次郎命令，又从兖州、济宁铁路沿线调来铁池炮兵一部，连同

伪警备队共计400余人。今天4点钟左右，他们从汶上县城出发，走到郭家楼。天明八点多钟到了古运河边的靳口，休息、吃早饭，砍树搭桥……，似有渡河西来，进犯梁山的态势。

“情报是怎样搞到的？”罗政委目不转睛地看着侦察战士说。

“昨天在城里，由我地下党的关系从一个翻译官嘴里听到的。今天一早，我们躲在城西关老乡家里亲眼看见，又尾随进行了侦察。”

独立旅一团也得到当地群众同样的敌情报告。

“吃掉它！”陈代师长果断而又坚定地喊着。他走到墙边，用手作量着军用地图，测算着靳口到梁山的距离。

“敌人带着大炮……到底想干什么？”罗政委思考着，低声沉吟着。侦察员说：“听说是出来武力示威！”

罗政委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敌人主要是来寻找我们的主力，因为梁山地处津浦铁路西侧，直接威胁南北交通大动脉。日军想趁我立足未定，破坏新区建设。

师首长请来科长们，研究敌情和对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打。师首长当机立断，命令各部队马上作好战斗准备。

下午，陈代师长、罗政委带领连以上干部，登上梁山主峰“宋江寨”，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了山前每个村落、每条道路、每堵寨墙。然后，又

沿着梁山脚下的东西大道两侧转了一圈，观察地形，研究方案。最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把敌人围歼于独山脚下。

8月2日黎明，长田大队离开馆驿，开始向梁山方向进发。他们摆出一副“游行示威”的架势：前有汉奸队开路，后有几十匹骡马拉着大炮压阵，四路纵队排列的鬼子步兵居中，荷枪实弹，大摇大摆地走着。有个指挥员模样的鬼子，骑着大洋马，腰挎东洋刀，胸挂望远镜，趾高气扬，神气十足。这家伙就是日军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

我独立旅一团指战员，在青纱帐里隐蔽地靠近敌人，与敌人平行前进，战马的嘶叫声、武器的碰撞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骄纵的敌人却象聋子、瞎子一样，对我军的行踪丝毫没有发觉。当鬼子的大队人马离开王府集进入青纱帐时，侦察分队奉命对敌人进行了闪电式猛烈射击。开始，敌人一阵惊慌，哇哇乱叫。但见火力不强，又不恋战，以为碰上了几个“土八路”，便毫无目标地放了几炮，壮胆助威，继续西进。

中午，罗政委走出郝山头浓密的树林，站在高处，用望远镜眺望东南方。大道上不见人影，空中不扬烟尘，料定敌人离得还远，吩咐瞭望哨注意观察。自己回到树林里，从书包里取出一本线装《水浒传》，随口问身旁的一个参谋，“你看过《水浒传》没有？”

“小时曾看过。”参谋回答道。

罗政委笑笑说：“咱们现在都成梁山好汉啦！今天要劫的不是生辰纲，是日本鬼子的大野炮。”

午饭后，侦察员跑来报告：鬼子大队已经过了张家桥，正向梁山前进。

师首长走出松林，爬上高坡，站在几株大树中间，望见远处升起一团烟尘，只能看见一面耷拉着的“膏

药旗”在高梁梢移动。

日本骑兵慢慢走出青纱帐，一队队汉奸、鬼子步兵和两门用24匹骡马拉着的大炮，顺着大道朝前集方向走来，抵达梁山脚下。

为了把敌人引进伏击圈，麻痹敌人，师特务营一连派出几个化了装的战士，扮作“伪村长”和“顺民”，前去迎接“皇军”。长田敏江一见“良民”在道，更是傲气十足，仍然放松缰绳，缓缓而行。眼看敌人先头部队完全进入伏击圈，“伪村长”笑嘻嘻地对长田敏江说：“太君，我们到村子里准备水和饭，慰劳慰劳的，请稍等。”

此时，天已过午，烈日似火，人疲马乏，很需要吃饭休息。长田敏江点了点头，满意地说：“你的大大的好！”“伪村长”和“顺民”们迅速消失在村子里。

“是时候了！”罗政委朝作战参谋喊道，“打！”

埋伏在石头园的一团十连连长接到命令，立即开枪射击。霎时，从街口、坟后、树林里飞来一阵急骤的弹雨。骡马受惊，乱叫乱蹦，骑兵步兵，乱作一团。后卫部队调头要退，被尾追上来的我特务营二连一顿狠打，赶了回来。敌人的南面是一片水洼，难以逃脱。乱了阵脚的敌人，纷纷冲向西北，涌进前集，刚想占领梁山南坡制高点，又遭到埋伏在孟家林中特务营一连的猛烈射击。

日寇进入梁山后，还未见到八路军影子，便处处挨打，伤亡三、四十人。长田敏江气得七窍生烟，挥舞战刀，嗷嗷怪叫，命令炮兵朝梁山西南的山头轰击。半个多小时后，敌骑兵和伪军先在前集周围巡视一番，随之沿梁山脚下向西搜索前进，突然又调头西南踏上大道。

战场上的一切动态，在罗政委的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他发现敌人有溜走的架势，诱其就范时机

已到，马上对作战参谋说：“命令骑兵出击！”激越的军号声响彻山谷原野，师直骑兵连闻声出动，几十匹战马龙腾虎跃，骑士们喊杀声震撼山岳，拦截阻击，一阵猛打。

长田敏江耳听子弹咝咝作响，眼见骑兵来势迅猛，深感威严受挫，顿时肝火上升。他一面命令发炮助威，一面组织人马兵分两路，抢占了独山村和村外的乱石岗，并向四周进行了很久的火力侦察，然后放了岗哨，敌人就地休息。

师首长见诱敌入瓮的目的已达到，就命令各路伏兵转移独山四周，隐蔽监视；并亲自带领参谋人员，来到独山东北的坡地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

晚饭后，师首长和科长们与几个战斗部队的负责人，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罗政委分析敌我情况，主张下半夜打。理由是：敌人白天吃了大亏，上半夜一定戒备森严。上半夜不打，麻痺他一下，叫他摸不清头脑。鬼子们白天走累了、打乏了，上半夜又不敢睡，下半夜必定疲乏不堪。等他们睡了大觉，再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决定好战斗部署，各单位分头准备。

晚上，梁山周围一片寂静，天气如同白昼一样闷热。罗政委在院子里乘凉，不断摇着手中的芭蕉扇，驱赶着成群的蚊虫。值班参谋从屋里走出来，罗政委问道：“部队出发了？”

“出发了。”

“走！”罗政委站起来。司令部的人员随着师首长走出村子，来到独山北边的临时指挥所。

战斗部队摸着黑，按指定位置向独山村靠拢。战士们的右臂扎上白毛巾，作为夜战识别记号，不声不响地进入独山村西南角预定的冲锋出击地，隐蔽待命。

午夜时分，师部发起进攻的时

间刚到,侦察排长带着一个侦察员迅速摸到寨墙外面,听不到里面的动静。腾身扒上寨墙往里望,果然不出所料,鬼子上半夜加岗加哨,戒备森严,渐渐地松懈下来,官儿们不查哨,巡逻兵不游动,哨兵坐在寨门下打瞌睡,士兵躺在院子里睡大觉。侦察排长和侦察员干净利落地干掉了鬼子的哨兵,打开寨门。翻墙而进的突击排包围了一座大院,朝着横七竖八睡在院里的敌人扔进十几颗手榴弹,炸得满院敌人鬼叫狼嚎!战士们端着刺刀,冲进院里,把活着的鬼子刺死。

十连在外面的两个排,从打开的寨门中飞快地冲进村里,把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掉慌乱的敌人,乘胜抢占了乱石岗。

骑兵连从村西北角冲进村子。特务营二连攻进北门。独山脚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敌人如狼炸窝似的自相践踏,乱作一团,东奔西突,企图夺路遁逃。

重机枪手乘胜抢占了独山制高点,以密集的火力封锁、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长田敏江惊魂稍定之后,组织力量进行反扑。日军凭着精良的装备,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分成若干梯队,一次又一次攻上乱石岗,被坚守阵地的十连战士一次又一次击退。困兽犹斗,连续失败六次的敌人,又进行第七次反扑。这时,连长李广录率十一连战士迅速赶到,插入敌后,前后夹击,粉碎了敌人的最后反扑。

十二连战士在连长苟金礼的带领和指挥下,向独山东侧的土墙宅院发起猛攻。敌人见势不妙,便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一窝蜂似地拥向石灰窑东北方的寨围子,妄图夺路逃窜。我军迅速占领围墙处的有利

地形,以猛烈的火力迫使敌人退回院内。

长田敏江见四面挨打,气得哇哇直叫,舞动指挥刀,亲率残部冲杀。

我指战员面对穷凶极恶的仇敌,气愤填膺,怒火中烧,端起明晃晃的刺刀,趁着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的光焰,杀声震耳地扑了过去,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霎时间,院墙内外,村南树林,到处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不时地响起鬼子一声声惨叫。人民子弟兵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继续冲杀。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拳打、脚踢……。青年战士白民刚把刺刀从敌人胸膛里拔出来,冷不防被一个鬼子踢了个跟头,他翻身爬起,躲过敌人的刺刀,猛用双手紧紧抱住那个鬼子的双腿用力拉,将鬼子掀倒在地,另一个战士一刀刺中了鬼子的喉咙。侦察员小乔,眼明手快,机智灵活,连着刺死两个鬼子,又有两个围了上来。他急中生智,大声一吼,吓得鬼子一怔,随之扣动板机,击毙一个;另一个扭头就跑,小乔一个箭步上去,着力猛刺,后背进,前胸出,把鬼子送上“西天”。

敌人招架不住,不得不退回去,龟缩进石灰窑和车马店,企图固守待援。

这时,师首长来到独山脚下的一团指挥所,进一步研究了作战部署,重新组织了攻击力量。

罗政委兴奋地说:“竄犯梁山地区的骄横之敌,孤军深入,现已成为釜中之鱼、瓮中之鳖。你们务要一鼓作气,争取在明天早晨以前,全歼该敌,结束战斗!”

罗政委的一席话有力地鼓舞了一团指战员。他们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向敌人发起总攻。

独山高地上,十余挺轻重机枪

和掷弹筒,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射击。

十二连继续猛攻土墙院。高大魁梧的三营长刘阳初,光着膀子,端着机枪,亲自率领突击队,在机枪掩护下匍匐前进,冲到土墙院前,攀梯登上了屋顶,用刺刀挑开几个窟窿,扔进几颗手榴弹。随着敌人的嚎叫,战士李杰又一连扔进4颗手榴弹。敌人的嚎叫停止了,两名伪军跑出来高喊饶命。

十一连的指战员用机枪和手榴弹向固守在马车店院内的残敌猛攻。长田敏江急红了双眼,像发疯的恶狼,嗷嗷怪叫地狂跳着,挥动战刀,逼着他的残兵败将上阵拼杀。我指战员以刺刀、手榴弹为主,组成了强大的攻势,敌人一批批倒下。长田敏江左臂负伤,鲜血直流,拖着战刀缩回房中。敌人集中武器组成火力网,向我阵地疯狂扫射,阻止我军逼近。同时,调转炮口,连续朝东平朔方向发射,妄图用炮声报信求援。

石灰窑附近的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的几挺机枪在石灰窑里吼叫着,使十连的战士无法接近。这时,一位排长从旁边迂回爬上窑顶,插进驳壳枪向窑内打了一梭子。几十个战士乘敌人惊恐之机,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用镐头刨开坚硬的红土,在窑基挖透三个小洞,架上机枪朝窑内猛射。敌人再也撑不住了,一个个钻出窑门,颤抖着举起了双手。有个老鬼子撒腿想跑,我一名班长猛冲上去,用刺刀捅进他的后心。

十连和十二连的指战员,结束了石灰窑和土墙院战斗后,迅速逼近敌人的炮兵阵地。守护3门大炮的是长田大队的精锐部队,由一个白胡子兵带领。他见我战士陆续围上来,就组成几个小组,在机枪掩护下向我冲来。我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勇猛的冲杀,把敌人压了回去。

这时，代师长陈光来到了前沿阵地。他屹立在山岗上，挥着胳膊，向炮兵阵地高喊：“同志们，打到底，把敌人的大炮夺过来！”

首长的呼唤就是命令。班长曹大顺带领5名战士，从敌人背后猛扑过去，用手紧紧卡住鬼子炮手的脖子。伤员李占山用头把另一个鬼子撞倒在地。我军战士乘机冲杀过去，敌人的3门大炮被我所获。

东方发亮时，龟缩在马车店内的长田敏江感到末日来临，一面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命令残存的鬼子兵死守阵地；一面组织极强的火力，带领20多个鬼子拼死突围。他们打开一个缺口，四散奔跑，枪不要了，有的脱掉沉重的皮鞋，只穿着衬衫，狼狈逃窜。

我骑兵连立即追击。潜逃的鬼子，有的被当场击毙，有的钻进高粱地又被扭出，有的被当地老百姓打死，还有的被击伤抓获……

马车店内垂死挣扎的鬼子，把一挺轻机枪架在窗口扫射，掷弹筒从门窗里往外打。

十连、十二连围拢上来，一阵猛烈射击之后，有几个战士窜到墙根下，把集束手榴弹扔进窗里。敌人的机枪哑吧了。战士们端着刺刀冲进院内，把活着的鬼子兵一个个捅死……

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枪声停止了，战斗结束了。巍巍梁山展现出英雄豪气！

战士们一面清点缴获的武器、弹药等战利品，一面把横七竖八的日伪军尸体，用绳子拉在一起埋掉。其中，有个肥头大脑的胡子军官，一把大洋刀穿胸而过，倒在血泊中，被血染污了的胸前官徽上写着：“大日本皇军三十二师团长田大队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

独山战斗胜利结束后，新华社记者康茅召进行了战地采访。据被

群众击伤头部而被抓获的日本军医佐藤猛夫供认：“长田部队是1939年5月由东京来华的。在青岛登陆后，经过济南、济宁，没有休息就来到汶上，担任汶上警备区的警备。来华后的第三个月，长田部队就被消灭了。”

据闻：长田敏江跟日本皇室沾亲，曾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他佩带的那把军刀不是战利品就是奖赐品，来华前曾被“天皇”召见，所以他特别骄纵。当他带领步兵大队、骑兵中队和伪军大队，开始鲁西之行前，临时调给铁池炮兵一部，以壮其威。结果出师不利，抵达水游故地梁山，正好碰上我一五师东进支队的师部留守部队，一经交锋，便全军覆没。

梁山歼灭战，震惊了山东的日寇驻军。敌首尾高次郎调集了1000多名日军，出动百余辆汽车、90余辆装甲车，在飞机掩护下，从8月4日至月底，对梁山地区进行了报复性、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寻找他的野炮和我军主力，结果一无所获。他们那里晓得，大炮不适合游击战争，不能为我所用，已被拆开秘密沉入东平湖底；深深扎根于群众的一一五师所属部队也没有离开梁山地区，而是和群众在一起，利用青纱帐，与敌周旋。日本侵略者以损兵折将、彻底失败而告终。而我军却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愈战愈强。独山战斗后，仅半个月，梁山周围和东平湖畔就有3000多名爱国青年加入我军。这块自古农民英雄的聚义地，又成了当时反抗民族敌人的根据地。

为了团结抗日，共赴国难，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曾向蒋介石两次发出“报告八路军在鲁西歼敌战况战绩电”。现录电文于后：

一九三九年八月七日电

渝委员长蒋嵩密加表据陈代师长丰江午电报称敌人入鲁扫荡鲁西计划截至上月中旬止基本上被我粉

碎后鲁西战局暂告稳定我乘机分兵向津浦路及济宁至东阿公路小段破坏迭获成绩敌人防不胜防为保障该路安全驱我军计于上月三十日由济宁汶上抽出铁池长田两部共约步兵四百余东日由汶上西北进占新寨口（东平湖西岸）当我杨勇团一部接触为诱敌深入计冬日该敌继续西犯十时抵达梁山任村附近我即以师直特务营与敌正面保持接触杨勇团一部绕敌后与特务营夹攻该敌激战一昼夜战况甚烈直至江晨始将敌大部歼灭少数向汶上脱逃毙敌三百余俘日官兵二十四人事后计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七五小炮两门轻机关枪十余挺重机关枪五挺步枪百五十余支掷弹筒三个小型发报机兼无线电话一架电台一架有线电话兼收报机两架战刀十余把并缴获炮弹五百余发骡马五十余匹军用品文件甚多等情除飭速详讯俘敌口供清查文件具报并分报外谨闻朱德彭德怀叩虞朱印

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电

委员长蒋嵩密（加表）扫荡鲁西之敌被陈师粉碎后本月冬日复将山口长田全部歼灭各地敌老羞成怒东平汶上之敌亦于支日西开装甲车九十辆步骑炮兵千余在飞机七八架掩护下微日进至梁山附近寻我作战企图报复当又与我杨师团一部接触我以寡不敌众略事后撤敌于午后即分三路进占寿张集该敌现仍向我前进中估计该敌有寻我主力作战与逼我脱离鲁西地区企图巩固鲁西根据地除飭该师积极动员军民灵活机动给予报复之敌以重大打击并分报外谨闻朱彭齐印

这两封电报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对一一五师战绩的客观表扬。

（注：电报中的数码代字——东为一，冬为二，江为三，支为四，微为五，辛为八）（责任编辑 王 恂）



民国初期临城劫车案的台前幕后

● 赵炯

1923年5月6日2时50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快列车行至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沙沟间,被孙美瑤匪股拦劫,劫去中国旅客71人,外国旅客(当时称西客)39人,制造了轰动国内外的“临城劫车案”。因孙美瑤集团同多种政治势力甚至国际势力有联系,背景复杂,加之案情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充满戏剧性,以至对其性质的认定长期存在分歧。有人说是“土匪抢劫”,有人说是“农民起义”,有人说是“帝国主义插手的军阀政客争夺阴谋”。新闻报道、史学专论、小说、电视,众说纷纭,沸沸扬扬70年。孰是孰非,需要从源头说起。

孙美瑤集团是乃兄孙美珠于1920年拉起的。孙美珠,清末秀才,有谋略,广交游。初建时的武器弹药,是通过青帮大字辈老头子、峄县人张聘卿,从上海德国洋行购买的。因张聘卿当时秘密接受孙中山委任的广东革命政府江北招抚使的职务,见孙部可利用,就报请广东革命政府,颁给孙部“山东建国自治军”的番号和关防,委任孙美珠为总司令。为了改造这支土匪武装,广东革命政府还派出了曾在日本学过军事的老同盟会员夏慕尧充当孙部参谋长,张聘卿的得意门生、曾在孙中山卫队供过职的丁开法任参谋处长。“五四”运动时,曾任济南蚕桑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朱陶,以广东革命政府鲁南招抚使的名义予以协助和联络,从而使孙部力量迅速壮大。正因如此,引起了国内外各政治派别的关注;一时不速之客纷至沓来。

奉系张宗昌反应最快,捷足先登。

张宗昌此时刚在奉系站住脚,但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正积极策划入鲁,得知孙部消息,以为天假其成,立刻报告张作霖。当时正值奉直两派风云突变,剑

拔弩张,战事迫在眉睫,如能有这么一支力量在苏鲁边界策应,当然求之不得。张作霖命张宗昌设法招抚。张宗昌立即命褚瑛玉同孙部头目褚思振联系。二褚本是族兄弟,当年曾一起在苏鲁一带为匪,后被张宗昌招抚。张宗昌江西失败逃往东北,二褚回到苏北老家。褚思振重操旧业,拉起五六十人的匪伙,出没于鲁南山区,后投孙美珠入伙。褚玉瑛后去东北重依张宗昌,而今已是奉军师长。褚玉瑛说明招抚之意,褚思振自然满心欢喜,当即报告了孙美珠,孙同意商谈。于是奉系派出旅长冯占元作全权代表,携大洋三千作为进山礼。孙美珠见条件优厚,答应相机配合奉系行动。

冯占元前脚走,后脚郭其才就带了毛思忠、毛恩义兄弟来见孙美珠。孙同二毛原也不生,二毛原是郭安旧部,被张敬尧招抚后,同郭其才一起去湖南。张敬尧失败后,二毛去天津经商,现遵皖系之命,入山招抚,当面宣示段祺瑞旨意,带来短枪10支作为进山礼。皖、奉正联合反直,孙美珠满口答应相机配合。

不久,在薛城替孙美珠负责联络的东洋留学生尤吉三,介绍了一名叫张建培的人前来见孙,但没说代表谁。晤谈后才知道,原来此乃日本人,是曾任北洋政府边防教官的尹藤集吉。这次是奉日本关东军之命,前来联络孙部,尹藤集吉同尤吉三在日本是同学,关系密切。他代表关东军极口称赞孙美珠是当代英雄,劝其自成局面,关东军可援助武器弹药,并愿意派出教官协助孙美珠整训军队。他本人亦愿留在孙部为其出谋划策,充当顾问。孙美珠表示欢迎他当顾问,接受武器弹药,但不要日本教官。此后,尹藤集吉就以张建培的名字,来往于孙部和关东军之间,杆内匪众称其为“洋参谋。”

从此,偏僻的鲁南山区、土匪出没的荒野野岭,也成了国内乃至国际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场所。

各种政治势力在孙部频繁活动,似为直系所觉察。为了消除鲁南匪患,解除后顾之忧,直系控制的北京政

府遂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督率所辖部队进剿孙美珠部。田中玉任命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接替其部曾发生哗变的唐天喜为兖州镇守使，率部对抱犊崮山区进剿。开始连连吃亏，时间一长，摸透了土匪内部情部及其活动规律，他们抓住匪众弹药缺乏、补充不易的致命弱点，采取隔绝山内外联系、步步进逼、穷追猛打等战术，到1922年，孙部已处境困难。为了摆脱困境，孙美珠采取了收买老五师，拉拢二十旅，打击第六混成旅的策略，并以“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名义，发出了致山东第二十旅的公开信，内有“国家多故，权奸当路，心怀报国，事与愿违；……吾侪皆血性汉子，不幸应兹时代，为势所迫，遂入此途。但窃钩者罪，窃国者侯。我国各文武，各官僚，皆掳掠民财之辈！”等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孙美珠率部长途奔袭距抱犊崮百余里的官军兵站西集，巷战中孙美珠中弹身亡，这对孙部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重振旗鼓，众匪首公推孙美瑤继承乃兄“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之职。孙美瑤时年26岁，年轻气盛，身材短小精悍，性情暴躁，刻薄寡恩。他虽报仇心切，但远无乃兄的才干，无计打破官军围剿，只得承袭了乃兄主意，同奉、皖各派政治势力联系，求得他们帮助。并于1923年初，发出《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通告》，表明政治态度。六旅明知其有政治背景，但却置之不理，依然步步进逼，山内外联系基本切断，孙部不仅枪弹补给完全断绝，衣食住行亦感困难。

1923年3月间，六旅一团二营在临城“人和客店”查获一涉嫌人员，立即带回营部交营长杜吉卿审问。杜一见大吃一惊，认出此人原是从前保定军校的老师。当时杜在步科，此人在一期辎重科任排长，故杜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杜。讯问时他自称粮商，但内行人一望便知是冒充的。杜问他从前干什么，他说一生就是干粮食生意。杜便屏退左右，直接问他：“您是不是任过保定军校辎重排长？”并指出他冒充粮商的种种破绽。他立刻神色大变。杜告诉他自己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念师生之谊，保证安全无事，他才放下心来。原来此人叫聂成章，是奉段祺瑞的安福系差遣，给先前已进山同孙部联系的代表送点款子。杜告诉他，带着这么多款子，不要说进山，就是山外的“红枪会”区域也难通过。眼下政局变幻，形势正紧，留在这里很不方便。当夜，杜亲自将其送上火车，返回天津。

正在危难之际，尤吉三转来“洋顾问”尹滕集吉的话，要孙美瑤保存力量，切忌硬干，最好能制造大的事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有人说，劫车制造国际事端的主意是安福系智囊徐树铮同尹滕集吉合谋的。总而

言之，日本人是主谋。明显证据，就是平时津浦线特快列车日客很多，案发时车上却竟无一日本人。走投无路的孙美瑤，立刻接受了制造国际事端，使北洋政府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对其下手的主意。

二

1923年5月5日夜。

王继湘于火车到达前，带领匪徒将临城至沙沟间的铁轨拆掉两节。6日2时50分，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快列车准时开来。当司机发现路轨被拆，为时已晚，车头和二等客厢两节出轨，幸无人员伤亡。埋伏的匪徒破窗而入，车内潜伏匪徒立即内应，迅速将车上的值钱物品及部分中外旅客劫掠而去，走出数里方鸣枪示威。当地驻军闻讯赶来，双方交火，英人罗士满被流弹击毙，其他旅客害怕，要求停战。孙部即派一西人台氏，带一翻译和信件前往官军交涉，声言如再穷追，则枪杀西客。追兵鉴于枪杀外国人责任重大，即停止追击。案发后，驻防沙沟的六旅四连王连长赶到营部报告。营长万伯龙接报后，知大祸临头，立即组织追剿，在大山口追上匪徒，但怕误伤外国人，只得撤回请示。

山东督军田中玉接报后，深感此案关系重大，为摆脱责任，决定亲赴枣庄处理。谁知此话传到六旅何旅长耳中，何锋钰当即将此消息秘密通知到营长以上军官，并密筹对策。将军队集结到铁路沿线，并与各主官约定，暂不单独与田中玉见面，以静制动，观察动向。

田中玉车抵兖州，见站上既无仪仗也无军警，心中愕然。下车老半天，才见何的参谋长姗姗而来。田一肚子火，劈头就问：“你们的队伍呢？”“奉命进山剿匪还没回来！”田愤而前行，沿途滕县、临城等站均无人接待。只好找刚调来的直隶部队打听，才知何锋钰在枣庄。赶到枣庄，车站上也冷冷清清，不见何的踪影。田只得传见何，但何称病不见。至此，田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何对他的成见已是很深了。自己若再拉硬弓，这“何二虎”若发起邪来，雪上加霜，于己不利。无奈，只得屈尊就教，只身简从，前去探病。见面田就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还闹脾气。”何说：“正生病呢。”二人谈了如何营救外国人和同舟共济的话。田出来才发现，何宅内外戒备森严，由二团长贺丹墀亲自担任警卫，他深深吸了口冷气。

何锋钰深感案情重大，唯恐外国政府提出苛刻要求，上面拿他当替罪羊，当夜派人携亲笔信赴上海，向正做上海护使的乃兄何丰林详述一切，要乃兄先田中玉向外国人疏通，讲明疏防责任全在田中玉一个。何丰

林接信后,当即邀请各有关国家驻沪领事开了个茶话会,详述案情发生和责任所在,并特意说明乃弟正率部营救,望各国朋友谅解。茶话会十分成功。何丰林还向来人交待,倘不幸事件扩大,对六旅的支援及收容工作都有安排。何锋钰这才安下心来。

5月7日,各大报连续报道临城劫车案,全国舆论大哗。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急电国务院有关各部。浦口铁路局亦急电交通部。北洋政府各衙门知道事情棘手,互相推诿。

但洋人并不推诿。驻京五国使团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政府保证各国被劫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并严惩各级失职官吏。北京政府感到事态严重,只得下令将田中玉、熊炳琦交陆军部、内务部议处,向洋人作出姿态,先行搪塞,同时又将事件全部责任委之田中玉,令其亲往枣庄,负责同孙美瑶谈判。

孙美瑶方面却并不慌张。当所劫中西“肉票”全部入山后,孙美瑶便召集各路“当家的”会商,通过什么关系才能同北洋政府较高层次接谈谈判渠道。大家正愁没有合适人选,褚思振进来报告,被劫旅客中有个叫杨其山(毓珣)的,是他原来在北洋军中的上司。此人大有来头,是袁世凯的女婿,同北洋政府上层人物都很熟悉,充当联络人最合适。

褚思振把杨其山找出,十分客气地告诉他,自己是被官府所逼,实在没法生活,才不得不重操旧业。您是我的老上司,决不能让您在此受苦。杨正惊魂未定,生死未卜,忽遇老部下相救,自是感激不尽,请褚赶快设法。褚说已同“当家的”说好,立即放您回去,但要捎封信给田中玉,其实这与您大有好处,不然您很快就回去,难免招人怀疑。杨当然满口答应,并说自己同田中玉很熟,有事好商议。第二天一早,杨就下了山。

杨其山满以为将信交田中玉就可回家了,谁想田中玉看了信中所提条件,又询问了山中的情况后说:“毓珣兄,我看一客不烦二主。您既从山中来,土匪就认识您,那就请毓珣兄再辛苦一趟,进山同孙匪交涉。把‘票’说成,也是功德无量。”杨十分不情愿,但因已涉足其中,也不好推辞。田又请出了峰县青帮大字辈老头子李麟阁、孙家的亲戚清末翰林崔广沅同杨一起进山。与此同时,田中玉命何锋钰率六旅进攻抱犊崮。交火一天,因官兵不积极,双方无人员伤亡。田中玉企图给孙部施压的措施未奏效,反被孙部看出了官方急于救出“肉票”和投鼠忌器的心理,条件亦趋苛刻,并以“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谈判通告,内有“吾同仁既不畏内,又不惧外,丈夫处世,敢作敢当,进退自如,有何嫌乎哉!国存于斯,国亡于斯,吾国人戒令慎之

审之可也”之语。同时撕掉“华票”5名,并扬言如再延误,要撕掉“西票”。

北京政府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急电田中玉、熊炳琦到京,并邀参加内阁会。田在会上力主进剿,并提醒说:“匪方竟用建国自治军名义直接给我写信,恐含有政治作用,应请政府特别注意。”会后,北京政府明令山东军务帮办郑士琦、交涉专员冯国勋移驻枣庄。田中玉又商之苏督齐燮元,转派徐州镇守使陈调元、交涉员温世珍前往襄助。5月12日,田中玉车抵枣庄,下榻中兴煤矿听取汇报,并邀请前政府顾问、总税务司美国人安德森以调解人的身份参加谈判。5月13日,双方在中兴煤矿举行第一次谈判。当天草签一项协议:一、官方立即将包围抱犊崮的军队撤至峨山口一线。二、孙部改编成师,自择驻地,山东官长不得调动。三、官方发给孙部三个月军饷。上述一二项实施后,放还第一批“外票”;第三项实施后,“中外票”全释。

此时,各国政府已觉察到此事件只是个别希图挑起内战的军阀政客施展的阴谋,并察知有国际背景。事后日本人推波助澜的活动,特别引起各有关国家的警觉,显系想挑起英、美各国同直系军阀的冲突。鉴于此,英、美各国除强烈要求保住侨民生命安全,对孙部勿操之过急外,并没提出什么苛刻要求。

为了说服孙部降低条件,请来了早已洗手不干的大杆首郭安入山劝说,同时派两架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撒传单。此时孙部意见分歧,孙美瑶等人主抚,而丁开法、王继湘、朱陶等人反对受抚,孙桂枝居间折中。这显系政治思想和斗争目标不同所致。

与官方同孙部讨价还价紧张谈判的同时,民间救援活动也开展起来。首先,上海总商会派出冯少山、闻兰亭、孙筹成等人,带部分救援特品和医疗队前往枣庄,接着北京、天津等地商会也派出了救援人员。为了便于行动,成立了“全国各公团驻枣庄联合救济会”,统一安排救济事宜。由于官、民多方努力,6月2日孙部放出第一批“西票”8名。又经过反复协商,6月12日,各方代表在峨山口签订了保证书。

安德森给孙桂枝的保证书:“鄙人安德森,美国人,中国之生死至友也。鉴于山中诸兄弟之苦况,并屡次会议,今鉴于诸当家表示之忠诚,言辞恳切,情愿投诚。鄙人愿担保诸兄弟编入军队为官与兵,不过三千人;政府担任二千七百人饷,其余三百人饷由众当家自任。鄙人并愿担保诸兄弟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饷项由政府按照阶级按月照发。此项担保,自签字之日起以三年为限。诸兄弟投诚之后,为国为民,应表示爱国热诚,恪守军纪,使国人皆

知诸兄弟为国服务，并赞扬诸兄弟个人牺牲之精神也。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安德森(签字)。

证人：孙筹成等十人(签字)”

孙桂枝交安德森的保证书：“鄙人孙桂枝代表众兄弟，愿受招抚编成国军。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作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并代众兄弟郑重声明：对于安先生亲信不疑，对于安先生担保永矢遵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孙桂枝(印) 证人：(同前)”

当日孙部即将“外票”全部释出，“华票”仅释4人，而谈判代表陈调元、吴邦植、黄参谋长及证人全部留在山中为质。洋人既已放出，北洋政府也就放了心，主办人田中玉于13日即将进展情况密电大总统、有关各部及各政要。北洋各政要如释重负，田中玉却并不轻松，深恐当局拿他当替罪羊，分电曹锟等北洋实权人物，一面为自己开脱罪责，一面窥测风向。

孙部编制，经吴邦植与孙美瑶反复协商，编为一旅二团。孙任旅长，郭琪才、周天松分任一二两团团长。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朱陶任旅部书记官。丁开法任旅部卫队连连长，兼一团一营一连长。6月25日，先开出两个连暂驻郭里集，其余相继开出。孙部以新编旅的名义出榜安民，军民相安无事。北洋政府并未处理任何人，仅将何铨铨由兖州镇守使调任曹州镇守使，以张培荣继任兖州镇守使。

此事本应结束了，就连孙美瑶也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但山东督军田中玉、帮办郑士琦却认为事情并未结束，还缺一幕。第一幕是孙美瑶在他们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突然拉开的，这最后一幕他们决心在孙美瑶也毫不知晓的情况下突然降下。于是一幕精心导演的压轴戏，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三

与孙部进驻郭里集的同时，北洋五师十七团进驻近在咫尺的枣庄。为了便于监视孙部活动，团长吴可璋被任命为枣庄驻军营务执法处处长。吴可璋觉得得到上司信任，对分化瓦解孙部十分卖力。他首先拉拢孙部一团团长郭琪才，吹捧他治军有经验，是将才，暗示他比孙美瑶强，可接替孙。郭于是视吴为知己，渐同孙疏远。继之，吴可璋又拉拢掌握孙部精锐，又贴近孙的卫队连连长丁开法。但丁不吃这一套，于是吴就决心除掉他。吴听说丁劝孙不要整日玩鹌鹑，说孙“玩物丧志”，孙大怒，两人曾发生口角。吴便乘机对孙说：“连长仅是

个下级军官，还能容他不服从吗？往后如再发生这类事情，您不便处置，可送营务处来，我替您办。”孙没表态，但深以吴言有理，对丁渐生厌恶。不久吴对孙说：“最近上面得到报告，说您部有革命党活动，要我查办。据我调查，丁开法就是革命党，外面盛传他不久就要行动。现在看若不及早除掉，您自己也说不清，对上面您也交待不了。希望您当机立断，迟了可就后悔不及了。”这一招果然有效，孙怕连累自己，竟于11月23日下午，将丁诱杀于旅部，这下在孙部震动很大。第二天朱陶、刘玉斗、朱东渠即不辞而别，逃往上海。广东政府对孙部的工作宣告失败。

对这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孙美瑶竟毫无觉察。他自当旅长后认为万事大吉，办的第一件事是回家祭祖；第二件事是去济南晋见田中玉；第三件事是忙着结交军政要人和地方豪绅，天天送往迎来。有人告诉他，您虽是旅长，但一不是军校毕业，二不是行伍出身，同军界素无渊源。要想在军界站住脚，并能步步高升，非得找个在军界负有众望的老头子做靠山不行。于是经人介绍，拜在了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的门下。自此，张便以尊长自居，对孙多有指点。孙也以为有了靠山，从此真的成了北洋军，可以高枕无忧了。枪杀丁开法，朱陶、刘玉斗等人逃走，引起内部人心离散，都没有使孙美瑶有所醒悟。倒是吴可璋欲谋旅长心切，有些沉不住气了，竟直接劝孙辞职。孙美瑶一听，大动肝火，严词拒绝。恰在此时，吴部抓获8名流氓，内有一个乃孙之族叔。孙派人交涉，要求将人犯解孙旅处理。吴亦严词相拒，不给面子，这对孙无异火上浇油。正巧孙部士兵在枣庄街上同吴部发生冲突，孙部人少，被殴逃回，又向孙烧了一把火。孙当即带领手枪队六七十人包围了吴的团部。孙美瑶手执盒子枪沿街叫骂，吴可璋紧闭营门严阵以待，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商店关门，市民走避。后经地方绅商名流出面劝解，方得平息。吴可璋乘机急电郑士琦，声称孙部哗变。郑密电兖州镇守使张培荣相机处置。

张培荣匆匆赶来枣庄，下榻中兴煤矿，声称要排解孙、吴纠纷，邀约当地绅商人士谈话，并告诉众人，过几天前来备酒与孙、吴双方和解，请大家作陪。众人齐声应诺，感谢他为地方做了件好事。临别时又嘱众人给吴可璋捎话，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不可报告督军，闹大了都不好看。然后又电话邀孙美瑶晤谈。孙以师礼相见，并诉说本部所受屈辱。张以尊长口气连说：“太年轻，太年轻！胡闹，胡闹！您现在是将官了，对团级人员这种态度，岂不成了笑话！”孙无言以对。张又凑近小声说：“我现在很忙，苏鲁边界很不安静，昨天就有三封急

电催我派队进剿。等我把队伍派出去,有了时间,我备酒给你们和解。冤仇宜解不宜结,越结越深,这很能误大事。”临别,张又叮嘱孙约束部下,别再出乱子,并说:“只要咱没意见了,他们是不会再有意见的。”张当天返回兖州,很快枣庄附近的部队纷纷调往苏鲁边界郯城一带,孙部周围再无别的部队。几天后,张培荣轻车简从来到枣庄;制备盛宴,柬请孙美瑶、吴可璋及两部校级以上军官次日赴宴,并广邀当地绅商名流作陪,人人都知张是专为充当和事佬而来。

夜幕降临,张培荣开始了他此次来枣庄的真正活动。离兖州前,他已派专使召吴锡九团星夜回防,务于黎明前赶到郭里集附近待命。现又密令兖州马登瀛团登车待命,所辖津浦路沿线各站戒严。夜深,召吴可璋于密室,面受机宜,令吴明天负责招待孙部校级人员,借机歼灭,勿使一人漏网。要求各处理伏人员一律穿便衣,除利刃外,每人带短枪一枝,以防不测。

第二天早饭后,应邀作陪的各方头面人物陆续到齐。9点多钟,张培荣电话催请孙美瑶及所部全体校级人员速来赴宴,并特别嘱咐一定要把那只好鹤鹑带来斗斗,虽不在乎输赢,但也要睹个彩头。孙听后满心欢喜,迅即集合全体校级人员和少量随从前往。众人听说赴宴,又斗鹤鹑,无不欢天喜地。只有孙美崧临时说肚子疼,不去了。

中兴公司东门外早有人迎候。孙部一到,几名武装随从就被吴部几位副官连推带拉地让进厢房,里面酒菜早已摆好。接待人员赶忙把他们的武器摘下挂在墙上,推入座位就劝酒。二门外,吴可璋早带一群军官等候多时,见孙美瑶等人一到,便赶忙迎上行礼,热情地将孙部校级人员让进别院,并亲切地说:“张军门正在里院恭候孙旅长。”此时只剩下孙美瑶一人,孙略一迟疑,手本能地伸向腰间,摸到枪身,长年的土匪生活使他警觉异常。这时二门有人一面让他进去,一面高喊:“孙旅长到!”只听里面高喊:“请!”事情都在瞬间,容不得孙再犹豫,便进入了二门。只见张培荣带领众人已在大厅前降阶相迎。孙心中立刻平静了下来,正要紧走几步向前见礼,预伏在过堂内的两名便衣便尾随而上。一人急步上前,伸手摸孙胸腰间,孙喝问:“要干什么!”言犹未尽,另一人一把石灰拍向孙的双眼。孙知不好,一手捂眼,一手向腰间摸枪。前一人顺势将其猛按,后一人迅速抽出刀来,手起刀落,将孙美瑶人头砍下。来宾见状,惊得魂飞魄散,有几个立时瘫倒在地。张培荣平静地对众人说,此来是专为诛杀孙美瑶,别无他事,要众人在客厅静候,不要外出走动。

厢房内,副官们也按计划将孙的随从们囚禁起来,

只是没听见别院吴可璋的动静。急忙派人探望,只见孙部校级人员慌乱一团,吴可璋并没按计划行事。原来是吴可璋的旅长梦在作怪。从张培荣处回去后,吴认为当旅长的机会已经到来,竟异想天开,想等张除掉孙后,自己以不杀之恩结纳孙部校级人员,使其拥戴自己为旅长,统率孙之旧部。所以吴根本没就执行张的计划,而是将张的计划合盘托出,并说明己意。张培荣闻知吃惊不小,唯恐节外生枝,当即宣布戒严,断绝中兴公司内外往来,并飞令吴锡九团迅速将郭里集严密包围,断绝内外交通,外窜者格杀勿论。同时急电马海峽团火速增援郭里集,勒令孙部缴械,令所辖津浦路沿线严格检查,发现孙部官兵一律扣押。这一切安排就绪,他才对孙部校级人员说:“枣庄事件罪在孙美瑶一人,现已伏法,与你们无关。我保证你们原职原薪在本镇使用,如不在本镇服务,可发给一定银饷,另谋高就,何去何从,悉听尊便。”所有校级人员均表示愿在本镇听从差遣,为镇守使效劳。张说:“很好,我决不会亏待你们。”然后又说:“郭里集现已重兵包围,你们可选代表,携孙美瑶首级回去劝喻部众缴械。凡遵命缴械者,赦免罪恶,资遣回籍,安居乐业;抗命妄动者,就地处决。”校级人员均表遵命,派代表携孙的首级去郭里集传令。

郭里集孙旅部众毫无戒备,忽见有军队包围,陷于慌乱,群龙无首,不知所措。代表说明情况,传达张培荣的命令,个个惊慌失色。又见孙美瑶的首级,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只得俯首听令,缴出武器,听候发落。只有孙美崧机警过人,上午见所有头目集体离队赴宴,即有所警觉,托故没去,并密切注意周围动态。及至发现周围出现大量军队,就知有变,并断定事态严重,恐难抗拒,当机立断,三十六计走为上,立即带领四名亲信,凭借地形熟悉,趁合围未实,跳出包围圈,经蒙阴、新泰、济南逃往天津,几天后由天津乘船转往上海。

孙部士兵缴枪后,每人发三月饷银及免死证一张,由官方押送回籍。枣庄营务处随之撤销,吴可璋调回济南。12月20日,郑士琦密电上峰,报告对孙美瑶集团最后处置情况。至此,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才最后降下帷幕,孙美瑶集团被彻底消灭。

孙部校级人员各奔前程,自谋出路。只有临城劫车案的核心人物之一、“老当家的”孙桂枝,在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运河支队,并在峰县抗日大队中担任基层干部,直到1968年以89岁高龄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 王 恂)

“文革”中“苦中作乐”的“干校”生活

● 骆子程

公元1969年的冬天，那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风刀霜剑的政治严冬和自然严冬。一个北风凛冽、飘着雪花的清晨，三、四辆敞篷军用大卡车，载着黑龙江省部分党政“当权派”数十人，离开省城哈尔滨沿着泥泞、坎坷不平的被冰霜盖着的土路向西北方向行驶。经过七、八小时的颠簸跋涉，来到远离省城数百里的一个名叫庆安柳河的地方。这时是名噪一时“干部下放劳动”、“吃小米”、“爬大山”、“自找苦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七”干校。然而我们这伙乘车来到这里的人，却没有这份光荣。虽然我们这些人“文革”前有的是省委书记，组织部、农工部、工业部的部长，以及机关的处长，报刊的总编等，但此刻都是“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土匪”等人民的“敌人”，我们被送到这里来是接受另一种形式改造的“黑帮”。跟车押送我们的，则是“最忠于毛主席的响当当的革命派”。这几十个人来到山沟荒原以后，被安置在干校附近原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的破旧马棚遗址旁边，里面有六到八面土炕，炕上铺着几领破炕席，大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一大间土屋里。

在这帮人中间，最大的官，被造反派称之为“黑帮头子”的杨易辰（那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当他得知把我们从小哈尔滨赶到这里的缘由后，颇有所思地对我咬着耳朵说：“怕老毛子从北边打过来，咱们这帮人当维持会呀！”

这数十名“囚犯”安顿下来之后，被编成若干个班，分成炊事、拉车、伐木、和大泥、割草等若干个劳改小组，由看管我们的那两个小头目统领，早晨5点多钟起炕，晚上8点多钟熄灯，上下午两段外出劳动，步行到离驻地数里外的山坡、荒沟、野地里割草伐木。十一、二月的柳河，一大早霜凝山野，哈腰下去割草，手冻得生疼。我们手拿镰刀，身背车绳，一步步艰难而勇敢地，在柳河开始了由“造反派”强加于我们的、奴役般的“劳动改造”生涯。

那年头，农业生产遭灾，闹饥荒，咱们的早饭吃的是巴掌大的两块包米面饼，午饭晚饭是黑面馒头和大头菜、土豆。“文化生活”，是一名“囚犯”自带的小半导体，晚上被允许放在煤油灯下的木桌上，听“中央文革首长”指示和广播电台播放的许多都是“假大空”的新闻。此外，禁止我们阅读一切报刊，原因说是这帮人已“定性”，属于“敌我矛盾”，剥夺一切政治权利。那年月怪事多了也就不怪了，非党造反派一伙人一起哄，就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国家执法机关公、检、法被打翻，一伙人只要打着“造反”旗号就“有理”，就可以私设公堂，给老干部定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搞所谓“群众专政”、“专案组定性”等等。

在当时，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强的信念：你江青、张春桥这些坏蛋，以“莫须有”罪名诬陷我们这些人都是“敌我矛盾”，那是注定算不了数的。相信群众，相信

党。经受考验吧，既来之，则安之。

好多活不会干，只能学着干，干中学。上山伐木，我们二人或三人分成一个小组。有的身带草绳、锯，多数都肩扛撬杠，穿的都是破旧的棉衣和鞋。爬上山，由懂点伐木活计的人先选树棵，注意几步一个间隔，实行间苗式砍伐。树定准后，按分工，掌锯的蹲下来拉锯，快锯断时，一旁有人负责高喊“闪开”，于是大家朝树倒的相反方向散开。待被伐的树枝吱吱呀呀地倒下了，我们动手砍掉大树叉子，再去锯下一棵。伐下的榆树、橡树、柞树等硬木，准备作梁柱用；伐下的桦树等准备做窗户框、炕沿用。伐够一定数量，就按分工分头抬扛，大一点的树三人扛。扬易辰总是抢先扛大头。下山时，为了统一步伐，喊着号子，互相鼓劲。从山上扛到盖房子的地点，有几里路。数九寒天，累得浑身是汗，休息时冷风一吹，难受至极。此时此刻的我们，虽身处逆境，遭受的是不公正待遇，但常常因为劳动有了成果而甚感欣慰。树叉挂破手，爬山崴了脚，谁也不吱一声，磨练自己的意志，掌握劳动的技能。

和大泥脱坯，又脏又累还不好干。挑土，做穴，打麻刀，倒水，用锄头、二齿子搅和，直到土、水、麻刀和在一起并达到足够的均匀为止。天冷，手僵，出上一身汗，泥还和不好。看押我们的人故意刁难李剑白（那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后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数九寒天，命令他脱光鞋袜，跳到泥里用脚踩。这怎么

能难倒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呢！

尽管那是的李剑白已五十多岁，但他刚毅不屈，二话没说，脱下鞋袜跳到泥里，神情泰然地踩起来，这一幕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我管脱土坯，把泥装在木模子里，用手磨平、磨光、磨实，两手抬起模子，一块土坯便脱了出来。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止，直至收工。累得我们一个个腰酸腿痛。

经过一番艰苦创业，我们一共盖起了120平方米面积的土平房，里面四铺大土炕，铺上新炕席，坐在上面，睡在上面，心里有时也涌现一股“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的欣喜之情。也可以说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吧！记得1969年11月，我在劳动时还曾得诗一首：“江湖浪迹几十秋，露宿风餐惟国求。血洒民主头颅掷，依旧骑骡疾风头。”

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杨易辰、李剑白干得很出色，谭云鹤（那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后来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心灵手巧，干上了安门窗等细致活计。

从山下往山上挑水，基本上是由我和杨易辰包干。一挑水大约四五十斤，从山下一二里之外挑来，二三十度斜坡，一步一步往上爬，可真叫劲。爬一趟一身汗。一次杨易辰说：“老骝，他妈的一裤兜汗哪！”我应道：“可不是。”我们俩每天上坡下坡跑七八趟，供几十人喝水、做饭、洗衣，水缸总是满满的。直挑得肩膀上生了老茧子。当时我曾想过，等问题搞清了，还了我清白，当个平民百姓，住到农村去给军烈属挑水，不也是人干的么！我们这些人，当时就是把造反派给的惩罚当作自己的锻炼机会。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了，人们说我腰板直，精神好，手脚利索，恐怕和那段劳动锻炼不无关系吧！

冬天烧炕，我和王一伦（那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现已逝世）一起干。先到屋外山上拾来干柴作引子，堆到炕口，点着火，再加木头、树枝，火旺后，插上湿一点的柴，这样保证火炕一宿暖和和的。照看守的规定，只许我们干活，无事是不准“乱说乱动”的，诸如不准单独下山买日用品，不准打酒喝等等。我们也实在困倦了，一天傍晚，趁看守不注意，在杨易辰等支持和掩护下我偷偷溜下了山，到柳河“五七”干校商店去打酒。那时，我的大孩子路珊珊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这个商店当店员，他自然会给我们方便的。我找个大药瓶子洗干净，用来装酒。万一看守发现，就说是止咳嗽药。买回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晚上熄了灯，看守不在了，我们躺在炕上，脑袋都朝着同一方向，摸黑把酒瓶拿到手，每人轮流喝上几口，一来解闷，二来求个暖和。在那漫长黑夜里呷的一口口酒，其苦辣酸甜的滋味，至今难忘。

如有人问：你们当时想些什么呢？一句话，就是盼着“天明”。可以吃尽千辛万苦，“黑帮队”可以蹲上十年八年，只要分清是非，还自己一身清白。造反派可以一时剥夺我的一切权利与自由，但他们绝不会长久。那时我们常说一句歇后语：“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但这只“手”能遮多大一片天呢？虽然那时我们并不清楚何时能结束这场苦难，但决心亲眼看到这场“内乱”闹剧的终结，坚信江青、张春桥之流和一切倒行逆施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在柳河，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大约是1970年的一个中午，我们下山劳动，拉车运东西，路过“五七”干校门口的三岔路口。拉车是轮流拉前套，刚好换下我来，独自走在后边，迎面走来一位高高个子，戴眼镜的“五七”战士，远处没看清，



在柳河干校时的杨易辰
（照片系其女儿偷拍）

到近处才发现是高衡，我的老熟人，好朋友。他是原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后来担任过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市的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我在黑龙江省当共青团省委书记时，我们常在一起，兴味相投，都爱好读书，富有革命理想，注重友谊，忠于自己的工作 and 事业。他在德都搞的“乡村萌芽师范学校”，培养新的教师人才，实行半耕半读，很有创造。此刻，他一见我就本能地停下步，但欲言又止。当时，我也有同样的心情，一见便想直呼其名，可一想到自己是“黑帮”，他是“五七”战士，便一低头，不说话，像是素不相识。但我知道，此时他快快，我也快快！

回忆起1949年10月1日，我俩一同参加开国典礼，望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热盈眶的情景；回忆起五十年代初，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我俩同去齐齐哈尔火车站，送新中国第一名女拖拉机手梁军出国访问的情景；回忆起我俩在齐齐哈尔，向龙江青年讲述《牛虻》一书，

畅谈学习牛虻爱国主义精神的情景……更为这次“故人相见不相识”而伤神。

在辛苦劳动，没完没了地被审查和挨批挨斗之余，我们也常利用雪天雨日自制一些日常家用的小工具以作消遣。杨易辰从山上捡来一个柞木疙瘩，精雕细刻好容易抠出一只干木工活用的刨子要送给我，我不好意思要，彼此礼貌相让，一旁的岳海（当时被诬为“胡风分子”）同志说：“你们不要我要！”杨说：“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哟！”第二天，看守又着腰，在对我们全体“黑帮”训话时，先点杨易辰的名，又点我骆子程的名，说：“你们背后搞的什么鬼？借古讽今，还要反党吗？”接着又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教训了一番。整得我们突如其来，不知咋回事。后来我们才想起杨易辰送刨子给我时，曾说过“鹬蚌相争”的话，不知怎么被看守知道了，我马上去找看守，如实地说明了那天的情况，那家伙没再说啥，事情就算过去了。

“疾风知劲草，危难见人心。”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中，我们这些老同志，同甘共苦，相互更为了解，关系更为密切。以杨易辰同志为例，他原是从江西来的，我是从老龙江省来的，1954年合省，1966年他是省委主管财贸的书记，我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有关财贸和农村工作的事，会上会下都有过工作上的接触，也知道他性格上心直口快，工作上有水平，有独到见解，但深的了解无多。可是，在“文革”中，在这“黑帮队”里，朝夕相处，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他正直，对“造反派”敢说敢顶。记得有一次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个头头到“五七”干校来视察，当然是到山下干校校部，不会到我们“黑帮队”来的，但没有忘记给我们留下训词。干校领导向我们传

达之后，杨易辰指名道姓地讽刺说：“哦，要我们接受再教育，他就‘偏得’用不着接受再教育了？”造反派组织各类会议批斗他。斗一次，杨易辰记下一次。有一次他对我说：“老骆，连省城加柳河，我挨批斗超过三百次了，哈哈！”有一回，他还偷偷对我说：“我不相信江青这坏娘们能长！”1970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阴谋捣鬼，妄想当国家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的消息秘密传到“黑帮队”，杨易辰对我说：“那里（指林彪等一伙）黑暗多着了！”一天早晨奇冷，零下二三十度，大家还躺在被窝里，造反派头头就来训话。一眼看见杨易辰没茬找茬地骂：“杨易辰，你这个走资派，现在劳改还盖缎子被！”杨眨眨眼不硬不软地说：“这不是过去就做好的了吗，自己工资买的，为啥现在不能盖呢？”另一次是看守点我的名：“骆子程，你是国民帮凶、走狗，还能翻案？”我不服，反驳说：“不是帮凶走狗，我们那时搞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参加的是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青年学生团体。”那人申斥我说：“你还狡辩！”杨易辰这时搭话

说：“那时国共合作，就是那么回事么！”弄得看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林彪叛逃，形势不断变化，周总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设法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柳河“黑帮队”首先放出了杨易辰。杨易辰临走那天与我们握手告别。我悄声对他说：“老杨，你先出去，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呀！”老杨说：“我回哈尔滨，不会忘记你们。”

飞来了第一只燕子，春天难道还能远吗？杨易辰走后不久，我和其他同志陆续离开“黑帮队”，返回哈尔滨。记得我们住在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要我们集中学习，耐心等待，听候组织处理。我们高兴地参加了招待所的政治学习，1972年参加了对林彪的批判，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同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给我正式做出结论：历史清楚，无问题。分配我到省计划委员会负责农林水经济计划工作。

（作者系国务院农业机械化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常务理事，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洛松）



作者骆子程（右）与李剑白近照

美、蒋包庇冈村宁次的丑剧

● 王俊彦



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时的冈村宁次(右)

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3月10日成立,直到1949年3月才告结束,历时3年之久,是中国历时最久的一次战犯审判。

上海审判,判处原侵华日军第五十五军参谋长辘木正隆死刑;判处原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长樱庭子郎、第四十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原日寇侵台司令官兼总督安藤利吉,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畏罪自杀;原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患脑溢血死亡。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严惩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被法庭宣判负责“遣俘有功”,“无罪释放”。

审判期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李宗仁等国民党政府最高级头目,暗中与日本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密谋勾结,公开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行,上演了宣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总司令无罪的丑剧,留下千古骂名,遗臭万年。

侵华有功,冈村宁次发迹

冈村宁次1884年生于日本东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侵华活动,曾任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员、中国课课长、日本驻华使馆武官。1925年至1927年,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以步兵第六联队长的身份参加侵略青岛和济南的战争,参预制造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1933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侵略冀东和长城以北我国领土的《塘沽协定》。1935年,又协同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其后,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二师团长、第

十军司令官、华北日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为甲级战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军事法庭从1946年开始审判日本战犯，到1948年已基本审判完毕，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处死刑，正法枪决，但冈村宁次这个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却不见踪影。

积极反共，冈村宁次讨好蒋介石

原来，冈村宁次明知自己罪孽深重，难逃惩罚，自付不仅被列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就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制裁。

但是，他又料定在国共冲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机会，就决心“卖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万侵华日军的优良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国对付共产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蒋介石，还向何应钦献反共之计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介石请求批准。蒋介石虽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却把冈村宁次视为自己人，确定将战犯范围限制在最小限度，甚至一个人即可，他明确地发布指示：“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长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笠)副局长负责主持，以归统一，而免分歧。”

蒋介石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迟迟不下达解除冈村宁次武装的命令，因而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侵华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日军官兵仍欺压百姓，奸淫妇女，胡作非为。经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多次交涉，才命令冈村宁次缴出武器装备。

蒋介石、何应钦为勾结冈村宁次反共，不顾国际国内要求审判冈村宁次的强烈呼声，宣布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委其以协助投降、维持治安和帮助遣返日俘日侨的重任，后来又让其改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暗中兼有国民党军事顾问的职责。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让他以外交官身

份随便活动。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蒋介石、何应钦指示南京和国民党各地报纸，不登这一消息。在制定确认战犯条件文件时，只注重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指挥的南京大屠杀，酒井隆在广东以及日寇在长沙、徐州会战中的暴行，因冈村宁次与这些暴行无直接联系，而为其开脱罪责。

国民党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于1946年9月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对记者提问答曰：“冈村宁次本是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正在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在研究中。”

投挑报李，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

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的倒行逆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11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冈村宁次健康有问题予以拒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识破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理。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诡称把冈村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

冈村宁次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宅邸，住所十分秘密。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汤恩伯派出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真是细心照顾，关怀备至。

1947年6月17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

这时候，各国对冈村宁次的下落传说纷纭。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便派他手下参谋小笠原向国防部二厅少将曹士激打探消息，曹士激第二天就带来了可靠消息：“对冈村的审理，争取于9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定后为宜。”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鉴于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国防部长何应钦重新上任后,便于7月1日向石美瑜发出训令称:“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

假审判真演戏,幕幕狼狈不堪

7月7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7月12日上午10时到法庭受审。这又使冈村宁次精神紧张起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体贴入微,命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悄悄来访,传达蒋介石、何应欠和国防部的安排,讲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之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训令已经下达,并不惜出卖核心机密,奴颜婢膝地说:“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示要从轻处理;你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

1948年7月12日,中国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4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10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侵略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冈村宁次因有蒋介石、何应钦背后撑腰,有恃无恐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想,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也是下层发生的零星的不法行为,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石美瑜向法官们事前传达了蒋介石、何应钦的指示,因而谁也不敢触动冈村宁次的个人犯罪问题。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冈村宁次退庭后,石美瑜与施泳(检查官)、刘季坪(翻译)展开激烈争论。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就应立即住进战犯监狱监禁。

刘季坪反对石美瑜的主张,认为冈村现在的住所既为国防部指定,除非有国防部指示,否则不能擅自移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官员出面和石美瑜协商,石庭长才同意申请保释。

7月18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再次访问冈村宁次,殷勤地为他起草了一份保释申请书,由参谋松冈抄写清楚后提交法庭批准。

7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派京沪医院的朱院长,在日本医生中山高志陪同下,为冈村宁次做疾病诊断。正直的朱院长根据冈村宁次的病状,拒绝为他担保。这可急坏了冈村宁次,他又费尽心机才找到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钱龙生为他担保,8月2日终于取得法庭的保释同意。

8月2日,上海军事法庭送来起诉书,指控冈村宁次在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任内,应对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百十六师团、第一百六十四师团、第八十九旅团等所属兵团官兵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

8月9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告诉冈村宁次说,石庭长的申请已得到国防部批准:“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

8月10日,石美瑜在吴文华陪同下访问冈村宁次,表明来意说:“今天我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带病入监,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监时间定于14日退庭之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

8月14日,上海军事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初审,纯粹是走过场,只短短半个小时便草草收场。

冈村宁次松一口气离开法庭,刚到走廊就被100多名中外记者团团包围,争相提问。冈村宁次害怕暴露蒋介石对他的庇护内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急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国民党宪兵急忙开道,推开阻拦的记者,将冈村宁次送进休息室。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举起相机拍照不止。冈村宁次急忙离开法庭,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但仍有几名记者登上卡车,追赶提问,一直到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门口,由典狱长孙介君接了进去,方才解围。

蒋介石、何应钦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8月22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到特殊病室探问冈村宁次“病情”,并无耻吹捧,透露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奸

计说：“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志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1948年8月23日，拖延很久的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鹤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国民党政府唯恐出事，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但从各地赶来观看审判战犯冈村宁次的人们仍像潮水般涌来。

8月23日上午8时10分，冈村宁次在8名宪兵监押下，乘红色警车一辆，自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抵达临时法庭，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9时30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审判长宣布传冈村宁次和4名从犯进庭。观众一齐把眼光投向受审席，只见冈村宁次剃光头，戴着玳瑁边眼镜，身穿草绿色军便服，里套白翻领衬衫，低头走上被审台，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皇军气势早已荡然无存。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4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预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如纵容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于1945年1月进犯江西时，残杀中国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89人；还纵容菱田元四郎、梨冈寿男、船引正之等残杀平

民及掠夺财产，无恶不作。

接着进行法庭质询，旨在搞清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及战犯所犯罪行。冈村宁次有恃无恐，态度傲慢，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他胡说对日本侵华政策从未参预策划，也不赞同。声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既非裕仁天皇，也非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而“猜测”是以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强调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能负屠杀中国平民之责。

广大听众见冈村宁次把一切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激起强烈愤怒，纷纷要求追查冈村宁次的战争罪行。

庭长石美瑜频频击动法锤，于上午10时40分宣布对冈村宁次的质询完毕，接着对4名从犯进行审理。落合甚九郎等4人一方面为冈村宁次涂脂抹粉，一方面为自己开脱罪责，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石美瑜悍然宣布上午审判结束，下午3时继续开庭审理。

午餐极为丰盛，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和4名从犯吃得满嘴流油，极为满意。

庭长石美瑜和4名法官进午餐时，席间传叫石美瑜接长途电话。不一会儿，石美瑜回到饭桌旁，脸色阴沉地对4位法官说：“刚才接(国防部)秦(德纯)次长电话，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职守。”

法官们心中不满，都主张下午继续开庭审判，否则无法向社会舆论交代。石美瑜对此表示赞成。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处以应得惩罚。辩护律师江一平、钱龙生、杨鹏3人公开为冈村宁次辩护，令听众瞠目结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此始终念念不忘：“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然而在此情况下，辩护人敢于大胆为我辩护，令人感激。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我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

法庭辩论极其激烈，直至下午6时30分，石美瑜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重大案件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就要审判，原定3时的宣判无人提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愚弄人民、搪塞国际舆论的大骗局。

8月23日晚7晚20分，冈村宁次回到监狱。典狱长孙介君像迎接凯旋的大将军一般热情招待。次日，他又特意前来冈村宁次的监房慰问，神秘地透露机密说：“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两种

意见，外交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是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

孙介君前脚刚走，军法局徐局长又以来监视察为名，传达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慰问之词，问候冈村宁次病情。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何应钦的阴谋心领神会，马上向上海军事法庭递来一件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

石美瑜情知冈村宁次这个申请状大有来头，他不敢决定，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接连几天，上海和中国各地报纸对冈村宁次公审情况大加报道，不少文章对国民党政府包庇战犯的作法进行激烈抨击，讽刺说拖延三年之久才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宁次的案子一搁几个月，无人问津。外电传说冈村宁次将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者据此向上海军事法庭多次提出质问，石美瑜只得命法庭发言人发表谈话搪塞说：“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

尽管如此，外面传说很快将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第一次公审的纪录影片将分送世界各国。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命运仍忧心忡忡，忙向可以“通天”的典狱长孙介君打探消息。

1948年10月11日，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住室透露重要消息说：“最近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少激少将，对先生病情均颇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此时，以在健康许可范围内于狱中静候宣判为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为有利。”

11月13日，冈村宁次以心脏病及腹泻等症并发为由，申请监外就医获得批准，对他的审判推迟30天举行。冈村宁次住院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激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以判处无期徒刑为宜；石美瑜主张判处7年徒刑。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

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令其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这样写：“由于汤恩伯（1924年至1926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

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承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时候，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一败涂地，蒋介石玩弄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逮捕审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作为国共和谈的条件之一，国民党政府被迫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但蒋介石仍在背后紧紧操纵。

1949年1月22日，汤恩伯又派他的心腹参谋龙佐良到上海会见冈村宁次说，出于对中共的策略，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仍按预定计划进行。蒋介石虽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警备司令，尽可放心。

预定1月26日上午10时，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蒋介石仍在暗中操纵审判，他担心冈村宁次不能登上新法庭所在地的四层楼受审，便通过何应钦、汤恩伯，派国防部官员吴文华、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接连探询病情，询问是否需要用担架抬上四楼。冈村宁次对中国当局“不念旧怨，对我关怀备至，情实难忘”，一再致谢。

1949年1月26日清晨，石美瑜把手下法官都叫到庭长办公室，阴沉着脸说：“今天要辛苦各位，请大家发表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大部分法官都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正义感，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中国人民愤恨的头号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为百姓报仇雪恨，应该将冈村宁次处以极刑。

原来石美瑜已受蒋介石的威逼，有苦难言，情知审

理此案决不是什么好差事，就玩弄“金蝉脱壳”之计，送上请调报告。谁知请调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把他提升为国防部检察处处长，又将军衔由少将提升为中将，还接到蒋介石一封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盖章，算是交差了事。

石美瑜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份文件，让叶在增等4位法官看，原来是代总统李宗仁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两个命令，内容相同：“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

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众位法官接过一看，是抄写得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决书原本，主文只有6个字：“冈村宁次无罪。”

4位法官谁也不愿开口说话。石美瑜便告诉大家，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法官们面面相觑，暗骂徐永昌卑鄙无耻。

石美瑜将脸一沉，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

谁都知道这是干违背公法和民意的丑事，无人提笔签名。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

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

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

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开脱冈村宁次罪责的不光彩的判决书上签了名。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规模大大缩小，仅请20多名新闻记者旁听。

庭长石美瑜装模作样地做例行公事性提问，冈村宁次早准备好一套对付审判的办法，不替自己做任何辩解，概由律师代为申辩。最后问他有何陈述时，冈村宁次颇有城府地说：“本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

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表示感谢。”

当天下午4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 男 66岁 日本东京人 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 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

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宣

读完判决书。

战犯竟无罪，中外舆论大哗

石美瑜勉强宣判结束，法庭秩序更加混乱，新闻记者怀着强烈愤怒提出种种责问，石美瑜自觉理亏，无法回答，就运用庭长权力当即宣布退庭，扭头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向法庭提出抗议，但却不能扭转大局。

冈村宁次比谁都更清楚，他作为百万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是屠杀与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头号战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过日本占领青岛的战争；1928年参加侵略济南的战争；1933年、1935年强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侵略华北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作为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曾对华北等地推行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罪恶滔天。蒋介石、何应钦再包庇他，也会判7年以上徒刑。现在听到宣判无罪，深感意外，就想向庭长石美瑜表示感谢，但却被拒绝会见。正不知如何是好，法庭副官郭新夫忙走过来向他附耳低语：“啊，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机从后门走脱为妙。”

一句话提醒了冈村宁次，他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在混乱中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1949年1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要求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全国舆论也一致表示谴责，上海各处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国民党当局颇为紧张，立即悄悄安排冈村宁次坐美国轮船回国之事。28日晚，就派上海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通知冈村宁次，次日凌晨6时半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战犯一起乘船归国。汤恩伯还派参谋龙佐良送来卡车一辆，便于冈村宁次在29日拂晓乘车赶到上海战犯监狱，与259名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约翰·W·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国。

获得国民党政府释放冈村宁次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在国共和谈中，也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迫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汤恩伯依仗其上海警备司令的职权，以蒋介石为后台，扣压李宗仁的命令不发。李宗仁无奈，后来又命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驻日盟军总部交涉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被麦克阿瑟总部拒绝。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更使冈村宁次吃惊的是，美日当局打破战后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在医院悬挂太阳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麦克阿瑟还派盟军总部军官肯尼中校到医院慰问冈村宁次。不久，又同意蒋介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至此，美国和蒋介石包庇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罪恶阴谋暴露无遗，受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责任编辑 孙 申)

欢迎订阅中国财经报

《中国财经报》是财政部主办的全国性经济类报纸。它立足财政，面向社会，反映经济，服务四化。

《中国财经报》是各级领导掌握中央财经政策的助手，是财政财会人员相互学习和经验的园地，是厂长经理制定经营决策的顾问，是广大读者了解经济形势的窗口。

服务对象包括：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金融、审计等部门的干部、职工、工交商贸、厂矿企业、财经院校、研究单位以及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有关领导干部、财务工作者、财经理论工作者和关心财经工作的社会人士。

《中国财经报》每周出版四期，每期对开四版一大张。由邮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85

邮局发行号：1—153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甲54号

邮政编码：100073

办公室 电话：3812663

总编室 电话：3812631

传真：3812638

经理广告部 电话：3812670

(发行) 3813137(广告)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

——访独步昆坛的侯少奎

●王 恂 郑 晋

如果你观赏过侯少奎扮演《夜奔》中的林冲,《打虎》中的武松,《刀会》中的关羽,《嫁妹》中的钟馗,或是《千里送京娘》中的赵匡胤……你就会感到他的表演风格和艺术特色,非常贴近本文题目借用的苏轼词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随着一曲《新水令》,林冲慷慨悲歌,急走荒郊,投奔梁山。侯少奎在《夜奔》中,以激越的唱腔和繁难的武功,把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叱咤风云的气概,和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内心世界,表演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

“(唱)大江东去,浪千叠……”(白)周仓,这不是水。(唱)这的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关羽面对水涌山叠,遥想麋兵赤壁,抒发着壮怀豪情。侯少奎在《刀会》中,以高亢的首律和威武的造型,把单刀赴会、威震东吴的关羽塑造得栩栩如生,浩气凌云。

这两出戏,可以说是侯少奎的代表作。它集中地、完美地体现了北昆和侯(永奎)派独特的艺术风格:声遏行云,气贯长虹,豪迈奔放,酣畅淋漓。

最近,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了新编历史剧《水淹七军》,并在电视中多次播出。对于剧本的改编,侯少奎坚持一定要根据老本子,不能改得面目全非,但又不拘泥于老本子,而要加进新的内容。正如梅兰芳大师所主张的:“移步不换形”。剧中除增加了关夫人、桂英等旦角行当以外,突出了关羽与庞德的矛盾冲突,忠与义的心灵撞击。关羽爱惜魏将庞德是个难得的将才,在庞德探营和两阵交锋中不忍杀害,水淹七军生俘庞德,关羽劝他归顺,庞德誓死不降,自戕于关羽刀下。剧情起伏跌

宕,扣人心弦。在这出戏中,侯少奎又以一个新的关羽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

他拿出一些剧照赠送笔者,指着一个个脸谱说:



侯少奎在《水淹七军》中饰关公

“我就愿意演勾脸戏，和我父亲一样。”其中，他与关公结下不解之缘。

1988年，中、日合拍宽银幕、上下集影片《关公》。编导人员物色扮演关羽的演员多人，都不合适。最后经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推荐，找到侯少奎的家门。他们一见眼前这个人，长脸型，一米八的个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天生一个活关公，当即一言为定。

在拍摄过程中，侯少奎曾到四川、甘肃、山西等地，纵马驰骋，挥刀对战，历尽辛劳。他说：“年轻的演员们对我真好。有时拍了一天戏，累得下不了马，他们就把我架下来，有人干脆趴在地上，让我踩着他的脊背下马。还有一次，拍屯土山这场戏，我骑马冲下山坡，突然摔下来，马的一只前蹄抬着不落，就是不往我身上踩，一点也没伤着我。真是神了！”

1993年6月，应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和中央大学的邀请，侯少奎与上海昆剧团著名演员梁谷音、计镇华、张静娴以及著名笛师顾兆琪，同赴台湾进行示范讲学。梁谷音演出《寻梦》（《牡丹亭》一折），侯少奎演出《夜奔》。他们精湛的表演艺术，引起极大轰动。由于是示范讲学，不售票，但仍有很多观众渴望欣赏传统戏曲的奇葩异彩。

蒋纬国先生也到场观看。演出后，侯少奎与蒋先生会面时说：“我父亲给老蒋先生演过戏，今天我又给小

蒋先生演出，真是巧合。”蒋先生说：“我过去没看过你演戏，这次看了《夜奔》，演得太好了！我很高兴。”并合影留念。

1991年和1993年，南昆北昆精英荟萃，先后两次赴香港演出。1500个座位的香港大会堂，座无虚席，还有不少观众买站票，尽管是200元港币一张。侯少奎演出了《千里送京娘》、《嫁妹》、《刀会》等剧目。他和梁谷音等合演的《戏叔·杀嫂》，可称南北（昆）同台，珠联璧合。香港报纸盛赞演出，称侯少奎《刀会》“独步中国”，演《嫁妹》堪称“活钟馗”。

1991年，侯少奎还和北方昆曲剧院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斯摩棱斯克等地演出。俄国的艺术家和观众，看了侯少奎演出《夜奔》，一个人载歌载舞，戏满全台，称赞是“真正的艺术”。

昆曲，这朵古老的戏曲艺术之花，几经枯荣，而今焕发青春，香溢海外。抚今追昔，侯少奎无限感慨。他的父亲侯永奎是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和韩世昌、白云生、马祥麟、侯玉山等名家，曾经给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在少奎居室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周总理和侯永奎两人并肩而立的合影，仿佛他们并没有离开人世，还在关注着昆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然而，在旧社会，这些昆曲艺人处境艰辛，生活困苦，贫病交加，有的甚至亡命异乡。侯永奎不愿意儿辈再学戏，想让他们上大学深造。少奎青年时代，就对绘画和书法饶有兴趣，1956年中学毕业，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就在这时，北方昆曲代表团（北方昆曲剧院筹建单位）团长金紫光、副团长边军，来到侯家看望，动员少奎学昆曲，并让他当场试唱。少奎唱了一段《夜奔》，开口就是小工调，高亢嘹亮，这一试就试成了。少奎说：“我们兄弟五个，父亲就把这副好嗓子给了我。”

从此，他在北方昆曲剧院全身心地投入昆曲表演艺术，技艺精进，自成风格，武生行当中能有他那样好嗓子者，尚未发现。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荣获第二届戏曲梅花奖。

他受益于恩师侯炳武、傅德威、赵松樵、王瑞芝等先生，更得父亲真传。每当侯永奎登台演出，少奎就在后台认真地看父亲怎么勾脸、扮戏；他在台



侯少奎演出《水淹七军》后与本文作者王恂（左）、郑晋（右）合影

上演配角时,又专注地学习父亲的唱、念、做、打,使他越看越入神,感到昆曲艺术和父亲的表演太美妙了。少奎回忆起父亲生前给他说话,真是刻骨铭心。谈到《夜奔》的表演,父亲特别提醒少奎,不要演过了,不要演毛了,因为林冲是八十万禁军的教头,要有和这个身份相应的气派。谈到《刀会》的表演,当少奎弓步摇身,作观望江水状时,父亲不断用扇子敲打他的左腿,少奎不明其意,当他躲避扇子抬起左腿时,忽然发现单腿独立遥望大江,造型更加威仪、壮美。父亲点头示意,做对了。

昆曲不乏艺术精品。而每部精品,都是经过几代艺人呕心沥血,千锤百炼,对一出戏、一个人物,乃至一句唱腔、一个动作进行反复推敲,凝炼而成,因而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笔者幼年时候,常随父母看昆曲。早在三十年代,父亲王西微在大学教书,同时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我们家住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父亲为了甩掉特务的跟踪,有时不直接回家,而是拐进哈尔飞戏院(今西单剧场,刚刚拆除)看戏,从此结识了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等北昆名家。父亲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又是著名曲家吴梅的弟子,自然与昆曲有着不解之缘,并以昆曲作为地下工作的掩护。他不仅常看昆曲,还请北昆名伶到家中举办曲会,急管繁弦,幽韵妙

曲,时常在我们家的庭院里回响。当时,这些艺人生活困窘,演出不景气。笔者的父亲还请他们在我家拍摄了很多戏装像(珍藏至今),帮助他们扩大宣传,振兴昆曲。侯永奎、马祥麟等人常到我们家,就像自家人,愿意唱就唱,愿意聊就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就是玉米面菜团子也吃得很香。知音相聚,一切困苦忧愁都烟消云散了。

而今,侯永奎、马祥麟和笔者的父母都已先后离世。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情厚谊,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少奎见了我们的面;常说:“我大娘(指笔者母亲潘郁彬)最喜欢我。”因为我们母亲每次看到少奎演戏,总觉得酷似乃父,犹如少奎再生。

少奎的女儿侯爽,是北方昆曲剧院的青年演员。“小荷才露尖尖角”,昆曲闺门旦的重头戏,她已经演得身手不凡,光彩照人。最近,父女合演《千里送京娘》,并准备赴日本演出。笔者的女儿王纪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一名票友,多次粉墨登台,演过《断桥》、《琴挑》、《游园·惊梦》、《折柳·阳关》、《梳妆·掷戟》等剧目,得到行家赞许。

人世沧桑。梨园佳话。是祖国传统艺术之精华——昆曲,联结了侯、王两家的三代戏缘。

(责任编辑:丁 末)

回收本刊 1993 年第 10 期

1994 年第 1 期,1995 年 1、2 期

后 事

承蒙读者厚爱,在本刊订户逐年递增的同时,每年合订本的销量也在增加。1991—1992 年合订本、1993 年合订本均早已告罄;1994 年合订本也所存无多。岁末临近,1995 年合订本正准备装订,为满足读者需求,欲增加合订本数量,但因今年一、二期存书不足,增加装订计划又恐落空。故敬告读者,凡存有今年一、二期本刊、又同意转让者,只要杂志保存完好,可直寄本社。本社将按原价付款,或遵嘱换寄其他期号。

另,本刊和一些读者尚急需 1994 年第 1 期、1993 年第 10 期,有

愿割爱转让者,亦可按上述办法办理。谢谢合作!

(有成批存书者,请先来信联系) 炎黄春秋杂志社

本刊同仁提醒您

1996 年即将来临,切勿忘记到当地邮电局(所)订阅 1996 年度《炎黄春秋》杂志。

如当地邮局(所)订阅不便,可直接向本刊编辑部办理邮购。

作者来信照登

本刊第 8 期发表《为华人增光的曼哈顿建筑师李名仪》后,作者艺舟、陈滨来信,对该文作以下补充:

1995 年 7 月,国会山联邦法院大楼又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1995 联邦设计成就奖”。这项艺术大奖,是艺术基

金会给予为政府部门所作多类设计的最高奖励,又是美国《总统设计奖》的提名,每四年颁发一次,为数不多,今次是 77 个。颁奖词说:“德古特·马歌洋联邦局司法大楼卓越非凡的布局与设计,将永留人心,愈久弥珍。”

吴桥杂技之乡的 奇人奇遇

●郭 锋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玩艺儿，人人有一手。”这是中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县的真实写照。笔者在多次采访报道中，结识了不少吴桥杂技艺人，现将其中几位分别勾画于下。在他们身上不仅可以领略中华杂技的风采，而且可以看到时代变化留给他们的烙印。

“吴拐子”的绝招

我手头有一张照片，题目叫《杂技》。画面上是治理海河的工地，许多民工或坐或立，正在欢快地观赏一个小伙子作杂技表演。只见这个小伙子平伸双臂，以其侧背对着镜头，他头顶一辆推土用的独轮车，一只车把竖



“吴拐子”在海河工地上

立在他的额头，车子则稳稳当地直立着。我曾拿这张照片询问过许多吴桥人，尽管看不见他正面的面孔，人们还是一眼就认出：“没错！这是洼吴村的‘吴拐子’！”

吴金山的一条腿有残疾。他虽非杂技世家出身，但从小酷爱杂技艺术。他练功十分刻苦，见到别人会什么新招儿，不管吃多少苦，摔多少跤，也要学到手。吴桥县原本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收获无几，他就经常偷偷地带上简单的道具，外出演杂技谋生。待他赚得一把钱归来，就在街上买了烧饼夹牛肉，蹲在太阳地里大吃大喝，还边吃边唾着嘴说：“嘿！瞧瞧咱，净吃这个！”这在当时被死困在黄土地上“土里刨食”的庄稼汉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于是村里人心浮动，又有一批青年人悄悄离开了村。因此，吴金山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当时“文革”期间进行路线教育的重点对象。经过多次办班学习，他终于有了明显的转变：“安心”于农业生产了，后来还自报奋勇参加了根治海河的艰苦劳动。不久，海河工程指挥部发现了他这个人才，就组织几个吴桥人跟他搭伙成立一个杂技小分队，边劳动边巡回演出，以慰劳各地区来的民工，活跃工地生活。那张照片就是这时候拍摄的。

吴金山演杂技，我没有见过，但他演杂技的事儿，我听到过不少。一次，一个女孩刚演完“椅子顶”，他从一摞椅子上跌下来，全场观众为之一惊，却见他一条腿着地（当然是那条好腿），滴溜溜地打转转，博得台下一片喝彩。

干了一段活之后，海河工地指挥部批准他回家安排生活，他回来后在家里呆上几天就走了。村干部以为他是返回工地干活去了，指挥部则认为他回家还未回来，结果是“两头不见太阳”。又过了好多时日，他突然回村迁户口，原来这期间他又出去演杂技了，一直到了东北。东北某林场十分欣赏他的技艺，决定把他留用，并且给他办妥准迁证，答应对其家属也作安排……

1984年我重访吴桥时，又专程去了一趟洼吴村，可惜又不凑巧，前几天吴金山刚刚回过一趟家，现在已经

走了。据他哥哥讲，金山这次回家，穿着大氅，提着皮象吴金山这样的经历，在吴桥人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少吴桥人在“文革”期间当过“黑杂技户”，被村干部办过班，罚过款，但一直制止不住人们的外出。有的杂技艺人偷偷到外地演出，还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宣传，说是各地革命群众纷纷要求吴桥派人去演出。他们还堂而皇之拿出盖有“吴桥县革命委员会”大红公章的介绍信，请各地给予接待。当然，这信也是伪造的。

籍，十分神气。听说他在东北某县文化馆工作，还经常带领全家外出演杂技。

现在好了，这一切偷偷摸摸的不合法的狡猾伎俩全部用不着了。“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富民政策，已经把外出演杂技作为组织吴桥县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有效门路，除县里有一个国营马戏杂技团之外，民间的杂技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到1985年已经发展到33个，足迹遍及大陆各省，并且走向世界。

田仕合的奇遇

在这些吴桥人中，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小田庄的田仕合了。

1985年我第三次见到田仕合时，他身体还很硬朗，但头发全白，耳朵也背了，两手一拿东西就发颤。他的头顶，有一溜不长头发。他说这是他年轻时练“撇青子”留下的痕迹。“撇青子”是早年吴桥杂技中一个传统节目，新中国成立后，因其有危险性，政府已明令禁演。那是演员把一根扎枪高高抛起，让枪尖直冲着自己的嘴、眼睛或脑门扎过来，看看就要扎上了，突然伸手把枪头



本文作者郭峰采访田仕合老艺人
王新摄影

抓住——人们看的就是这个惊险劲儿！他还告诉我，他脖子后头有条筋老是疼，那是他和已故大儿生前合演“瓶子顶”戳的。我曾在他保存的一张日本明信片上看到过这个剧照：田仕合直立着，头顶一个啤酒瓶，他的大儿则全身倒立，头却顶在瓶口上，手脚朝两侧伸展，象个倒写的“出”字。田仕合感叹地说：“吃杂技这碗饭不容易呀，没个伤没个病的，很少。”

田仕合二十几岁就去了日本，在日本前前后后演出了28年，在当时是有些名气的。有一次他坐火车，见几个日本人围着看一张报纸，那报上就刊有田仕合演杂技的广告。那些人议论纷纷，都说这个中国人演得好。田仕合凑过去就问：“你们说他演得好，可你们看过他的演出吗？”那些人有的说看过，有的说没看过。他当即说：“你们看看那报上的照片，再看看我！”这时大家才发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田仕合，纷纷过来与他攀谈。还有一次他在路上突然昏倒，两个日本青年送他到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他问那两位青年姓名，那二人异口同声说：“达西海桑（田仕合君），你不认识我们，可我们认识你。你的杂技演得太好了！”

由于他技艺精湛，又长得英俊潇洒，曾有一位日本九州大分县的女学生，连看三场就迷上了他，非要嫁给他不可。他忙说：“这可使不得，我在中国有老婆！”但那小他10岁、叫“女姚嘎富吉勾”（这是田老说的名字，但他不会写，经我请教一位日本友人，他说可写成“末冈藤子”）的日本姑娘却说：“你在中国有，可她不在日本呀！”这个少女终于从家中跑出来跟了他。她能歌善舞，还会弹琴，又跟他学会演杂技。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长大了也参加演出。我在田仕合家看过一张旧剧照，就是他们三人合演的“拱桥”：女儿平卧在台上，他和妻子用自己的头，一个顶女儿的头，一个顶其脚，硬是把她直挺挺地顶起来，平悬在空中，三人构成一座桥形。这个剧照也是印在日本邮政局发行的孔雀商标的明信片上，可见那时的田仕合已经是一位相当出名的杂技明星了。

田仕合在日本的28年，既有事业上的成功，生活中的罗曼蒂克，也有几次大难不死的奇遇。日本关东大地震，他赶上了，当时他在名古屋。他说那才叫吓人啦，街上房屋倒塌，电线崩断，水泥地突然裂开大口子。田仕合同几个中国人满街乱跑，被一个中年日本人叫住：“中国人，不要乱跑，危险！快跟我来！”他把田仕合等领到他家，那是一处低矮而又坚固的建筑，他们在那里一直挨到地震过去。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令田仕合所在的那个杂技团去前线慰劳日本侵略军。船行至白

湾海峡,被潜艇击沉。杂技团一行28人,包括他的妻子、女儿和几个徒弟在内的27人,全部葬身鱼腹,只有他一个人抱着块木板,在海上漂泊三天三夜,最后被台湾渔民救起。于是,他孤身一人回到了祖国。

不久,他的家乡解放。他当上了村农会主任,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到沧州市和吴桥县杂技团当过教师,教出的徒弟多达百余人。

田仕合告诉我,到他这一辈,他家演杂技已是第三代了。再往下数:他的儿子、女儿都演过杂技。二儿还曾带着他的孙子、孙女演杂技,后来买了台拖拉机跑运输,孙子、孙女都上了学。而这时,田仕合的重孙、重孙女(已故大儿家的)又跟外村人出去演杂技,这已经是他家的第六代了。田仕合于1986年病故,终年93岁。

“飞人明星”孙占凤

孙占凤是被收入《中国艺术家辞典》里的杂技艺术家之一。她是吴桥县孙龙庄人。孙龙庄早年出了个因演杂技而发家,后来在村里盖起一座水泥洋楼的孙福有,他组建的“中华国术大马戏团”饮誉海内外。孙占凤6岁时,以4亩地的身价写了一生的契约,跟着他外出学徒从艺。她随着这个马戏团到了南洋一带,去过香港、澳门、马来亚、菲律宾、暹罗(即今泰国)、缅甸等地,在海外演出长达七八年。在这期间,孙占凤边练功边演出,小小年纪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不断演出磨练中,掌握了空中飞人、马术、钢丝、跳板等几十种高难节目,成了这个团的台柱子、孙福有的“摇钱树”。

在暹罗演出时,女王和他的丈夫亲临剧场观看。女王特别喜爱这个娇小伶俐的女演员,在孙占凤与同伴



孙占凤在天津家中与老伴韩象瑞颐养天年
(王新摄影)

表演完“双吊子”之后,特意召见了她们,并叫人端来一盘金银财宝任其挑选。孙占凤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她什么也没敢拿。后来又端来一盒糖果,她才拿了一盒巧克力,说声“谢谢”转身跑开了。

在那些年的演出中,孙占凤也吃了不少一般人吃不了的苦。由于过度劳累,她曾3次失手摔休克了。一次是演皮条,皮条断了,16岁的她摔昏过去3个小时。最后一次演单趟飞人,她差一点儿没有抓住对方的手,人飞出去了,把两侧的小网冲断了,没有掉在下边的大网上,而是一直冲到台上。她当时就昏了过去,长达5个小时,才朦朦胧胧地听说“不行了”,慢慢缓醒过来,睁开眼,瞧人都是两个人影,看灯也是两盏灯,只想吐,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就这样,歇了一夜,第二天还得登台演出。所以孙占凤常说:“在旧社会卖艺,实际上是卖命!”

这个马戏团回国后,改名为“中国华侨大马戏团”,又在上海、南京、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孙占凤曾获“飞人明星”的美名。1944年,孙福有死于重庆,他的徒弟们从此挣脱了终生的枷锁,都表示宁可要饭也不再演杂技了。孙占凤回到阔别18年的吴桥,到老家来务农。

新中国成立后,杂技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杂技艺人再也不是“下九流”,而成了受人尊重的文艺工作者。1957年,孙占凤和她的丈夫、曾任孙福有马戏团外交经理的韩象瑞,被同行邀请来到天津,筹建了天津市第一个人民马戏团,初为民营公助,1959年转为国营。韩象瑞任团长(后并入天津市杂技团),孙占凤是这个团的主要演员兼教师,除自己练功、演出外,还要负责向青少年演员传授技艺、指导排练。大棚中的高空惊险节目,孙占凤是唯一的传人了,她鼓足勇气冒险尝试,终于在16米高空往返飞跃成功,不仅恢复了演出,还教会了十几个青年演员。以后每次广州交易会,他们都被邀请参加演出,最多的一场卖票3800多张,每场都有300多外宾观看。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戏团被砍掉了,韩象瑞被打成“走资派”,孙占凤也被戴上“文艺黑线的黑尖子”的帽子,挨了批斗。“文革”后,孙占凤夫妇落实政策,都回到了天津。韩象瑞因年事已高,办了退休手续。孙占凤以其精湛的技艺又当了几年杂技团的教师。现在她已经71岁,老韩已87岁,两位老人在家颐养天年。

张华搭起世界桥

张华,这个中国杂技团的著名幌板、车技、口技、丑角演员,也是来自杂技之乡吴桥。新中国成立之后,他



孙占凤的大女儿韩爱珠正在教占凤的6岁的
孙儿韩强(上)练功,他与下边的女孩曾在
天津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合演“顶碗”(王新摄影)

参加了剧作家田汉领导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下属的杂技曲艺流动演出小组。不久,苏联政府邀请我国派文艺团体去访问。中央决定派个杂技团去,于是就在这个演出小组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一批知名的杂技艺人,如擅长钻圈的关玉和、精于车技的金业勤兄妹、魔术大师杨小亭、外号“飞飞飞”的单杠演员曹鹏飞和顶坛子的恪树旺等,组建成中华杂技团。出国前,他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演出,总理看后高兴地说:“你们是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和平使者!”这次出国演出,受到了苏联、波兰等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轰动了欧洲。回国后,这个团就保留下来,以后发展成中国杂技团,人员也由70来人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人。

在这期间,张华曾先后随团7次出国演出,到过24个国家。他的技艺也在不断提高和创新。在幌板上,他能扛着一人上两条板凳。他和金业勤兄妹等演出的车技,也创造了不少高难动作。这两个节目参加1953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分别荣获银质和金质奖章。

张华本来就是热心肠、重情义的人,他在北京一

直关心着老家吴桥杂技事业的发展,与家乡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退休以后,1991年10月,吴桥县人民政府和县马戏杂技团,正式聘任他作杂技团的高级顾问兼驻京办事处的全权代表。经过几年的联系、交往与做工作,张华终于在1992年为家乡吴桥办成了一件大好事:协助他们组织了一个杂技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出国演出的愿望。这是由在台湾的一位吴桥亲戚张连起先生热心组织,由他在美国的儿子张金长夫妇率领,张华则担任了副领队兼艺术指导。

杂技团总共由15人组成,于1992年12月3日出国,到美国后又分成两个团:一个团在佛罗里达州迪斯尼乐园的“海洋世界”定点演出;另一个团走了美国的20个州,还两次去了加拿大。杂技团在外演出9个月。这次演出结束后,部分演员于1993年9月初回国,张金长又带领吴桥的9名演员加上几个台湾演员,去了一趟欧洲,在意、荷、英、法四国演出3个多月。最后,张金长亲自把演员送回吴桥老家,并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招待了吴桥县和杂技团的领导干部,以及所有出国的演员及其家长,对这次的合作表示非常满意,对到会所有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

在此期间,张连起先生带了台湾的两个节目和一些观摩人员,参加了1993年10月31日开幕的第四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这是40多年来海峡两岸杂技界的第一次正式交流。在这方面,张华也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张华兴奋地告诉笔者,通过这次与台湾杂技同行一年多的合作,深深感到天下的炎黄子孙是一家。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孙 中)



张华(坐者)率队赴美国、加拿大演出,摄于途中

视惩贪 为治国之要的 康熙帝

● 曾 铮 曾宪爻



康熙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晚年总结自己几十年治国之道时，体会最深的是：“治国之要，莫过于惩贪，政治之道，首在惩戒贪蠹”。为什么康熙将整饬、惩治贪官，提到治国安邦的首要位置？他在几十年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是如何整饬吏治、惩治贪官污吏的？又有何经验、教训？

康熙亲政后，一些正直之士，竞相上书，对顺治后期，吏治败坏、贪风复起、中央大员和封疆大吏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民间疾苦起于知府、知县，而府、县不廉常由督抚贪酷引起，督抚贪酷的根源又在中央部院大臣。针对上述情况，年轻的君主康熙在整饬吏治中，提出了“端本澄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主张。把惩贪的重点放在中央大员、地方封疆大吏，即高级官员身上，要求大官做小官的表率，京官为外官之楷模。

康熙专门安排时间召见中央各部院衙门堂官（包括尚书和侍郎），又命外省总督、巡抚轮流进京觐见。

接见上述各大员时，他谆谆教诲，要大臣们体贴圣心，廉洁自爱，报效朝廷，交往行事均要检点，不能徇私舞弊，今后一旦发现，决不宽恕。

康熙惩贪，首先从工部开刀。

他早已发现，黄河上游年年溃口，朝廷每年拨出大批钱银治河，却总是治理不好，责在工部。他还发现：“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于是亲自坐镇，组织人员对工部治河开支进行彻底清查。查出工部从尚书、侍郎到各司郎中、员外郎，无人不贪，每年朝廷拨给堵黄河决口的银两，大都流入他们腰包。康熙下令所有贪官，或处死，或流放，或革职。

惩贪第二刀，指向山西巡抚穆尔赛。

穆尔赛系满员，生性贪婪，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百姓怨声载道。他怕罪行败露，便交结朝中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勒德洪，经常派人馈送金银，寻求保护。此事经人密奏，康熙派亲信大臣去太原调查，尽得实情。一天，在廷对中，康熙故意问

勒德洪：“山西抚臣穆尔赛官声如何？”勒德洪奏道：“臣闻穆尔赛为人谨慎，官声甚好！”康熙冷笑一声，当场出示穆尔赛贪赃枉法的罪证，吓得勒德洪面如土色，哑口无言。穆尔赛被锁拿来京，绑赴刑场处死，勒德洪受到降二级处分。

之后，康熙又接连处理了几起要案：刑部尚书齐世武，凭借手中掌握的生死大权，在审案中收受犯人家属贿赂三千两；兵部尚书耿额借拨付兵饷之机，贪污银一千两。根据清朝法律，贪污白银千两者，处以死刑。两位部堂大人均被送上断头台。

随后，被惩处的还有四川巡抚能泰和四川布政使卞永式。布政使乃掌管一省民政与财政的官员，势大权大，这个卞永式在决定征收赋税钱粮标准时，每两私自加派银一钱二分，共超征四万两白银，拿出一半给巡抚。此案被揭发。卞永式已病故，逃过了刑戮，能泰被送上绞刑架。

为了把那些手法很隐蔽的贪官挖出来，康熙想起了“风闻言事”。所

谓“风闻言事”，是指朝廷负责纠劾官吏的科、道官员，可以根据“风闻”，即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和传言，向皇帝举报官吏不法行为，请皇帝裁决。这一制度在明末，曾一度成为党派纷争的工具，将朝廷弄得乌烟瘴气，终致亡国。清初，吸取明亡教训，禁止此制。为了将贪官斗争深入一步，康熙经过仔细分析，认为“风闻言事”之制，固然可使一些人借机诬陷他人，但最大的好处可以得到大量举报线索，使统治者耳聪目明，有利于将那些隐藏得很深的贪官挖出来。

据此，康熙发布上谕，宣布重开“风闻言事”之例。上谕指出：“自来原有风闻之例，世祖皇帝及辅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例，贪官似有畏惧，若有挟仇参劾者……自有反坐之例”。

此令一出，立即奏效。山西道御史陈紫芝闻风而起，上疏参劾湖广巡抚张汧贪污受贿，且和内阁大学士明珠来往密切。康熙派人查实，张汧乃明珠死党，以重金贿赂湖广巡抚一职，上任后大肆贪污，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无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也按数收钱，共计获赃银九万多两。张汧被判斩立决，保举他升任巡抚的户部侍郎王遵训，也丢了乌纱。

张汧一案刚刚了结，御史郭琇参劾内阁大学士明珠的奏章又送到康熙面前。奏章列举明珠揽权蔽主、结党营私、市恩纳贿、卖官鬻爵、钳制科道等八条罪状。并说：京师盛传“天要平、杀老明”之谣。“老明”即协助朝廷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明珠。其种种不法，难以列举。伏祈皇上圣裁。康熙立即派人调查，证明郭琇所劾属实，震惊之余，下令撤销明珠职务。其同伙大学士余国柱、李之芳、勒德洪，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均因有贪赃

行为而解任。

为鼓励言官继续“风闻言事”，康熙为郭琇亲笔题词：“风霜之任，以惩奸恶，搏击之威，以儆贪墨”。又超擢陈紫芝为四品大理寺少卿。言路既开，参劾贪官的奏章逐渐增多，隐藏在康熙身边的贪官一个接一个地被揭露出来。

康熙二十八年，因参劾明珠有功，被升为内阁学士、左都御史的郭琇，又将皇上的宠臣高士奇参倒。高士奇，浙江钱塘人，原是个不第秀才，因不甘蛰居乡里，设馆授徒，徒步来京，手书绢扇，到处馈赠，借以接近权门。一个偶然机会，为权臣明珠赏识，平步登天，由詹事府录事、内阁中书，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为康熙侍从。他善窥帝意，擅长逢迎，深得皇上宠信。得势后，大肆招权纳贿，将贪污受贿所得金银，在京师和家乡广置田宅。郭琇列举大量事实，参劾他结党营私、奸贪坏法、擅权纳贿，累以万计，由一个觅馆糊口的穷儒成为拥有数百万家产的富翁。其财源，“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康熙派人调查核实后，高士奇被解任回籍。

在整饬吏治中，康熙还把惩贪与倡廉相结合。一方面以清官廉吏的事迹，澄清吏治，净化官场，摒除贪风；另一方面，使廉吏成为朝廷惩贪的重要力量。

第一位被康熙赏识、拔擢的廉吏是于成龙。于成龙，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顺治十年任广西罗城知县时，经过几年治理，使贫穷、落后的罗城富裕起来。之后，因政绩卓著，不断升迁，由四川合州知州、黄州府同知、贵州知府、武昌知府升为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康熙十九年，再升为直隶巡抚。他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支持廉吏，参劾贪官，虽为封疆大吏，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福建任上，“外番贡舶或有所献，公悉

屏斥，或呈祥香，一嗅即还之”。所居卧室，“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筒储朝服，二釜备炊爨，文案书册数十束，此外却无一物”。康熙得知于成龙事迹，特将他召进京师，亲自在懋勤殿接见，嘉其廉能，褒奖他为“清官第一”，赏赐白金、良马，并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虽年老体弱，因感皇帝知遇之恩，在江南任上，日益勤奋，处理政务常通宵达旦。公事之余，常微服私访，了解民间疾苦，考察官吏贤愚。一些鱼肉百姓的地方官，每遇白髯伟貌者，便胆战心惊，疑是于成龙私访。士大夫家闻于成龙尚俭，自动减舆从，婚嫁不用鼓乐，豪猾之徒率家逃避他乡。数月之间，江南政化大行。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于成龙病逝。将军、都统及属吏入视，其遗物“惟笥中绌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

类似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廉吏，康熙一朝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有治河名臣靳辅，曾任两江总督、河道总督的吏部尚书张鹏翮，还有广西巡抚彭鹏，由吴江知县擢升为都御史、湖广总督的郭琇，福建巡抚陈宾，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两江总督傅拉塔，闽浙总督王鹭，以及另一名被称之为“小于成龙”的河道总督于成龙。这些清官廉吏，志行修洁，却礼拒贿，秉公执法，不阿权贵，勇于搏击豪强，严惩贪渎，敢于为民请命，兴利除害，为巩固和发展康熙王朝，尽忠效力。

康熙惩贪倡廉，以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最为突出。满人出身的官吏噶礼，在山西巡抚任上，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加派私征，包庇奸吏贪官，屡遭御史弹劾。因康熙偏信，不仅未受惩处，反而升为两江总督。噶礼倚仗皇上宠信，在江南任上，肆无忌惮，公然向布政司勒索，又私通海盗，坐地分脏。为使自己的罪行不致败露，他罗

织罪名，将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倪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督粮道贾朴、知府陈鹏年等江南一批较为正直的官员，或罢免，或调走。

康熙五十年，江南举行乡试，噶礼暗中支持考官，贿卖举人，从中得银50万两。发榜之后，因取士不公，激起江南士人愤怒。他们张贴标语，街头演讲，抬财神入文庙，以示讽刺和抗议。

时任江苏巡抚、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侦知细情，毅然上疏奏报江南乡试舞弊事，并参劾噶礼徇情贿卖举人，得银50万两。康熙览奏大怒，立即派钦差大臣张鹏翮、漕督赫寿驰赴江南审理此案。经过审讯，科场舞弊情节及人员虽已供认，只因噶礼否认受贿，钦差大臣畏惧权势，偏袒、掣肘，致使案情不能大白。张伯行不顾个人安危，再次上疏弹劾噶礼“抗旨者欺君，营私坏法”，揭露钦差大臣张鹏翮因其子在噶礼属下任职，恐受挟制、陷害，不敢秉公办案，并大声疾呼：“以通同作弊之人，同为奉旨察审之人，真情何由得出？”建议朝廷将噶礼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藉，承审之官，亦无瞻顾，庶几真情得出，国法得伸”。噶礼深恐内情败露，便捏造事实，混淆视听，上疏参劾张伯行袒护罪犯、纵盗殃民、诬陷大臣等八条罪状。

康熙收到噶礼、张伯行二人互相参奏疏，深知其中必有蹊跷，便另派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再赴江南重审此案。谁知此二人仍偏袒噶礼，所作结论仍和前钦差一样，并以妄奏罪名，将张伯行解任。此时，康熙对噶礼的罪行已有所了解，知道此案不仅反映清官与贪官的矛盾，且涉及满臣和汉臣关系，便下谕指明：“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峻削一半矣……”要九卿再议，料九卿也畏惧噶礼权势，

提出折衷方案，将二人同时解任。康熙对这种模棱两可、忠奸不分的态度十分恼怒，亲自宣布：张伯行留任，将噶礼解任。

太原知府赵凤诒征收赋税时，私加税项，强行征收，得银十七万四千两。他嫌家中银窖太小，命人挖大一些。谁知银窖还没挖好，被山西巡抚苏克济所参，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吩咐家人将自己埋在银窖里。贪官挖银窖，竟是为自己挖掘坟墓，意境深长。

被惩治的贪官中，还有甘肃巩昌知府何图，他以巡视、接见和各种节日的名义，勒索属吏，又侵吞赈款，加派赋税，在百姓身上刮油。三年过去，共得赃银十七万两。钱还没有运回浙江老家，被人告发，送上断头台，赃款全部没收。

康熙在位61年，他谨记古人对帝王的告诫：“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时时以奢侈无度的明朝诸帝为鉴，而以大禹、文王勤邦俭家为榜样。九年十一月发布《圣谕十六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尚节俭、以惜财用”的主张，反复告诫臣僚：奢侈纵欲，乃贪婪之源。他自己崇尚

节俭，作百官表率。他出巡时，不许为之修路，不准擅治行宫，不乘坐华贵的车、船，不准扈从人员借机苛敛百姓，不准隆重迎送，更不许馈赠礼品。他蠲免赋税，从国库中拿出大批钱粮，赈济救灾。受过蠲免、赈济、恩惠所及之地，官民申请要为康熙建亭、立碑，概行不准；巡视时的题字、题词，地方官有自建御碑亭者，他得知后痛加斥责，下令拆毁。“其身正、其令必行”。

但是，历代帝王毕竟是代表封建阶级的统治者，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康熙步入晚年，片面追求安定，对官吏比较宽容，虽有贪赃枉法者，处置时比前期宽大。五十六年时，户部官员受卖办军马草料人贿赂，得银六十四万两，受贿者120多人。康熙一怒之下，下令一律罢官。决定作出后，他彻夜不眠，晨起又收回前令，只将户部尚书希福纳一人革职，其余受贿者限期退赔，免予议处。后期宽大的结果，贪风又起，各地钱粮亏空情况十分严重。正反两面，均为史鉴。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康熙皇帝诗一首·

示江南浙江守土诸臣

宇宙方清宁，
吏治尚端廉。
农使乐耕凿，
民使适里闾。
大察总其要，
小吏毋苛纤。
纪纲不可弛，
随时酌宽严。
为上能自爱，
群属必畏钳。

讼惟善得情，
操守时警砭。
勿恃才妄作，
勿以媚自怙。
务令比户丰，
膏泽远近霑。
朱轡与彤駟，
万姓所具瞻。
臧否道有碑，
防口难可钳。

不见广厦材，
竿干从幽潜。
不见冲霄鹤，
饮啄本静恬。
告诫示勉勗，
保护兹庶黔。

许昆银剽窃他人文章被揭露

本刊编辑部

撰文、著书是艰苦的脑力劳动，其成果应受到保护。剽窃他人的作品为己有，不仅是道德的败坏，而且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本刊今年第4期发表的《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一文，即为许昆银（署名许正雄，又一笔名为许进）剽窃他人之作。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原作者陈漱渝及不少读者来信，谴责许正雄的卑劣行径，并要求严肃处理。本着对作者、读者负责的精神，我们对此做了认真的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公布，并摘要刊登罗介华同志的来信。既揭露剽窃者的可耻行径，亦表明本刊对此类问题的严正态度：只要被我们发现，立即公开揭露，并坚决支持知识产权受侵犯的一方，包括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对许昆银剽窃行为及其身份的调查

去年8月，本刊收到许昆银（笔名许正雄）的来稿，题目是：《首次披露两个文坛泰斗的历史公案：丁玲与沈从文晚年的笔墨官司》。作者在首页上特别注明：“本稿属专稿，除自留底稿外，仅发贵刊一家，特此申明，并文责自负。”

我们看了此稿，准备采用。为了慎重，曾致函许昆银，询问此文的资料来源及作者有关情况。今年1月，收到许的回信，再次说明：此稿“仅发贵刊一家，目前还没有哪家刊物

捷足先登，故贵刊发此稿是特稿和专稿，望请放心。”

我们接许复信后，对稿子作了一些删节，将题目改为《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恩怨怨》，准备在今年第4期发表，并在第3期的“下期要目”中作了预告。

本刊第3期出版后，即收到枫年同志的来信，指出《爱我中华》总22期（今年1、2月号）有一篇《丁玲与沈从文的笔墨官司》，恐我刊第4期将发表的那篇就是这篇，提醒我们注意。

经查，正如枫年同志所料，这两篇稿几乎完全一样，署名均为许正雄。但此时，我刊第4期已经付印，已来不及撤稿。这时我们还以为只是“一稿两投”，按常规作了“不发稿酬”的一般性处理。

不料，第4期出版后，立即收到原作者陈漱渝同志的来信，揭露这是许正雄剽窃他撰写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一文（载《人物》1990年第5期）。陈漱渝同志严正指出：剽窃者的“大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要求剽窃者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同时还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对剽窃者进行谴责。张服膺同志的来信指出：“如此胆大妄为的抄袭恶劣行为，实属罕见，希望你们查对后，予以严肃处理，并加以补救，以表明《炎黄春秋》的纯正。”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本刊进行了认真查证。首先将许昆银抄袭的

文章与《爱我中华》、《人物》杂志发表的文章逐字、逐句核对，并与此文作者陈漱渝同志取得联系，而后致函许昆银所在地湖南芷江县有关领导机关，并和许昆银自诩为“理事”、“会员”的有关单位多次联系。经过几个月的大量工作，调查结果是：

（一）许昆银署名许正雄寄给我刊的稿子，是剽窃陈漱渝同志发表于《人物》1990年第5期的那篇文章，配发的两幅照片也是一样的。其不同处，只是我刊发表做的删节。

（二）《爱我中华》总第22期发表的《丁玲与沈从文晚年的笔墨官司》，也是许昆银以笔名许正雄剽窃的陈漱渝同志文章，在投寄本刊时，也投寄给《爱我中华》，并伪称：“我查阅了一些史料，又走访了丁玲的丈夫陈明，并通过他查阅了丁玲的有关遗书。”为进一步骗取编辑信任，甚至还把已在《人物》杂志发表的沈从文给陈漱渝同志信的复印件寄《爱我中华》发表，可见其手段的卑劣和胆大妄为。

（三）许正雄给我刊来信中自称是：芷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湖南省散文学家协会员、湖南省社科理论研究会会员。经向有关单位调查证实，这些身份均属伪造，甚至“湖南省散文学家协会”、“湖南省社科理论研究会”都是许虚构的。实际上，许昆银原在芷江县某乡工作，现已停薪留职”。

罗介华同志 来信摘要

《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称得上琳琅满目，丰富多采。但是署名许正雄的《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恩怨怨》一文，看来很“面熟”，不免引起了我的怀疑。待我翻箱倒篋，彻底查找，终于在1990年第5期的《人物》

杂志上发现了这个许大剽窃家的老底：纯属抄袭陈漱渝在《人物》上发表的《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一文。经过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许文与陈文从头至尾一一对照，可以断言是百分之百剽窃。我真佩服许某的贼大胆，他竟能冒着“伸手必被捉”的危险，干出这个“贼”勾当。不仅偷了人家的文章，连作家本人他也偷了去。请看1990年5期《人物》陈文说：“我曾致函沈从文，打听丁玲地址及近况……”而这许

某竟以“笔者”二字代替了“我”字。这一改，与丁玲、沈从文这两位大名人有过交往的陈漱渝，也就换成厚颜无耻的许正雄了。好一个冒牌货！

有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许某人利令智昏，万万没有想到发行海内外的《炎黄春秋》杂志，会有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们的眼睛能瞒得过吗？如今捣鬼不成，反被人拿来示众，为以后再搞剽窃者留下一面镜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方面作出了贡献，团结了各界人士，激发了广大读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炎黄春秋》很有特色，在发掘历史真实，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史的报导，使人感到很亲切。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今年82岁了。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重要年代，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炎黄春秋》为我提供了许多历史事实，成了我最可贵的精神食粮。

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阅读，加深了我对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的

理解，加深了对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作用的理解。这本杂志对广大干部和青年都是难得的好教材。希望这本杂志越办越好。（一）通过多种渠道宣传介绍这本杂志，使更多的人看到她，认识她。（二）史料力求真实、可靠，这是生命线，发现有错误要更正。（三）感谢编辑部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

彭德

（彭德同志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原交通部副部长）

我作为一个老干部很喜欢《炎黄春秋》

我看《炎黄春秋》的优长与不足

社长同志：

在文采阁的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多，有些同志的发言又长，我未得机会发言，不无遗憾。昨晚想了想，还是把想说的话写在下面。

《炎黄春秋》出了40期了，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是一个热心读者，有的刊物大概不欢迎我这样的热心。因为我做语文教员多年，形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喜欢挑文字的毛病。可是《炎黄春秋》的同志却欢迎我，甚至把我当成自己人。

《炎黄春秋》的成功，我认为最主要的是，高举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办刊方针，而且有了一支优秀也较稳定的作者队伍。

作者队伍如何，是决定刊物的兴衰成败的重要条件。贵刊作者队伍的优势在于：1、联系了一批老同志，他们是近六七十年以来许多重大事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的亲历者和目睹者，他们是活的现代史、活的革命史、活的党史；2、团结了一批中青年的历

史学家和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分布在各类研究所和文教单位。这一优势应该充分发挥，并继续扩大之。也就是说还要不断有意识的发现新人，培养新人。过去许多刊物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出了成绩。

现在发表纪实文章的刊物很多，我认为杜绝虚假是十分重要的。文章需要可读性，要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但绝不能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文章失实，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而且会使读者失去对刊物的信任。《炎黄春秋》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我是赞赏的。

最后提一点意见，即希望加强校对力量，大力消灭错讹。杂志社每一位同仁都应兼任“校对”。大样要请几位同志分别把关，把好消灭错字的关，这个问题根本性的解决，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专此，顺致

编安

向全社同志致意

王景山

医林中升起一颗新星

● 海霞

中医世家 有后人

她,年岁不大,生就一张清秀、和善的脸,有人称她是人间天使。

在京城空军后勤部医院糖尿病科,用外敷“王氏消渴膏药”治疗糖尿病,这一独特的方法,在京城一传十,十传百,王胜霞的名字也渐为人知,饮誉京城。

人是出名了,但在出名的背后是无尽的付出和努力的钻研。王胜霞是幸运的,她生长在一个六代中医世家。她父亲的祖父,曾因治愈开封知府太太的消渴病而名噪一时,在河南颇

有影响。她父亲10岁时即开始学医,16岁随父把脉行医,自家祖传的一个药膏秘方,对肠、肾、脾、胃等疾患和尿崩等症有显著疗效。他在医疗实践中目睹了许多糖尿病患者所忍受的痛苦与绝望,他发现自家祖传的药膏对这种病有一定的疗效,但不明显,于是又进行反复的改进、调整、探索和研究,终于配合针刺气海穴贴敷“王氏消渴膏药”,疗效提高,显效卓著,赢来了众多的患者。

在父亲的影响和栽培下,王胜霞从小熟读《本草》、《金匱》、《内经》;在12岁时便学会熬制黑油膏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胜霞学识倍增,很娴熟地掌握了父亲的这一套“绝活”技术。

小小膏药医顽症

1993年,北京的春天来得晚,草地上不见一丝绿意,吹来的风也是寒凉的。每早在北京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空后医院(邮编:100720,电话010-66775085)一个诊室的门前,都聚集许多病人,他们中有工人,有农

民;有干部,他们从不同地方而来,为了战胜病魔,翘首以待。

王申和王胜霞父女没有辜负患者的希望。经过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感谢信不断寄来。

王氏消渴膏药确实为糖尿病患者带来希望。

“王氏消渴膏药”以名贵中药海龙、海马、人参、黄芪、沉香等制成,用芝麻油熬炼成。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它具有显著迅速、疗效持久、使用方便、安全、无痛苦、无毒副作用的特点,是治疗、预防糖尿病的理想佳品,实践验证,对于消除消渴病症状、治疗兼症、增加体重、提高生存质量,效果显著,于1994年4月在北京通过了专家的鉴定。

新星,冉冉升起……

中医世家的熏陶,王胜霞自身的努力,1992年她写的论文《中药消渴膏药穴位贴敷配合针灸治疗非胰岛素依型糖尿病309例》在《中医杂志》上发表,1993年在全国专科病学术会议上获得优秀论文奖。1995年6月王胜霞参加了在黄山召开的全国中药外治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

王胜霞走出来了,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间医生,她要用自己的“绝技”造福于人类。对于取得的成绩和荣誉,她从不自我满足;沾沾自喜,还有更多的难题等待她去攻破,更多的患者等待她去治疗。

赠擦鞋纸 有奖征广告词

广东澄海东里绵来日用制品厂,向您免费赠送擦鞋纸样品试用。本品芳香、卫生,不用鞋油鞋刷,拉擦即亮,适应任何颜色皮鞋、旅游鞋、运动鞋、皮衣皮包及人造革,是旅游居家必备佳品,本品最适合专业业余推销,您如需要样品写明是《炎黄春秋》读者并付邮资2角即赠。

敬告:本厂向广大读者征集有奖广告词,该词需突出上述优点,需明了、简洁、通俗、易记,特设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奖金分别为2000、300、100元。词如被采纳,本厂通知您凭身份证复印件领取奖金。

注:以往获奖广告词是“美鞋宝,令足下生辉,送礼旅游佳品”。

代表:宋裔全

邮编:515829

和中年朋友谈谈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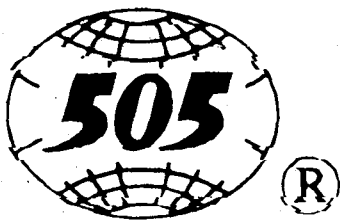
● 穆 义

中年朋友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黄金时节,但由于种种原因疏忽了自身健康的保养,导致疾病的发生;甚至被病魔夺取生命,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严重损失。

近年来,中年有因冠心病、心肌梗塞导致死亡时有报道。造成中年人心肌梗塞病发病率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脂、高血压及冠心病发病不仅持续上升,而且有早发趋势,使得急性心肌梗塞发病年龄提前。中年期是人生中最劳累的时期,就事业而言,许多人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加点,无暇顾及体育锻炼,加之现代社会交际应酬也愈来愈多,常使一些人受烟、酒的危害。另外,商海沉浮,对金钱和利益患得患失,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都会使人产生压抑、紧张、焦虑等情绪。这些不良刺激长期存在,可使神经体液调节紊乱,从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在家庭中,中年人扮演的是“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常处于身心疲惫状态,过度劳累严重地影响着人的健康,而中年人又往往自恃年富力强而忽视自身保健,不能做到对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预防及早期治疗。

中年人是社会和家庭的脊梁,中年阶段注重自身保健,对社会和家庭都有重要意义。在预防疾病尤其是心血管系统疾病方面,除做到控制饮食、增强锻炼,戒除烟、酒,避免各种不良刺激等方面外,必要时选择适宜的药物保健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途经。505神功元气袋含有60

多种有效化学成份,具有健脾益肾、调整气血,通经活络、平衡阴阳之功效,长期使用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功能,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防病能力,改善心脑血管循环,对中年朋友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睡眠的学问

● 竹 林

睡眠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生理活动,充足的睡眠对健康有极大的好处。

医学研究表明,良好的睡眠有防治某些疾病的功效,尤其是对感冒的疗效更佳;睡眠还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尤其是儿童;睡眠可以解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有人曾做过实验,不给狗吃东西,它还能活20多天,不让狗睡,7天左右便会死去。人如果连续3昼夜一点也不睡,就会产生幻觉,记忆、思考和判断能力都会下降。由此可见,睡得香、睡的好,对健康、长寿多有好处。

怎样才能睡得香甜呢?请您在睡觉前最好做到以下几点:1、刷牙;2、梳头;3、洗脸、洗脚,有条件的可以洗温水澡;4、晚饭不要吃的过饱;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独家生产
(严防仿制假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安分院医药
保健研究所监制

厂址:陕西咸阳市乐育北路19
号

电话:(0910) 213392 218328
216586

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研制
陕西咸阳五〇五医药保健总公
司经销

联系人:周华

邮政编码:712000

传真:(0910) 218606

电挂:8286

国卫药广审(文)95060073号

5、睡前不喝茶,不吃巧克力等兴奋大脑的东西;6、情绪不要过于激动;7、枕头的高度、软硬应适度;8、开窗(冬天也应开一会),保持室内空气流通;9、最好在晚上9点以后就入睡;10、不要躺在床上看书和蒙头睡觉。

如果以上十条都做到了,但还是睡不好,而且白天有头晕,头痛,精神不振,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等现象,这可能是病态,最常见的疾病是神经衰弱。有此类病痛的人,千万不可过于紧张,反之,睡眠就会更加恶化。中国咸阳保存保健品厂研制的505神功药枕,它有镇惊安神等作用,效果很好,会使您取消睡不着觉的烦恼。

炎黄春秋



胡适与著名作家巴金(右)亲切交谈



在胡适一家的人伦之乐

张太雷一封残破家书的由来

“《新生》事件”与杜重远遇害

民国初期临城劫车案的台前幕后

美、蒋包庇风村宁次的丑剧

常书鸿一生心血倾注敦煌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3.20元